

求真雜誌

第一卷 第七期

要目

時事評論

張家口陷落後的國共和平談判……鶴 阜

巴黎和平會議之教訓……海 明

印度臨時政府的成立……康 君

論國民會議……陳人白

美國通貨膨脹與物價管理局的作用……康君譯

蘇聯的危機及其歷史的回顧……劉少嚴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和背景……西岑譯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李炎彬譯

為古史辨派的第二次反攻再進一解……李 季

論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冰夷編譯

今日的廣西〔特約通訊〕……陳治華

求真雜誌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

利 通 行

LEE TONG & COMPANY

專營手工業製成品出口

代理歐美名廠產品入口

— MANUFACTURERS & EXPORTERS OF CHINESE THINGS —

行址：上海漢口路四五五弄卅七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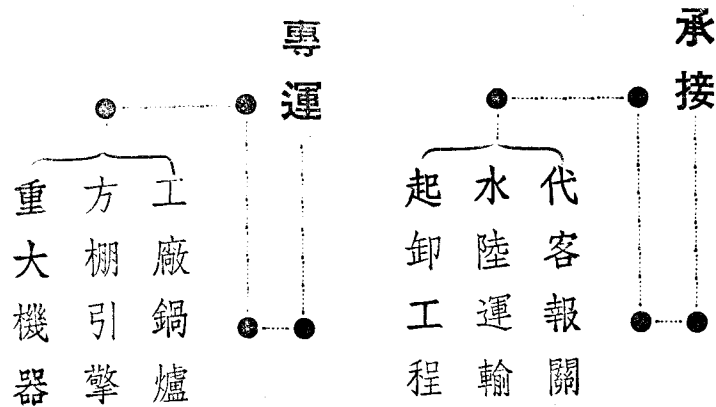
HOUSE 27, 455 HANKOW ROAD, SHANGHAI.

電報掛號 三 LEETONGCO. 三 電話 九六五四六
CABLE ADDRESS 二 SHANGHAI 二 PHONE 96546

行 輸 運 富 華

HWA FOO TRANSPORTATION CO.

電
話：
九 九
七 六
七 五
二 四
七 二



事務所：漢口路四五五弄五號

求 真 雜 誌

第一卷第七期目錄

時事評論

張家口陷落後的國共和平談判……………鶴 臯(二)

巴黎和平會議之教訓……………海 明(四)

印度臨時政府的成立……………康 君(六)

論國民會議……………陳人白(八)

蘇聯的危機及其歷史的回顧……………劉少嚴(一六)

美國通貨膨脹與物價管理局的作用……………康君譯(三〇)

▲物價管理局爲什麼被撤銷▼

中東的逐鹿場……………黃敬存(三七)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和背景……………西岑譯(四二)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李炎彬譯(五〇)

爲古史辨派的第二次反攻再進一解……………李 季(六一)

論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冰夷編譯(六六)

今日的廣西(特約通訊)……………陳治華(七三)

編者的話……………編 者(七五)

時事評論

張家口陷落後的國共和平談判

十月十一日國軍進佔張家口後，國府主席即發表『解決時局聲明』（十六日）。在該聲明中除指責『中共對政府十月二日所提辦法及馬歇爾將軍與司徒博士的停戰建議，均予拒絕』，及表明『政府仍不放弃其和平解決之政策，並將繼續用調解與商談之辦法，以謀解決目前國內政治與軍事情況』外，并向中共提出『和平解決』辦法八條，聲明『一俟共產黨予以同意，政府即可發表停止衝突令』。跟着，延安共產黨中央亦發表冗長的『對時局聲明』（十八日），該聲明書除憤慨地歷舉共產黨如何如何地『讓步』及政府當局如何如何地『背信』之後，最後表示：『只要蔣介石在人民壓力之下，願意實行正式有效的和平，則本黨可以不究既往，重新協商』。

差不多與這兩個『聲明』發表同時，不但所謂第三方面人士匆忙地起而為『和平』奔走活動，就是政府當局也特派要員邵力子吳鐵城等來滬，『促請各黨派及無黨派政協代表進京參加協商』，因而對和平談判躍躍欲試的第三方面人士與滯滯不前的中共代表周恩來都聯袂進京（廿一日）。於是，久已陷於僵持停滯的『國共和平談判』，似乎又在我們的政治舞台上重新活躍起來了。

但這次國共兩黨重新恢復起來的和平談判，是否不蹈已往的覆轍，而能達到『停止內戰』、獲得國共『重新合作』、『完成國家和平統一』呢？要解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將國共雙方所提出的談判條件來檢討一下。

國民黨方面所提出的條件中最重要的是：（一）『立即恢復交通』；（二）『六月間所擬定之東北軍隊駐地，應即定期實施』（原提條件第三）；（三）『華北華中之國軍與共軍暫駐現地，以待三人小組協議商決國軍與共軍之駐地分配及整軍統編與縮軍事宜，而達成全國軍隊統一之目的（原四條）』；（四）『關內之地方政權問題，由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解決之（原六）』；（五）在共黨同意以上各點後，即下停止軍事衝突令。在下令之同時，共產黨應宣佈參加國民大會，并提出其代表之名單（原八）。這些條件的含意是很明顯的：國民黨當局既在軍事上大佔勝利之後，自然要進而要求共產黨承認既成的事實或『就範』，參加它所立將召開的『國民大會』及準備行將『改組的國府委員』，以此逐步地去整編共黨的武裝，『達到全國軍隊統一之目的』，『實現和平』。

正因此，在共產黨方面認為國民黨當局『於十月十六日宣佈其和平的八項條件』，係『乃故意裝出和平姿態』，這意思就是說，其目

的在掩飾軍事的新進攻。這於國軍在宣佈和平八項條件後即繼續攻佔安東并進迫烟台的事實看來，也不能不叫人相信共黨的判斷。所以共方針對着國方的條件『鄭重聲明』：『今日一切會議，如欲期有真實效果，必須承認停戰、政協兩項協定的神聖效力；即承認恢復一月十三日國共雙方軍事地位爲一切軍事商談的準則；承認實行政協一切決議爲一切政治商談的準則』。這聲明的含意也是十分明顯的，這是共軍在大吃敗仗，失去關內一切重要城鎮之後，希圖從和談中去恢復其已經降低的政治地位和已經失去的軍事地位。這不但國民黨決不會允許，即在事實上也差不多等於叫昨天回來一樣的不可能。

從國共雙方所提條件的這種距離與矛盾看來，這次重新恢復的和平談判，其前途如何已可推想而知的了。尤其從過去一年餘來的事實看來，這次的和平談判，不過是過去歷次和談之一種更壞的翻版，其主要不同之點，僅是共產黨的地位在這次中顯得更爲不利而已。

如果我們試回憶一下過去，就可明白看出如下的趨勢：當去年九月——十月蔣毛舉行和談時，不但東北，即蘇北的一切重要城鎮，都沒有一個正式國軍，都在共軍勢力活動或包圍的狀態之下。所以那時共黨的地位是比較有利的。但在和談的過程中，國軍乘機迅速地運到了青島、濟南、天津和北平，在華北準備了進展的基礎。所以跟着雙十『國共會談記要』發表之後，戰爭就爆發了。戰爭的結果，國軍取得了上風。但當時整個的東北尚在蘇聯軍隊及共軍的控制下，共黨還佔着相當有利的地位，因而政府當局還急切需要和談。於是簽署了『停戰命令』，組織了『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協決議』，制定了『整編方案』。但這一切都只是幫助了國軍大量運到東北，迫使蘇軍撤退。所以當這一任務剛達成之後，東北的戰爭即爆發了開來。迨至國軍奪取長春，共黨在關內舉行大規模的反攻時，政府當局才又下令停戰十五天（隨後延期八天），又一次舉行了和談。然而在這次和談中，共產黨已流於極不利的地位了。所以談來談去，毫無結果。到了今天，共黨既已失去了熱河及冀東的一切重要城鎮，包圍大同慘遭挫敗，連繫東北及延安的張家口又告失陷；最近不但整個的蘇北快落於國軍之手，而安東亦已被攻佔，烟台的陷落且在旦夕中；在這種情形下來舉行和談，共產黨除了表示屈服，接受國方的條件外，還有什麼談頭呢？但共黨是不會這樣簡單地屈服的。如果這樣屈服，就正如它自己的『聲明』中所預感，是『逼使本黨出賣人民一切利益。』『逼使本黨……完全消滅』。所以它在武裝抵抗了效力之後，便死死抓住十個月以前的『政協兩項協定』來抵抗，求援於這『兩項協定的神聖效力』來挽回其頹勢。但如果『政協兩項協定』真具有什麼『神聖效力』的話，那共黨也就根本不會陷進現在的困境了。實際上，現在國共間的僵局，尤其是共黨本身所陷進的僵局，正是它多年來一貫的政治立場及戰後歷次和談或協商所造成的後果。

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次張家口失陷後的國共和平談判，比之前次長春失陷後所舉行的同一和平談判，還要僵而壞得多，這對於共黨方面說尤其如此。所以今後的國共和平談判，是更難產出『有效的和平』（如共黨所希望的），因而『談談打打或邊談邊打的內戰』，還是要繼續下去的。這裏的根因十分簡單而明顯：國民黨當局絕對要求在其統制下實現『政權與軍權的統一』（詳見雙十節國府主席廣播），而共產方面則絕對希圖永久保持自己的軍隊和某些『地方的民主政權』。這種根本矛盾的解除，只有人民大眾自己起來干涉它們，制裁它們，強迫雙方都把政權和武裝交出來，讓人民大眾自己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來管理國家，『改組政府』，『整編軍隊』，才有可能。也

只有如此，『民主』與『政權和軍權的統一』才能聯繫起來獲得實現。

所以在現時，無論是爲了解決國共間的內戰問題，以及解決一般的民主的任務問題，都必須立刻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担負，——這在現有條件下可能是表現人民大眾的意志和權威的唯一可能的機關。此外的一切上層的政治協商或和平談判，都不過是把內戰拖延下去，把問題移到將來去解決而已。然而這正是人民大眾所再難忍受的！（鶴皋）

巴黎和平會議之教訓

巴黎和會從七月二十九日開幕至十月十五日閉幕，整整經過了兩個半月，在這樣漫長的時間中，會議最初規定討論的對義、匈、羅、保、芬五個戰敗國的和約總算勉強告一結束了。因爲這些國家恰處於西歐資本主義勢力與蘇聯安全圈的接觸地帶，所以在和會中，所謂西方集團與東方蘇聯集團之間的利害衝突表現得異常敏感和尖銳。這一點從會議開幕之始便暴露出來。譬如光是討論會議的程序規則，完成會議的初步階段便耗去差不多一個月的光陰，往後還經過所謂『分組討論階段』，直到最後的十天內才匆匆的把五國和約付之全體討論和表決。在觸到問題的真正核心時，兩方面的衝突當然更形激烈，所以會議進行得特別遲滯和沉悶。譬如討論到義大利和約時，大家公認特港問題引起最難於和解的爭執，英美堅持特港要置於行政長官的獨裁管理及英美軍隊的控製之下，莫洛托夫則要求把這個特殊的港口變爲第二個但澤自由市，賦予立法議會以較廣泛的權力；另一個不可忽略的爭論便是關於在和約中插入『保障將來不致再有法西斯組織出現』一語，這是蘇聯提出的，但英美却加以反對，牠們認爲這是干涉意大利的內政。匈、羅、保和約激辯最烈的是關於多瑙河航行自由問題，莫洛托夫率直地指此爲『僅爲十九世紀英帝國主義之餘孽。』他認多瑙河之成爲蘇聯及其斯拉夫衛星國的生命線，等於蘇彝士運河或巴拿馬運河之於英美。而英美則以擊蘇聯企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操縱巴爾幹諸小國。其次是希臘對保加利亞的領土要求也遭到否決。在賠款問題上，雙方的對立也不稍減，譬如美國要求羅馬尼亞賠款二百萬萬元，莫洛托夫則認爲美國在這次戰中爭賺了『四千三百二十五萬萬美元』，而蘇聯則損失了『六千七百五十萬萬美元』，所以美國的賠款要求是『不合理』的。但在匈牙利問題上，美國代表却在『和會展開減低匈牙利賠款運動，以防該國經濟崩潰』。這當然又立即引起蘇聯代表的反對，他們認爲這是『對準蘇聯、捷克及南斯拉夫之合法權利。』

總括這次和會的結果如下：（一）『歐洲地圖僅有少許的變更；』（二）軍備限制；（三）『關於政治方面，各和約均有強制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之規定，除意大利外，各國均明白規定不得有法西斯或仇視聯合國之組織；』（四）『經濟條款已訂定者有：』（一）在十八個月內以最惠國待遇給與各聯合國，義國則須在三年之期間內以最惠國待遇給與聯合國。（二）各前敵國之內部主權予以尊重，僅其國

家之經濟立法，有國營獨占制之設者不在此限。(三)恢復盟國在戰敗國內之財產權，並給與損害賠償。」(路透社巴黎十月十四日電)

爭執較大，具有決定意義而尚未決定的有四大問題：特港、多瑙河、保希邊界與巴爾幹各國之國際貿易。據會議規定，這些通過的和約連同未決的問題還要交付於十一月初重開的外長會議，作最後的審核和討論。所以這次巴黎和約雖然耗去兩個半月的寶貴時間，也只在一些較次要的問題上提供了一個結論，一切還有待於將來的四強會議哩！這就是戰後『民主世界』的作風。

但這次和會對於『和平』雖沒有多大益處，却至少給予各國民衆一個有益的教訓：在任何像『和平會議』之類的分贓會議中，受犧牲、受損失最大的終歸是戰敗國家的人民，他們因爲本國的統治階級實行一種冒險的戰爭政策，便迫得要替牠負全部戰爭的責任，擔負驚人賠償和掠劫所造成的奴役和榨取，什麼正義、什麼人道、什麼自由、平等之類的宣言，只是戰勝國統治者的偽善的福音而已，他們口口聲聲說他們的戰爭不是對付交戰國的人民而僅僅是對付其『法西斯當權者』，這也只是一種騙人的煽惑而已，當戰敗國的人民起來用長期艱苦的流血戰爭(如歐洲各淪陷國之游擊戰等)協助『同盟國』取得勝利之後，他們的『盟國』却反過來要給這些可憐的受欺騙、受損害最深的人民加以無情的懲罰了。

第二個教訓就是：即在那些『戰勝國』的盟友當中，得到戰爭最大利益的還是幾個強國，那一大批被牽入戰爭的小國家和殖民地國家不但沒有分享的機會，就是想從這次戰爭的損失中取回一點補償也是可憐之至的，發言權則更微乎其微。結果證明：牠們徒然在戰爭中做了強國的犧牲品，在和平會議中充當了強國的裝飾物而已。中國、印度等代表所盡的作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們除了對英美的提案雙手贊成，難道還有什麼獨立的立場嗎？

這都是第一次大戰後凡爾賽和會所說明過的教訓了，差不多三十年之後又要我們重新指出，實在也覺得多餘。假如說，其中尚有一個新的教訓，值得特別寫出的，那就是：在這和平會議裏，在勝利的強國間竟夾雜了一個工人國家(蘇聯)，因此呈現了一九一八年和會裏所沒有的奇特現象。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在蘇聯剛剛產生之時，牠雖然同樣遭受了德帝國主義的嚴重傷害和布列斯特和約的屈服，但牠的領導者(列寧)不但沒有向戰敗國提出什麼賠償割地的要求，而且還把一切和平會議和國際聯盟斥爲帝國主義者的分贓機關，忠誠地鼓吹『不割地、不賠償的和平』，因爲割地賠償將造成戰敗國人民的嚴重災害、成見和奴役，埋伏未來戰爭的種子。這次蘇聯當局却不顧一切，一反過去的政策，希望從戰敗國方面索回戰爭損失的賠償，因此參加了和會。我們姑且把社會主義的最高原則拋開不談，牠這次參加了『帝國主義的分贓會議』到底得到什麼實際利益呢？差不多在每一個嚴重的問題中都遭逢優勢的英美勢力壓迫，賠款減低了，『安全圈』被追得要一步一步打開了。(恢復民主政治，多瑙河航行自由及最惠國待遇就是盡這種作用)結果，蘇聯在威望和政治上受了無可補償的損害，而從『分贓會議』中爭得的利益還不够補償牠的戰爭損失的幾分之幾。但美英帝國主義則恰恰相反，牠們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掩護之下，正可肆無忌憚地實行分得了大部分戰爭贓物，把大部分小國家納入自己的陣營中，而且因爲牠們保有雄厚的物質基礎，他們可以實行犧牲小利益而取得大利益的政策——在偽善的慷慨的詞令之下，迫令蘇聯破產，而抬高了牠們自己的國際地位和威望，這就是一個工人國

家參加國際外交會議所管受的苦果，而我們從中所能得出的唯一教訓（最後一個教訓）也只能重複背誦這句真理：蘇聯只能從世界舊制度的推翻和澈底變革中取得戰爭損失的最可靠和最正當的賠償，其他一切道路都只是冒險和有害的幻想而已。（海明）

印度臨時政府的成立

從八月十五日的「直接行動」開始，印回流血衝突便由加爾各答蔓延到孟買各地了。九月二日是印度新內閣主要閣員七人就職的日子。孟買在這前一日起，一連五日都在激烈的衝突中。回教徒到處懸掛黑旗和掃帚，以表示哀悼新政府。當尼赫魯們在印督府前廣場上宣誓就職時，「警察雖採取一切必要措置，以維持秩序，但回教徒仍持黑旗憤然混跡印度教徒間，為新政府發喪。」（法國新聞社新德里九月二日電）跟着，聯合社十七日電稱：印回衝突已自諾卡里區北部，擴大至孟加拉東部之江特坡區，有出動軍隊彈壓之必要。另據孟加拉省議會方面消息，本月十日以來諾卡里與蒂畢拉兩區，至少有五千人殞命。（「直接行動日」不過死亡三四千人，這證明衝突是愈來愈激烈化了。）以後，各省的衝突就很少停止過。

印回間這種流血衝突，對於英國統治者自然是笑逐顏開的。牠一方面固然慫恿他們走向分裂和衝突，以讓他們兩敗俱傷後再來掌握全部政權，另一方面又利用印度的上層對下層民衆的害怕和兩者間的矛盾，用「惠而不費」的所謂「讓步」去拉攏那些「騙子」們替牠服務，把印度革命的浪潮阻擋一下，以求重新鞏固其統治。因此，在尼赫魯們面對着愈來愈普遍和尖銳化的騷亂而感到手足無措的時候，印督魏菲爾便重新邀請真納「共商目下政治僵局」，以臨時政府五席部長給予回教聯盟了。

最初用羣衆的「直接行動」去做買賣的那個「騙子」——真納，當然不敢再輕易嘗試玩火了。早在兩個月之前，我們在「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一文（本誌第五期）中就已說過：「我們不難預測：當真納被火灼傷而且證明他本人無力控制羣衆以後，他多份要減價求售於主人及「同僚」的。」他過去和尼赫魯們「所爭吵的，只是幾個人麵色層的分贓不均問題，而不是幾萬萬被奴役人民的生活改善問題」；「所追求的只是在大英帝國的羽翼下做幾個官職問題，而不是在真正民主的基礎上進行民族民主鬥爭的問題」（同上文），那末，對魏菲爾的建議，即使口頭上「不擬投降」實際上也要投降了。固然，在投降之前也要矯揉造作地撒撒嬌的，所以他好像向主人及「同僚」恫嚇似的聲明：英國對印度之現行政策可能使回教投入蘇聯懷抱之內。他同時相信「蘇聯對印度之興趣並不止於觀察者，且蘇聯離印度並不過遠」，倘英國繼續這樣，「實係一種極嚴重且危險之政策」。（合衆社九月三日電）可是，他雖然想向蘇聯投送秋波，派代表去請蘇聯支持回印分治的主張，但這條路不但沒可能，而且也是他本人所害怕走的。因此，兜了一個圈子還是回到老地方：致函印度總督魏菲爾，聲明回教聯盟已決定參加印度臨時政府。

甘地所代表的那班印度資產階級，雖然與真納及唐寧街主人是有矛盾的，但碰到下層羣衆行動起來的階級矛盾時，前者便處於次要地位了。因此，正當騷亂從加爾各答蔓延至孟買及其他地方時，這位『不抵抗』先生便大聲疾呼起來：『新政府各部長均須不顧生死，求取兩教教徒和睦』。（聯合社九月三日電）而過去以自由主義者甚至社會主義者享譽一時的尼赫魯，一跨上了臨時政府的舞台，便立即成了衆矢之的，成了英國墾殖下統治印度人民的工具，成了國內各弱小民族自決的桎梏了！他過去領導國大黨和工會合作，今天則號召人們抵制工會，對於工人因屋主減低工資而起的糾紛，要採取強迫調解的方式；對於印回農民一致團結而組成的『全印農民協會』，又企圖加以分化而解體牠。另一方面，他希望昨天自己攻擊爲『英國第五縱隊』及『世界上僅存的極端封建統治』的王公，派代表參加計劃中的制憲大會。因此，他爲了『考查』（明白點說：拉攏）西北邊區各省土著對土著區未來之意見』而出巡，但到處遭遇到人們的槍擊、投石、和怒叱。雖然幾次都倖免於死，但羣衆這種不客氣態度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

今天，一切上層的人物都齊聲在叫：『火是玩不得的』！他們都在齟齬了一會之後，趕快妥協了：由國大黨讓財長一席給回聯，加上商務、交通、衛生和司法四部長共五席，入閣和國大黨合作。尼赫魯則任內閣副總理兼外長，加上其他國大黨五席，錫克族兩席及基督教代表一席，共十四席組成臨時政府內閣。而最重要的職位——內閣總理却是現任印度總督的魏非爾勳爵。我們當然不會健忘：正是這位將軍在八月廿六日闡明他『賦有否決權』的廣播中，公然宣稱『余仍對皇帝暨議會負責』哩！這就是尼赫魯、真納們經過民衆長期流血鬥爭後所『獲得滿意保證』的『最後成立的協議』——所謂『印度的獨立』！

關於互相妥協以成立印度臨時政府的意義，甘地在尼赫魯出巡西北邊省沿途受圍擊時曾這樣說：『臨時政府之成立，乃在處理一般問題，如飢寒疾病，交通不善，腐化與文盲諸問題。此種問題無分印度教徒與回教徒，因雙方均受飢寒，雙方均須掃除文盲也』。（聯合社新德里十月廿一日電）這意思就是說：印回兩教的下層窮苦民衆都正處於同一痛苦中，迫得要一致起來了，共同的生活（階級利益）把他們的宗教成見消除了；因此，印回兩教的上層（加上『主人』）也必須一致起來處理（對付）這危機了。怎樣處理（即結束騷擾）呢？同一電訊告訴我們：『甘地答稱……英國勢力若長此存在，則印回雙方均盼英國力量爲援助，余不得不承認此點』。原來這就是甘地一向堅持的『非暴力主義』！

印度所有資產階級——地主與英國統治者的趕忙妥協，共同成立臨時政府，替英國『皇帝暨議會負責』，甘願變成後者的忠順的婢女，這乃是震驚於下層羣衆力量抬頭的結果。假如印度今天的羣衆運動不是如此高漲到飽和點，那他們是不會那樣狼狽和『不顧生死』（甘地語）地趕忙屈膝的。他們分沾到一點殘羹後，勢將愈來愈赤裸裸地暴露出其猙獰面目。但印度羣衆脫離了這些『騙子』們的欺蒙和束縛，却是走上真正獨立解放的有利條件和保證呢！兩個鬥爭營壘的明確化，將是一個新階段的開端，印度的真正獨立就是取決於這一新的階段的！（康君）

論國民會議

陳人白

國民黨政府當局已於十月十二日明令宣佈決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會議」。這表示黨權政黨久已預約，并在十餘年來多次宣佈召集又多次宣佈延期而像謎一樣的「國民會議」，現在是再不準備拖延了！

但這一「宣佈」，不僅一般民衆對之十分冷淡，不感興趣，而且在野的某些黨派甚至表示憂懼，尤其是共產黨認爲「張家口之佔領及國民黨之片面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乃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證據」（路透社南京十二日電傳中共發言人王炳南的表示）。人民大衆對於這樣的「國民會議」不感興趣，自有其原因；某些在野黨派對它表示憂懼，中共認定它的召開是「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證據」，也許有其各自的理由。但我們站在人民大衆利益的立場上，站在推進民主改革的運動上，却絕不能因此便忽視國民會議在我國當前局勢下的迫切需要，以及它在民主改革運動上的重大意義。假如人們認爲黨權政黨現時所宣佈召開的「國民會議」是非民主的、是「片面」而足以「造成全面破裂」的，人們就應當積極起來召集一個真正民主的國民會議，一個足以解決國家當前一切重大問題，足以「造成全面和平」的國民會議。但不此之圖，而僅以表示冷淡、憂懼及拒絕參加爲限，那就無異於「因噎廢食」了。

人們應當知道，民主的（普選的）國民會議，絕不能由統治者的自願或恩賜而得。任何專制的統治者，在主觀上總是害怕民主，不要民主的議會政制的。即使爲客觀情勢所迫，也只有製造一套非民主的議會形式來應付，來搪塞、來掩飾其專政的本質。正因此，民主的議會制必須由下層民衆的爭取才能實現。在落後國家裏，尤其是在反動的過渡時期，一般否認國民會議的

歷史作用固然是一種可憐的幼稚；但專業上層的協商，希望統治者的賜予，而不動員下層羣衆起來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也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幻想。

固然，現時的人們對國民會議抱着如此種種的錯誤態度，自有其更深遠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在客觀上，因爲會議運動或立憲運動，在我國歷史上曾經遭受了不斷的慘敗，造成了種種的惡劣影響，因而養成了人們對於國民會議的許多成見和不理解；在主觀上，某些人們基於其特有的立場，以爲現今需要的國民會議也是像我們以往的「國會」一樣，不是政治的交易場所，便是玩弄政治詭計的舞台，因而對於真正代表民衆意志和利益的普選國民會議不感興趣。而一般人民大衆則因爲缺乏民主運動（連普選的議會運動在內）的經驗和傳統，對於國民會議的意義更難了解。但正因爲如此，我們覺得對於一般國民會議的問題有重新提出來加以探討和解釋之必要。

特別在現時，國民會議已成了當前最現實而迫切的問題。不但人民在客觀上需要國民會議，各在野黨派會一致要求國民會議，就是黨權政黨也被迫着不得不召開其所謂「國民會議」了。不論黨權政黨行將召開的「國民會議」是如何的不民主，如何的別具會心，另有作用，但有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就是：當權的政黨已經深深地感覺到，如果再以赤裸裸的軍事獨裁舊統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因而不得不準備披上一件民主政制的外衣來裝飾；——這就是證明中國現時的民主改革要求，已經發展到了某種成熟的階段，再也不能用簡單的軍事手段來壓抑了；這同時也就是證明，國民會議已成爲公認的解決當前一切重大問題的工具哩。在這樣的情勢底下，對於國民會議問題如果沒有明白而確切的了解，在未來的政局演變上，在民主的改革運動

上，一定會招致種種的混亂和罪惡。所以，我們當政府當局正在要召開它自己的『國民會議』之際，特將這一問題鄭重地提出來，略抒己見，希望一般人民大眾趕速起來加以注意和認識，尤其是切盼凡是誠誠擁護民衆利益，願爲當前的民主改革，爲未來的社會改造而奮鬥的人們，來加以認真的探討，從正確的認識上去發動正確而有效的行動！

民主與國民會議

但國民會議的意義究竟何在？它與一般的民主主義又有什麼關係呢？這是首先必須略予檢討的。

國民會議，就其本質說來，仍然是屬於所謂民主的議會或國會（parliament）的範疇。民主的議會制，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乃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之唯一合理的統治形式。因爲只有通過這種制度，才有可能使資產階級內各階層的利益和願望相當地反映出來和集中起來，形成所謂『立法』（主要是憲法），并以此去影響其『行政』和『司法』，藉以保衛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因此，民主的議會制是資產階級在其常軌的發展狀態下所需要而可能加以實現的。

如果就其歷史的起源和發展說來，議會制度又是資產階級藉以反抗封建傳統，反抗君主專制的武器（關於這一點，我在下一節中將予以較詳細的解說），并在此種反抗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資產階級踏上了政治的統治地位時，如果它要想盡量在各下層人民中發展它的影響，利用各層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來替它有效地服務（主要是創造剩餘價值），則議會制度又是較能網羅各種力量（如改良主義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貴族工人等）的良好工具。但當資產階級的本身發展不健全，感到力量薄弱，而又處於不利的條件下時，雖然議會制度是這個階級之『唯一合理的統治形式』，它都是不願也不敢採取這一形式，往往藉用某種專政的形式來代替它的。其次，當資產階級發

展到最高階段（如帝國主義的階段），雖然它的本身勢力已登峯造極，壟斷了一切社會的資源，但因爲無產階級勢力的發展和覺悟，尤其當後者向它進行堅決的鬥爭時候，它又往往放棄了議會制度而轉到更野蠻的專政。同時，在這個階級發展的最高階段裏，即令沒有無產階級起來向它作堅決的鬥爭而還保持着議會制的形式，但這種會議制的民主也一定越來越壓縮，在實際上是爲少數的資本大王或財政寡頭所操縱的。最後，就是最當軌的議會制度，對資產階級本身內部雖然是最民主的，但對於下層民衆，尤其是對於工人階級，在本質上還是專政的。

就整個的議會制來說，它也像其他的事物一樣，跟着一般的民主主義，自有其發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當資產階級往上升的時期，議會制度不但是這個階級反抗君主專制的有力武器，是自己統治的合理形式，而且對於整個的社會發展也是盡了鉅大的進步作用的。但在這個階級走向斜坡時期，議會制度便不可避免地成爲欺蒙和壓抑民衆的輔助工具，而變質爲反動的了。因此，議會制像它本身之代替君主專政的制度一樣，就要被另一種更高級的民主制度（蘇維埃制度之類）起而代之了，這乃是任何政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逃避的規律或命運。

至於我們現時所需要的國民會議，在本質上雖然是隸屬於議會制的範疇，但它與歐美一般流行的議會却有兩個主要不同之點：（一）歐美流行的議會制，大多是兩院制的（上議院與下議院），而國民會議則爲一院制。凡兩院制中的上議院，多是由於指派，或特種推選或間接選舉，因而不合於普選的民主制的。而國民會議則應當完全由普選產生，然後才是名符其實。（二）歐美流行的議會制，不僅是兩院制，同時是將『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械地割裂開來的。真正的國民會議，應當是一個具有全權處理國家一切重大問題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內的）機關。當然，先進國家歷史上所經過的國民會議并不一定合乎這一標準，但真能够得上稱爲國民會議的是大

致接近一標準的（如法國大革命中的國民大會——National Convention）。否則，只是掛羊頭賣狗肉而已。

關於國民會議與一般民主主義的關係，我在『民主的內容與怎樣實現民主』（求真一卷二期）一文中曾有過這樣頗為扼要的敘述：『就西方先進國家的民主解放運動的體現看來，民主主義的內容或民主的歷史任務，其中主要之點是：解決土地問題，摧毀封建貴族的特權及其專制政治，建立民族獨立統一的國家，而普選全權的議會政制是這一民主主義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現』（請參考上指該期一四頁）。假如我們將這一段話中所包含的意義再分成爲『民主的內容』與『民主的形式』來看的話，那我們又可以這樣說：『解決土地問題，摧毀封建貴族的特權及其專政，建立民族獨立統一的國家』，乃是民主的一般內容，而『普選全權的議會政制』則是民主在政治上的總的形式表現。如果以我國現時的情形來作例，解決土地問題，改善工人地位（如八小時工作制），對外民族完全獨立及國內弱小民族自決，是一般的民主內容，則國民會議便是這民主內容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或總的政治形式。因此，要求民主而不提出國民會議作爲總的政治口號，則等於在政治上沒有集中的表現，沒有總的政治形式將一般的民主內容聯繫和綜合起來，形成整個的統一的鬥爭路向。

但國民會議所能起的作用及其與一般民主主義的具體關係，也像一般的議會制度與一般的民主主義的本身一樣，是最爲複雜而多種多樣的，是跟着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條件不同而發生變化，因而或多或少改變其形式和內容的。因此，我們要想對這問題有一個更具體的更進一步的理解，只有從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中去探求。

西方先進國家議會制演變的經驗

一提到議會制，現在大家都公認英國不但是這一制度的典範，而且是它

的搖籃。一二一五年之有名的『大憲章』，就是一種所謂國會的產品。但那時的『國會』是貴族的。在英國第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議會，乃是十七世紀的『長期國會』，這是由反抗君主專制的火燄中生長起來的。它會發動了英國最廣大的下層羣衆（以倫敦爲中心）并武裝他們起來反抗專制的君主（查理第一），把他送上了斷頭台，建立了第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推行了廣的泛民主改革。但正由於那個國會所號召起來的民主改革超過了它自己的頭，於是資產階級份子便自動退縮，寧願讓斯圖亞的專制王朝復辟。但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的種種壓制下資產階級又感到不能忍受，因而又有一六八八年的所謂『光榮革命』。這革命算是替英國資產階級奠定了議會政制的基礎。但『光榮革命』所創造的議會不僅頭上頂着一個王冠（所謂立憲君主），而且資產階級也還是與地主貴族妥協的，選舉更是距離民主甚遠。所以英國的議會要變成真正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要達到普選的程度，還須經過長久的時間，經過產業革命，經過幾次的『改革案』，尤其是要經過下層羣衆（特別是工人羣衆）的推動。一八三〇——四八年代著名的『憲章運動』，就是一個顯例。在這運動中會舉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羣衆會議和聯名請願，要求凡滿廿一歲的男子均享有選舉權，平均選區，秘密投票及取消議員財產資格的限制，議會年選及議員給薪等等，——英國的議會在這種運動的推动下，才逐步完成了它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性（普選制），取得了世界典範的稱譽。

現時英國的民主議會制可說已達到了飽和點。麥克唐納及愛特里這些改良主義的精髓之繼續起而代替張伯倫和包爾溫之流組閣執政，一方面固是英國的民主會議政制發展到最高度的表現，但同時也證明了這同一制度已臨到了極限。在下一歷史階段中，如果英國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政制不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所代替，將不可避免地要像以前意德一樣爲法西斯主義所犧牲。

另一民主議會政制的典型是新大陸的美國。（美國與英國議會政制的主

要不同所在，就是後者代表內閣制，而前者代表總統制。但美國最初的一個議會——大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也是在反抗英國的獨立鬥爭中產生和形成起來的。這個大陸會議發動了獨立戰爭，發表了著名的獨立宣言，一直將戰爭領導到最後的勝利，在新大陸建立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建立了另一種典型的民主議會政制。無須說，美國的民主議會制度發展到今日，也是經過了多次的改革，尤其經過了羣衆的推動才完成的。但今天的美國議會制，表面上雖帶着最民主的面具，但本質上早已成了幾打資本『大王』或『六十家族』的御用機器了。

法蘭西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模範，因而產生了最民主的革命的議會——國民大會（一八九二——一九四年）。這個國民大會雖然不是由於普選，但却是真能代表當時一切民衆的意志和利益的，且賦有解決國家一切重大問題的全權（包括立法、行政及司法在內），因而可說是名符其實的國民會議。這會議會徹底粉碎了封建的鎖鍊，處決了專制的國王，解決了土地問題，並動員全國力量，組織民軍，抵禦了歐洲一切反動勢力向民主法蘭西的進攻，這堪稱近代史上發揮了最偉大的權威，導演了鉅大進步作用的一個議會。但這種最民主的革命的議會，雖然本質上澈頭澈尾是代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利益的，而資產階級本身之害怕它，却有如害怕其影子。以致終於自願犧牲這種議會而接受拿破崙的軍事獨裁，最後且讓布爾喬的幽靈重新回到專制的王座上來，因而使法蘭西陷於反動與革命的漩渦中至半世紀以上之久。直至吃了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的無比敗仗之後，法蘭西才恢復共和國（所謂第三共和國），踏上議會政制的軌道。但第三共和國時代的議會，比起它的大革命時代的國民大會來是遠爲落後的，雖然表面上推行了普選制，但實際上常是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政客，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者、及所謂社會主義的投機家和工會官僚們玩弄政治詭計，鉤心鬥角，追逐權利的舞台。因而所謂『議會把戲』，在法國會議中表現得特別露骨。也正因此，法國的議

會是最爲糾紛的，由它產生的行政機關是最不穩定和無能的。所以在希特勒輕輕一擊之下，法蘭西的民主帝國就崩解了。這次大戰後依靠英美而重新恢復的『第四共和國』，重新恢復的民主議會政制，其所表演的仍舊是過去議會的老把戲，因而重演其過去的糾紛，所產生的行政機關也重演其過去的無能與不穩定。這充分證明：法蘭西除了用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來代替現時的議會政制外，勢將陷於法西斯專政的悲劇之中。

德國的議會，是由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產生，即佛蘭克府的國民會議。但因為德國資產階級的卑怯，這個會議僅在歷史上表演了一下軟弱無能的諷刺後，就烟消雲散了。直至普法戰爭後，畢斯麥在工人運動的威脅之下，才召開國會，恩賜資產階級以『參議權』。所以在霍亨索倫王朝的末期，表面上雖號稱君主立憲，但德國的議會始終是君主貴族的附屬物，不會發展到英美資產階級的那樣的議會政制。第一次大戰末，德國的工人和兵士暴動起來把威廉第二攆走，並成立了一些蘇維埃，德國資產階級依靠着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的領袖們之助，才熱心起來贊助民主共和國，召集國民會議，制定『威馬憲法』。然而這已遠落在歷史車輪之後了。因為那時，德國除了走上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外，就只有法西斯的道路。結果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威馬憲法及其議會政制不過是替希特勒準備其踏上政權，造成這次戰禍的悲劇而已。

俄國的議會政制，正如俄國的資產階級之接觸政權一樣，不但是最落後的，而且也是最短促的。這是因為俄國資產階級先天的怯弱，自始就害怕民主主義，害怕民主的議會政制。但俄國的工人階級，却與之相反，不但一開始就接近社會主義，并且還堅決地要求實現徹底的民主主義。所以在沙皇專政底下，堅決主張召集立憲會議，成立共和國的，不是資產階級，反而是工人階級及其影響下的農民。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工人和兵士摧毀了沙皇政府，成立了蘇維埃，俄國的資產階級才勉強承認共和國，接受政權。

但這個資產階級（以米留哥夫爲代表）還企圖建立一個不要議會制的共和國，一再延期召開立憲會議。也正因此——工農兵的民主蘇維埃得以迅速地發展，因而在資產階級的民主立憲會議剛要召開之前，無產階級便踏上了政權了。於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蘇維埃政制，便直接地跨過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政制。這不但把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議會政制與社會主義民主政制緊扣起來，創造了另一典型，而且替東方的落後國家指示了一個極可寶貴的先例。

由上面略敘英美法德俄幾個國家的議會政制發展經驗看來，我們可以得出底下幾個主要的教訓：一、民主議會的政制，絕非由於和平談判，而是在羣衆反抗君主專制或外來壓迫的過程中形成起來的。二、這種政制雖然是資產階級唯一合理的統治形式；但這個階級本身往往不願意運用這種政制，甚至害怕接近這種政制。三、因此，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政制，只有在羣衆繼續推動和壓迫之下，才能獲得發展和完成。四、當這種政制發展到完成時，它一方面充當了籠絡工人貴族的羅網，同時又變成了少數財產寡頭的御用機關，除了用社會主義的政制來代替它外，就要醞釀法西斯專政的災禍了。五、在較落後的國家中，這種政制實現是極短促的，然而它的運動又是推進另一新的政制——社會主義的民主政制加速產生的動力。西方先進國家在議會政制的經歷上所表現的這些教訓，都是值得我們東方落後國家的人民十分注意而必須加以接受的。

我國議會政制運動的教訓

我們的議會政制或憲政運動，比起西方先進的國家來，只是一種諷刺，然而並不是沒有教訓的。

戊戌維新運動同時也就是一種憲政運動。但這運動的領導者，只是在幕後推動光緒皇帝去捨命發佈維新命令，却完全不會注意到召集一個民主的議

會來團結各級人民代表來擁護這一運動，加強這一運動并以此去抵抗反動勢力的壓迫。這一點雖然不是戊戌維新失敗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失敗原因之一。戊戌維新的失敗招來了義和團的暴動，而義和團的暴動又招致了八國聯軍進攻的慘禍。滿清在這種慘禍之後，就是最頑固最反動的西太后也被迫着不得不把她的最憎惡并親自取泮了的戊戌維新政令重拾起來頒佈，宣言準備立憲，成立了資政院及諮議局（即現時的參議會）之類，以圖苟延殘喘，奈爲時已太晚，——這又證明反動的統治者，總是要到迫不得已時，才肯準備採用一點民主政制的形式來敷衍搪塞的。

在另一方面，當時的同盟會，從戊戌政變中取得教訓，決心用革命手段來推翻滿清的專制政府，這一點是完全正確的。但該會的領導者們，除了政綱上的缺陷及忽視農民羣衆力量外，對於當時已經發動的憲政運動不去參加，不去推動，不提出像普選國民會議一類的口號去號召各層人民起來參加政治鬥爭，而專注意於軍事暴動（實際上許多暴動是冒險的），致使憲政運動完全落在接近康梁思想的一班改良主義者手裏，這不能不說是鑄成後辛亥革命形成流產失敗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宣佈了共和國，但沒有認真立刻召集一個普選的議會以團結并集中全國一切民衆的代表們來支持它，只是忙於同袁世凱進行談判協商，這無疑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民國二年初雖召集了國會，但這個國會的產生并非由於普選，所以它的構成份子——議員，除了一部份同盟會的老會員外，絕大多數是投機取巧的官僚政客（尤以清末康梁的立憲派佔優勢）；而從下層民衆出來并能代表民衆利益的份子，簡直絕無僅有。因而這個國會也就成了一班官僚政客們玩弄議會把戲的政治交易市場，以致袁世凱輕易地用威脅利誘的種種手段馴服了大多數的議員，最後則解散了它。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總統，這是當時國民黨領袖們公開號召重新召集一個普選的議會來動員民衆，收拾時局的好機會。但不此之圖，他們專門

從事於所謂「護法」運動，以致鬧得烏烟瘴氣，形成我國歷史上一個最紛亂最污糟的時期。而在這時期內，我們的議會的醜態，它的奇形怪狀，也就表演到了聞所未聞的程度。至於袁世凱之召開「國民大會」來「選舉」自己作皇帝，曹錕之賄買「議員」（所謂「豬仔」）來「選舉」自己作總統，那更是我國議會史上最最惡毒的諷刺了！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與共產黨一致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反對北洋軍閥的軍事專政，對抗段祺瑞（執政）的「善後會議」，這在當時的政治上是適合時宜的。但人們既不會將國民會議與其他的民主任務（如對外民族獨立、土地問題、改善工人地位等等）密切地聯繫起來，同時對於產生此種會議的普選制又沒有明確規定（他們以所謂職業團體的選舉代替了普選選舉），最壞的是，甚至除了發表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的宣言，在很短期間內鬧了一下「促進」運動之外，就不聲不響地把這一國民會議擱置起來了！這又證明人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政治意義，直到那時還是一部不會打開的書。

至於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悲劇中所建立起來的軍事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十餘年來雖然屢次宣佈要召開國民會議，成立憲政，但直到「八一三」抗戰後，還只能以「參政會」來敷衍！這就不禁叫人又回憶起滿清末年當權者的「立憲」的故事來了。至於現時正在準備召開的「國民會議」，究竟與辛亥革命後的某種「國民大會」有何種不同，也不禁令人大起猜疑。

如果綜合上敘我國的會議政制運動或立憲運動看來，底下的幾點教訓是顯得特別注意的：一、我們的專制政府（從滿清到現在）對於民主的議會政制都是極端仇視的，倘使被環境迫到不得已時，即製造一個虛偽的議會形式來敷衍（如諮政院、善後會議及參議會之類）；假如有必要時，則製造一個假國民大會或國民會議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二、我們的資產階級比起西方的前輩來，更害怕民主的議會政制；而我們的政客們，平時既不敢要求民主的議會政制，不願實現普選的國民會議，但一遇到某種形式的假議會出

現時，又趨之若鶩，視為政治交易的絕好市場。三、民主的國民會議，沒有廣大下層羣衆的有力推動，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依俄國的經驗，這種會議的實現又將促成另一種更高級的民主政制的到來。這些教訓都是從痛苦中，甚至災禍中所鑄造出來的。假如想要推進民主改革運動的人們不理解這些教訓，不接受這些教訓，不管他們主觀上如何誠心誠意，但在客觀上總是要成爲民主改革運動的絆腳石或罪人的。

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與各方的態度

現時當權政黨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其根本作用，我們在本文開始時已經指出。但據當局歷次的宣告：是爲了完成憲政，「還政於民」，因而規定這個「國民會議」的任務只在「通過憲法」，并根據「憲法」來改組政府。但像這樣的「國民會議」究竟能否「還政於民」，能否改組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爲使大家了解，還值得費點時間來分析一下。現在就讓我們將這個問題，「國民會議代表」的產生及其構成份子來略加檢討吧。

大家總還記得，現時的「國民會議代表」是遠在十年前產生的。而產生的方式，名義上雖說是「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憲法案第二十八條），但實際上却與此相反。因爲一千七百名的「代表」當中，即有五百名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由國民黨政府直接指定的。其餘的一千二百名表面上雖經由民選，而實際上不是各級黨部暗中操縱，就是公開圈定的。所以這次「國民會議的代表」，只能算是國民黨的代表，與人民大眾是絕少關係的。以這樣的「代表」來開「國民會議」，至多只能算是國民黨代表的擴大會議。以這樣的「會議」來「製定憲法」，「還政於民」，「改組政府」即令人感到氣憤，至少也要感到滑稽。

誠然，政府當局已迭次要求共產黨及其他黨派遣派若干代表及所謂社會賢達參加，企圖以容納各黨各派的代表及「社會賢達」來表示這種「國民會

議』是代表『國民』的。但即令如此，這個『會議』仍然與一般的『國民』無關，至多也不過是國民黨的代表們與某些在野黨派的代表們之一個聯合會議而已。由這樣的會議來『改組政府』，或者可以稱之為『聯合政府』，但絕不能稱為人民的政府，更談不上『還政於民』。

所以無論從任何方面說，現時國民黨政府當局所要召開的『國民會議』，是名實不符的，即以現時歐美各國一般民主議會的標準看來，也未免顯得太過諷刺。這就無怪乎一般人民大眾對之『表示冷淡，不感興趣』了。至於共產黨及其他黨派現時對於這個『國民會議』所採取的態度，也是應予以批評的。

據中共發言人王炳南的鄭重聲明：『張家口之佔領及國民黨之片面決定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大，乃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表示』。從這『聲明』看來，共產黨對即將召開的『國民會議』并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場上根本反對它的不民主，它的虛偽性，而只是指責國民黨不應在『張家口之佔領』後『片面決定』『召開國大』，以為這樣便是『政府決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後表示』。假如國民黨不佔領張家口或在另一種條件下召開同樣的『國民會議』，共產黨是不會拒絕參加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共產黨在過去的『協商會議』中早已不反對這個預定的『國民會議』，它所要求的只是多派幾個代表來參加這一『會議』，并在未來的『改組政府』中多佔幾個席位。所以爭來爭去，討價還價，總是不出乎對『國民會議代表』及『國府委員』要佔多少的問題；而對於這個『國民會議』本身是否民主，由這樣不民主的國民會議是否能產生民主的政府，則早已置之度外了。其他的黨派，如民主同盟及青年黨的態度，也差不多是如此。這就證明：我們現時所謂民主的黨派，對於真正民主的國民會議，民主的政制，并不感到興趣。而它們所最感興趣的，倒是國民會議代表及國府委員的多寡，至於這個『會議』和『國府』本身之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只好任其自然而已。民主云乎哉，原

來如此！

由此，我們更加有理由說，如果人民大眾自己不積極起來爭取民主的改革，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民主的改革及民主的國民會議是不會實現的。中國的民主改革運動，民主的議會制運動，還是要重演過去的醜劇和悲劇的。因此，我們希望人民大眾，尤其是真誠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而服務的人們，應當用自己的頭腦來思索問題，用自己的行動來解決問題，首先要積極起來，爭取民主的國民會議，以推動一般民主改革之實現。

人民所需要的國民會議

但我們人民現時所急切需要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如果再用一句簡單的話來答覆，就是『普通選舉而具有全權的國民會議』。

因為我們國家現時所處的境地實在是太艱險了，我們人民現時所遭受的苦痛實在是再難忍受了！抗戰八年的結果，日帝雖被打倒了，但國家仍然處於半殖民地的困境；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因缺乏土地及遭受千百種的剝削和壓迫，愈來愈陷於死亡線上；千百萬的勞工愈來愈瀕於飢餓和奴役的深淵；國內弱小民族則因種種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常起暴動（請參考求真一卷二期一六一—一八頁）；貪官污吏更橫行無忌，任意魚肉人民；尤其是國共兩黨則不顧一切地繼續進行極慘酷的內戰；——這表示我們的『對外民族獨立問題』、『土地問題』、『勞工改善問題』、『肅清貪污問題』以及當前的『國共紛爭問題』等等，都迫切地，急不容緩地等待解決。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國家民族才能從現時極端艱困、混亂、腐惡和苦痛的深淵中救拔出來，踏上解放的復興的大道。但要認真解決這些問題，在現時只有立刻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

所謂普選，就是按照一定的年齡，不分男女性別，不受財產限制，人人都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并由直接和不記名的投票進行選舉。因為只有由這樣

的普選制來產生國民會議代表，才能杜絕任何的指派圈定，防止黨派的把持操縱。也只有如此，才能集合并集中全國一切有能為而又能代表各層人民利益的代表們於一個國民會議，來認真討論和決議國家一切重大而迫切的問題。

所謂全權，就是由這樣選舉出來的國民會議，不受任何干涉，任何限制，有權自由討論，議決和公佈任何重大問題，乃至制定國家根本憲法（註），并具有全權推選行政機關（包括司法機關在內）來執行。如行政機關違背決議案或執行不力時，國民會議得隨時重選或改組之。對於任何行政官吏，如發見其違害人民利益，或貪污腐敗時，國民會議得隨時議決予以罷免或懲戒之。只有這種全權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和利益，從上至下地實行民主改革（如民族獨立、土地問題、改善工人地位等）實行改變一黨專政的官僚制度，使整個國家走上現代的民主化。也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解決當前國共兩黨間的嚴重糾紛，使它們在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處置。」（請參閱求真第二期二十一頁）

最後，實現此種民主國民會議的前提條件，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因為只有在這些前提條件之下，人民才能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發表自己對於國事的主張，各個政黨才能自由宣傳自己的信仰和政綱，好讓人民自由選擇。也只有這樣，在進行選舉時，人民才能自由選舉自己的代表，各政黨才能自由推出自己的候選人，用自己的政綱去自由爭取人民的信任和選票。所以爭取一般的民主自由，又是爭取實現民主國民會議的絕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結 論

歷史現在已明白地將國民會議問題提出於我們的議事日程了。各階層各黨派都將要在這一問題上受到一次難以掩飾的『民主測驗』。專政者將不可

免地要繼續以虛偽的國民會議來應付，來掩飾其專政的實質；投機的黨派或政客們，定將忽視民主的國民會議，而以某種虛偽的國民會議為滿足，企圖從中弄玩議會把戲，追逐私利；但真正為人民大眾的解放利益而服務的黨派或革命家們，也必然要反對任何虛偽的國民會議而為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而奮鬥。後者一定是會勝利的，因為這是人民大眾所需要，人民大眾最後一定會擁護他們的。

在為此種民主的國民會議的奮鬥進程中，人們應當記取西方先進國家議會政制發展的經驗（尤其是俄國的經驗）及我國自己的教訓，藉作指南。有了西方先進國家的經驗和自國的教訓作指南，民主改革運動（連國民會議運動在內）一定要達到勝利的彼岸，——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超民主主義時代正在等待我們呢！

一九四六年十月。

註：許多人都喜歡談憲法，殊不知沒有民主的國民會議，民主的憲法是不會產生的。即會產生，如果沒有民主國民會議去監督其施行，也是等於空文。所以作者認為當前的急切問題不在憲法，而在於能夠制定民主憲法的民主國民會議之召集。

編 者 的 話

這一期，不得不把『關於老孔思想問題的論爭』暫停發表，稿擠是最大原因；另一原因，是：我們從來稿中，畢竟沒有發見重大的新的見解。

爲了稿擠，也祇好把巴爾扎克的『大壩樓』臨時抽出，留待下期刊登。這要向譯者謝勻先生以及愛好文學的讀者，特別致歉的。我們希望讀者諸君提出意見；提出值得討論的學術思想問題。這一類來稿，我們是異常重視，并儘可能的把它發表與公開答復。

此外，對於各地報導文章（例如本期發表『今日的慶西』那一類通訊稿），我們同所歡迎！

編 者 十 月 卅 日

蘇聯的危機及其歷史的回顧

劉少嚴

最近從莫斯科方面傳來許多令人迷惑的消息，如『肅清』、『舞弊』、『貪污』等等，令我們這個一貫落伍，一貫對蘇聯缺乏了解的中國也開始睜開驚訝的眼睛了。當然，這種反應必須分開來談：那些對蘇維埃制度從沒有好感的統治者，是懷着幸災樂禍的顯著動機來注意這些事情的；但另一方面，那些所謂『蘇聯之友』，因為太慣於把蘇聯視爲一個『美化了的實體』，太慣於抹煞蘇維埃制度的內在的矛盾，所以這一次却似乎狼狽地以沉默來掩飾他們內心的惶惑了。昨天人們還在用抒情詩的筆調來歌誦『經濟原子彈』，但二十四小時之後，忽然又來了許多不良的消息。假如真正是一個善良的『朋友』，就不僅限於『揚善』，至少也應該對不幸的事實具有正視的勇氣。可惜，直到今天，我們只看見資產階級輿論界的惡意的諷刺，却看不見『蘇聯之友』們作任何『善意』的解釋。只曉得歌誦一個制度的優點而忽略了牠的弱點，這等於只曉得擁護一個成功的真理而踐踏一個倒臺中的真理一樣，這種友誼未免過於廉價了，一個真正愛好蘇聯，愛好真理的人是不怕說出真理的！我們就想根據這個原則，把這個工人國家發展的真相，對中國人民作一種初步的介紹。

一 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

自從克林姆宮的主人一次再次宣佈蘇聯的社會主義已『不可克服地完成』了，甚至已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後，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便引起了一種異常含混不清的解釋。本來在這以前，從『共產黨宣言』的兩個起草人——直到一九二四年又有句百爾十推克爾人，也門恩志巴士曾巨變了解馬高丹

於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界限，在整個星球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計劃經濟，這種經濟制度的前提條件——即整個地球的經濟連結、互相依賴與分工合作——不僅是資本主義所造成的，而且也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的結果，人類既然從血統的單純結合進步到散漫的地域結合，再由散漫的封建地域進步到民族國家，則從這種民族國家進步到整個星球的有計劃的、科學的經濟結合，就成了一個不可抗拒的趨勢了。從這裏就可以瞭解，社會主義與過時的民族國家界限是陷於不可和解的衝突的。當然，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二十四小時內就能夠在整個地球內實現的，牠是跟着不平衡發展的公律，首先在資本主義最弱的一環取得勝利的，一旦牠在某一國家內取得初步的勝利，便不能停留，除了一方面藉計劃經濟鞏固牠的既得陣地之後，便繼續進行把這一革命推行到底——一直到整個星球都被征服爲止，只有在整個星球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才有實現的前提條件。假如『一月革命』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蘇維埃與臨時政府）兩種權力在一個國家內部對立的典型例子，則『十月革命』的勝利就是這兩種權力在世界範圍內對立的表现，『兩重政權』無論在國內或國際規模上，都只是新舊兩種制度，兩種權力的衝突達到最緊張的程度的反映。這種生死衝突必須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不能限制在一個國家內的又一深刻的證明。

但不幸近二十年來，這一科學的古典的社會主義觀念却爲一種保守的、開倒車的『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理論所代替了，這種理論認爲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甚至一個落後國家（？）內從容地實現的，因此人們便創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共處在字句去厘觀念，人門希著『獨祭聯盟』或『聯合

『的世界憲章能批准世界兩重政權的永恒性，這正如一九一九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希望藉魏瑪憲法來批准德國蘇維埃與資產階級國會兩重政權的永恒存在一樣，新魏瑪憲法已引導到法西斯主義，我們有什麼理由能否認『聯合國』憲章會引導到美國獨占家對蘇聯的征服呢？所謂『一國社會主義』無非是把一個過渡階段——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代替社會主義本身。把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在一起而已。從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從來就把國家的『凋殘』、『開始死亡』視為社會主義實現的必然條件，而現在，正當蘇維埃國家機關變成空前官僚主義硬化的時候，人們却宣佈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實現了，甚至已進入『共產主義』的階段了，按照克林姆宮領袖們的定義：蘇聯不僅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而且已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了。今天，當這個動人的宣告已近十年之後，克林姆宮却迫得要頒布了一道又一道肅清令和大規模懲罰貪污舞弊的命令，這無異親自把『一國建立社會主義』的公式完全埋葬了，因為一個蠢驢也不會相信貪污舞弊是社會主義！

無論人們怎樣誇張和狂妄的描寫，蘇聯終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工具，而任何過渡性的制度，牠本身是充滿矛盾的，尤其是當牠建立在一個落後環境中的時候。

二 蘇維埃國家的基本矛盾

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給沙俄的經濟下了一個定義：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歷史條件的一種特殊的遇合，一個落後國的工人階級却可以領導廣大的農民首先奪取了政權，從資本主義最脆弱的一環中燃起了社會主義的烽火。但俄國無產階級的輕易成功並不能立即改變沙俄那一份遺產的性質——落後和貧弱。牠迫得要繼承這一份遺產，把自己的政綱建立於牠上面。從這裏就生出一種過低的生產力與高度生產關係（計劃經濟）

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在生產過程中就是：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迫得要與資本主義、小生產制等落後方式並存，甚至發生依賴的關係；表現在分配過程中便是不僅容忍商品市場的繼續存在，而且還容忍計劃經濟內部一種不可避免的分配不平等的存在。天真的理論家慣於把問題放在理論的真空空中來解決，他們不否認蘇聯這種過於明顯的矛盾，但他們却說：正因為蘇聯具有一個高度的社會關係，牠才有足夠的能力來培養和促進那種貧窮的生產力的發展，換一句具體的話來說，蘇聯可以沿着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年計劃一直達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全勝利。純理論的推理往往把時間和空間的因素排在第二、三等的位置。但一種忽略了時間和空間的理論還有什麼價值呢？真理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當我們考慮到蘇聯的命運時，我們必須首先了解她所處的環境不僅是落後，而且還是孤立的。因為落後，所以生出上述那個基本的矛盾，雖然經過了三個五年計劃，又雖然官方已宣布，社會主義『已不可克制地完成了』，蘇聯直到今天仍然在生產上遠落在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後面，這證明即使從理論上說來，蘇聯實現她的社會主義，即、超過資本主義的生產，還需要一個並不很短的時間。但這個時間的因素與孤立的地位却形成一個不可解消的矛盾，資本主義是不能長期忍受蘇聯的存在，牠不能以包圍而滿足，因為資本主義本身也在爭取牠喘息的時間！過去三年五年計劃所造成的偉大成就終於埋葬在希特勒的戰火中，第四個五年計劃剛剛宣佈又受到新的戰爭的威脅，這起碼重新提醒我們一個苦的真理：社會主義不能從容地在一個國家，尤其是一個落後國家內完成的。而且時間的因素不僅表現在外在的矛盾中，還無比深刻的表現在蘇維埃內部的矛盾中。由於孤立和缺乏任何先進國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援助，蘇聯不能迅速的實現徹底工業化與農村電氣化的計劃，結果，蘇維埃內部的基本矛盾不僅沒有解消，而且採取威脅的形式擴大起來，而這一矛盾的集集中的表現便是：分配的不平等愈來愈嚴重，分配者——官僚層的貪婪、腐化、舞弊和特權的享受與

廣大缺乏消費品的人民之間形成一種難於忍受的對照。只有詳細地、澈底地瞭解蘇聯這種內在危機的發展過程，我們才能解釋過去二十餘年來，蘇聯何以頻頻發生那種令人迷惑的黨爭、肅清、審判案、槍斃、貪污、舞弊……。凡事都不是偶然的，只有那些缺乏頭腦的庸夫俗子才把一切嚴重的社會現象或歷史事件還原爲偶然或「神祕之謎」。

三 軍事共產主義與新經濟政策

革命後蘇聯立即進入一個嚴重的帝國主義圍攻和內戰的時期，這個時期延長了三年之久，爲了應軍事上的需要，布爾什維克黨實行一種對於消費品的嚴格的有計劃的管理，所有大小的生產機關都加以沒收和管理，糧食徵集並進行有計劃的分配。這是一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對付戰爭的一種不可避免的方法，沒有牠也就沒有勝利，這種方法被稱爲軍事共產主義。但這種方法顯然是產生於一種極端落後和貧弱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牠只不過盡了有計劃地將貧乏的資源加以管理和分配，維持前線和城市的最低限度需要而已。結果爲了維持軍事工業而停頓了日用品的生產，城市向農民的徵集糧食和原料逐漸依賴於不值錢的紙幣和軍事強徵，因爲失去了對生產者個人利益的刺激，農民便自動地縮小了播種的面積。一九二一年內戰告終，俄國的工業生產總額僅及戰前的五分之一，穀物收穫的總額僅八萬一百萬担，跌至一九二二年之五萬三百萬担，對外貿易從二十九萬萬盧布跌至三千萬盧布。這表明俄國的生產力低落到這個程度，牠的提高還要依賴市場競爭與私人利潤的刺激，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能够保持和發展還不得不依賴對這種私有經濟的讓步！這就是後來轉入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原因。

新經濟政策的主要特點就是：（一）改變城市對農村的強迫徵集爲糧食稅，使農民可以得到一批剩餘的糧食，經過市場去追求私人的利益；（二）讓回一部企業於私人資本；（三）確立一種有組織的貨幣制度。這個政策實

現的結果，城市工業到了一九二六年已達到戰前的水準，較之一九二一年增大了五倍，農業的復興也迅速發展。但從這裏生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出來：怎樣保持城市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平衡關係，以及保持國家計劃經濟對私人資本的絕對優勢？這個問題的提出證明新經濟政策並沒有解決蘇聯的內在矛盾，只是在一個新的基礎上把這種矛盾更尖銳的提出來。生產力是相當恢復了，但私人資本與農村中的富農經濟也跟着生長了，這種農村與城市的新興的資本主義傾向愈大則國有財產與計劃經濟的基礎愈有被侵蝕之虞。對外貿易的國家獨占雖然暫時剝奪了這種危險傾向與國際資本主義取得直接聯繫的機會，但假如讓這種傾向繼續發展，則牠對於蘇維埃整個制度將造成致命的威脅，而且這種威脅已因爲德國革命的連續失敗、蘇聯的地位一時陷於孤立、國內人民陷於失望和疲倦，增加到空前的程度了。

四 官僚主義的生長

目下一班時行的「左派」理論家總喜歡把一種既成的事實當做當然的現象，加以發揮和讚揚。他們對蘇維埃制度的瞭解那樣淺薄和可笑，竟以爲布爾什維克黨對整個國家機構之單一的統治以及這個黨內部一切反對派聲音的扼殺，是一種世界上最民主的表現。事實上從馬克思、恩格思到列寧，他們一貫的理想總是了解無產階級專政之爲一種最徹底的民主，就在於牠容許廣大的工農民衆保有出版、言論、集會、結黨的最低限度的自由，列寧所想像的最初的蘇維埃不是由一個布爾什維克黨獨占的，而是容納一切工農的黨派（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競爭場所。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列寧幾次提議一切政權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導的蘇維埃，就是從這個觀念出發的，他設想假如蘇維埃能取得全部政權，布爾什維克黨可以當作一個反對派，經過蘇維埃的民主取得牠的政綱上的勝利。十月革命後，有一個短時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尙留在蘇維埃內部，牠們還享有出版和言論的自

由，社會革命黨左派甚至與布爾什維克黨合作共同成立政府。至於布爾什維克黨內部的民主集中制則實現得更徹底。在十月暴動前那樣嚴重的關頭中，黨內尚容許進行最激烈的論爭，尚容許有猛烈反對暴動的意見存在（以季諾維也夫、加民諾夫為代表）；布列斯特和約的論爭是十月以後的又一次最嚴重的試驗，黨內當時發生一個激烈的極左派反對列寧，這種事情，這種對於民主集中制的忠誠的履行並沒有妨礙十月的勝利，也沒有妨礙列寧的正確主張通過。

這都是十月革命初期的情形。但不幸徹底的民主制度在無產階級的基礎上正猶如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一樣，是以穩固和雄厚的物質條件與社會條件為前提的。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那些最貧乏的國家往往就是最不民主的國家，而阿美利加的民主和自由以及十九世紀的一般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純粹是工業繁榮與源源而來的超額利潤之賜。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在階級基礎上與資本主義國家完全不同，但生產的物質力量對於牠所起的作用仍然一致。社會主義革命發生於美國與發生於俄國或中國，其後果是非常不同的。在美國的最完備、最雄厚的生產條件之下，美國無產階級將毋須乎害怕任何反動勢力足以動搖牠的統治基礎，正因為如此，牠將可以在未來的政權內部實現最徹底的民主和自由，任何工人的黨派（從社會黨到共產黨）都可以得到公開活動和競爭的機會。

俄國當時的條件完全不同。我們在上面已指出過，俄國的無產階級是在極端貧困和殘破的經濟基礎上取得政權的，如果我們留心過去的文件，我們就知道，三年內戰幾乎是在絕望的情形下進行的。占人口中大多數的小生產者（農民）都逐漸因為糧食的強徵實行怠耕和反抗了，城市工人已因為工業停頓和缺乏口糧而開始不滿，就在這種絕望空氣的鼓勵之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右派最初與資產階級勾結，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陰謀，跟着社會革命黨右派也舉行暴動，湯波夫的農民也暴動起來，烏克蘭也成立了一個無

政府主義政權，最後，而又最嚴重的便是克羅斯塔的海軍叛亂，甚至布爾什維克黨人也參加在裏面。這是在一個貧乏的基礎上所引起的工農同盟破裂的最深刻的危機。結果，蘇維埃民主迫得一步一步的縮小，最後只剩了一個布爾什維克執政黨，而這個執政黨也在這種外在的影響之下，為了避免因為內部鬥爭足以引起危險的震動，暫時的禁止黨內派別活動了。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本來應該結束了過去內戰那一段夢魔似的生活，蘇維埃政權已相當穩固了。但新的危機生長起來。經濟復興帶來了新的威脅，富農與耐普曼（新經濟人）的生長已開始侵入蘇維埃和黨內的黨內，而蘇維埃民衆的普遍疲倦和失望也在上層負責人中找到迴聲，這些負責人在分配過程中逐漸生出了享受特權與貪圖苟安的傾向，一個官僚層不僅已形成，而且已開始硬化了。在過去內戰的不穩定期間所實施的一切權宜的政策都成了官僚層的良好支柱。

因為交通與工業的條件不足，民軍制度暫時讓位於常備軍，因為反動派的恐怖活動，造成以赤卡為中心的秘密警察，再加上文化基礎的貧乏與蘇維埃及黨內民主的暫時縮小，使得蘇維埃官僚在一個短促的期間內肆無忌憚地滋生起來。他們顯然是立足在蘇維埃政制的負數上面的，他們為了保持既得的特權和地位便結成一個共同的集團，把過去內戰時期所造成的一切權宜的結論加以理論化，把蘇維埃從沙俄所繼承的全部遺產加以美化，最後還從這部分可憐的遺產中把最反動的一部分——野蠻的官僚主義傳統一點一滴的加以改裝。於是從「一國建立社會主義」開始一直走到沙文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

五 三個月五年計劃

對於新經濟政策所引起的危機，當時在蘇聯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兩種明顯的傾向：當權派（以史太林——布哈林為代表）認定蘇維埃工業化的前提條件是發展農民的小生產，只有農民們富裕起來才能提供國有產業以必需的資本，所以他們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農民們努力致富！」。另一個傾向：

左派反對派（以托洛斯基爲代表）則認爲工業的發展已遠落在農業的發展之後，由於工業品不足已造成了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剪刀形』，農民從革命所得的利益還不足以償付國家製造品的價格。結果造成兩種危險的後果：富農趨向於農產品的囤積與投機並產生黑市的活動，迫得國營企業也要同私家商人搜購原料。十月革命後，蘇聯的農民經濟愈形分散，成了二千五百萬獨立農戶的小商品經濟。而在這種小生產的基礎土，必然按照社會原有的法則

，隨着農業的復興而產生新的分化，那末所謂『農民努力致富』無非是使富農的生長合法化而已。一九二五年，蘇聯政府公然承認農業中僱用勞動和租借土地爲合法，這是一個最好的證據指出政府所走的是『富農路線。』這個路線只有加深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危機。於是反對派直接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來：（一）恢復內戰時代暫時限制了黨的民主，使民衆的真實影響能直接在黨內表現出來；（二）實行加速工業化的計劃；（三）依賴貧農和僱農實行集體化，向富農徵收麥子，充作工業化的必需資源。這三個辦法不幸被黨權派視爲『異端』，他們以對左派加倍的攻擊來答覆『黨內民主』的要求；對於集體化，直到一九二七年，莫洛托夫尙說：『我們決不能『跌進』貧農的幻想中去，以爲廣大農民羣衆的集體化是可以實行的。』他們把工業化計劃譏爲『超工業化』的『幻想』。但富農勢力的迅速侵入地方蘇維埃與糧食恐慌的打擊畢竟迫使黨權者向左盤旋，他們於一九二七年開始擬成一個極度懦弱的五年計劃草案：工業生產的增加規定每年爲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五年終了時國家總預算只規定佔全國收入的百分之十六，而沙皇時代的預算，還佔百分之十八哩！在反對派的嚴厲批評之下，一九二八年，黨權派又採用一個新五年計劃，規定每年增加生產百分之九，後來又經過一度變換，第三次才起草一個正式五年計劃出來。但在這種胆怯和悲觀的精神中寫成的計劃剛剛得到第一步的成功，人們便立即跳到冒險主義與輕浮樂觀的極端去：規定每年增加生產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並提出『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口號來。

在農業方面人們也突然從鼓勵農民『努力致富』走到強迫徵收和短期內全部集體化，我們不要忘記，直到一九二七年來，人們還在譏笑集體化爲『空想』哩！這種跳躍是一切經驗主義者的本性，現在我們試將一九二八年以後幾個五年計劃對蘇維埃經濟的影響概略的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蘇維埃制度本身的優點就是牠能保證一種效能甚大的計劃經濟實施的可能性。俄國本身雖然落後，但她却保有莫大的富源，這一點已提供了一個經濟發展的前提。但國家愈是落後，則各部門間的計劃愈需要和諧和平衡。最後分析起來，蘇維埃的國有企業主要是從農村有產者的不斷剝奪中得到資本積疊的泉源，這裏首先就要保證城市工業與農民經濟間的和諧的發展：一方面進行集體化，另一方面却要使集體化與工業化保持適切的比例。其次蘇維埃工業化的資本是有限的，各部門間的生產必須保持平衡。工業化的首要條件是發展重工業，但重工業的發展必須與輕工業保持平衡，因爲人民的生活水準如果不隨着工業化的發展而提高，則不僅違背社會主義建設的原理，而且也生出了勞動生產效能低落的後果。不僅重工業與輕工業間，即工業各部門間如果失去適當配合，也大大地減輕計劃的意義。

過去幾個五年計劃的最大的意義是證明：在資本主義沒落期間，當全世界名資本主義國家正苦於恐慌和生產低落時，蘇維埃的計劃經濟却能使工業生產增加百分之二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假如這個五年計劃不是在冒險主義的鞭策之下，而是在一種和諧和民主的指導之下進行，則其效果還要堅實和偉大。不幸採納這種計劃的當局昨天還頑固地否認這種計劃本身的效能，今天却迷信可以藉一根官僚的棍棒任意地把數字提高，結果，爲了取得可以實現這個誇張了的數字的資本，人們沿着兩條路線走：（一）增發虛布；（二）用『非常手段』剝奪『富農』——沒收農民的餘糧。前者是一種明顯的通貨膨脹的手段，凡是稍爲懂得經濟學原理的總明白：通貨膨脹的直接犧牲者是廣大的消費者；第二個手段則不僅運用行政手段消滅富農而且波及中農，這

種跳躍的唯一後果是重蹈軍事共產主義的覆轍，引起富農甚至中農的怠耕，貧農、僱農的失業與糧食恐慌的加深。蘇聯當局爲這種威脅所迫，突然宣布要實現牠過去所譏笑的集體農場計劃——在短期內實行全部集體化！這是在數字之上再任意地加上數字！

但問題在這裏：人們怎樣完成他的奇蹟呢？首先爲了滿足那種龐大集體化與工業化的要求，人們迫得把全部資本動員到重工業部門中，結果生出了重工業與輕工業間的巨大的不平衡，其次，各工業部門間也因爲瘋狂的鞭策顯出失去和諧，人們常常埋怨因爲缺乏和諧而把大堆未完成的材料廢棄了——一張桌面不能靠三根腳子來支撐呀！但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人們怎樣能够在文化落後、生活水準低下和生產設備不足的條件之下一下子把勞動生產力提高到適應這個虛幻的數字標準？爲了克服這一點，人們又迫得用計件工資的辦法，動員一切現成可用的勞動力去填補技術與文化的缺陷。廉價的勞動力在成本上勝過於效能甚大的機器，這是一切落後國生產者的共通常識，所不同的，資本主義生產者還略顧及市場的批評，不敢爲着數量而過分的犧牲品質，而蘇維埃官僚則因爲失去人民的監督，可以肆無忌憚地爲了先天的數字而儘量犧牲品質吧了。結果人們又常常埋怨一間新屋子往往因爲某種材料的不良而倒塌了。軍事工業，照理是應該最注重品質的，因爲牠的顧客是政府本身，但伏洛希羅夫也常常訴苦說：『你們給我們紅軍的東西，我們并不完全滿意牠的品質。』

但最不幸的情形還是那個短期內百分之百的集體化計劃。我們剛才已指出過：蘇維埃的農民經濟是一種散漫的小農經濟，俄國經濟的落後性和危機主要潛伏於這種數量佔絕大優勢的小商品生產中，假如讓牠自由發展，牠將在資本主義的舊軌轍上重新分化，而鄉村的貧農和僱農必然又被犧牲，爲了解決這個歷史性的威脅只有實現集體化，許多資產階級自由派所不了解的就在這個問題上（參閱求真第二期拙譯『戰後蘇聯之經濟』——跋）。但集體

化并不是說，把農民的牛、馬和雞集中起來。把許多零碎的適應於小生產的古老工具集中起來不僅毫無意義，而且也絕不能在生產上增加一點新的力量。集體化與機械化、電氣化是不可分離的，必須有足量的農業機械設備才能談到廣泛或『全部』集體化的計劃。當蘇維埃的工業化還剛剛開始提出追趕資本主義生產的口號時，牠是無力立即在農業中造成奇蹟的。蘇維埃當局所唯一能够做的只是把集體化的計劃與工業化的真實計劃配合起來，利用優越的機械組織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一步一步向那些小生產者證明：集體化的生產無論在質和量上都優於小規模的、小手工業式的個人農場。總而言之，只有機械化或電氣化加上說服才是真正健全的農業社會主義計劃。但蘇維埃當局却在一切前提條件缺乏的情形之下，命令每一農民加入集體農場。結果，農民們並不了解這種集體化的福音，他們只簡單的了解這是一種強迫沒收的詭計，於是他們大規模的把自己的牲畜和工具加以殺戮、毀壞和拍賣，據準確的估計：『全部集體化』的結果，馬的數量從一九二九年之三千四百六十萬匹，跌落到一九三四年之一千五百六十萬匹，即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牛的數量，從三千零七十萬匹，減到一千九百五十萬匹，跌落了百分之四十。豬的數量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羊跌落了百分之六十六。而且爲了對付農村這種消極和積極的反抗，有幾百萬農民被充軍、監禁、殺死。農具、牲畜與人口的喪失使農產物收穫大大減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五年正是大飢荒之年！爲了緩和這種危險的局面，蘇維埃當局第一步宣布集體農場有永久使用其土地之權，第二步承認各農場員可保有『小塊田地的經營，各塊田地有牠們各自的牛、豬、羊和家禽等』，這無異是『全部集體化』的可悲的退却。

六 新的分化與新憲法

如果我們不爲一些眩人的數字所迷惑，如果我們能仔細深入到現象的內容，則過去幾個五年計劃所造成的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工業化遠拋在虛幻的

集體化後面，輕工業受了重工業排擠，量犧牲了質。這種結果告訴我們：蘇維埃制度的基本矛盾並沒有解消，恰恰相反，牠在新的基礎上更無比地集中和擴大起來。生產領域之各種不平衡的發展必然深刻地反映於分配過程中，因為這兩方面同是受了蘇維埃官僚獨斷政策所支配的。許多工業生產的數字和無數蘇維埃的宮殿、大廈和歌劇院都依照命令實現了，但工人住宅的計劃只實現了百分之五·七，集體農場的農民仍然『同他們的牛犢和蟻螂一道住在老陋室裏』。所有交通工具、日用品、衣着和食品生產陷於不足狀態，所有動人的托兒所、娛樂場與療養病院的創設在計劃中所占的百分比過於渺小了，牠們只能滿足人口中的一個小部分的要求，誰來享受呢？要完滿地解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指出史達哈諾夫運動所掩飾着的計件工資制，在蘇聯人民中造成如何深刻的分化。

蘇維埃當局爲了彌補國家資本的有機構成過低的缺陷，不惜應用一種最落後的方法來鞭策蘇聯的勞動力：誰做得最多誰就能得到最大的報酬和特權，這也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結果，爲了讓自己的小孩能進托兒所，爲了一張旅行證，爲了一張戲票，爲了分得更多的口糧，爲了得到一間住屋，總而言之，爲了分享蘇維埃官僚的一點特權，在工人中引起了最激烈和殘酷的競爭。熟練工人排擠了不熟練工人，青年人排擠了老年人，男工排擠了女工，精壯的排擠了老弱的。工資的報酬遂分成許多等級。一個史達哈諾夫運動者收入往往超過下層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幸運的專門家往往可以支付八十個或一百個不熟練工人的工資。

集體農場的分化也沿着同樣的邏輯發展。許多曳引機駕駛人、管理聯合機的工人及其他管理者都在集團農場中享有自己的一塊小菜園、自己的豬、羊牛和家禽，普通集體農民則不但沒有這些『私人產業』，甚至還沒有自己的住宅哩！除此以外，在集體農場與集體農場之間也發生等級的現象了，那些得到國家特別照顧，保有充分的機械設備與資本的大集體農場自然得到更

大的『致富』的機會，於是產生了『富有農場』與那些大多數沒有機械設備的小規模集體農場的可憐的對照。

從這種分析裏，我們就不難瞭解何以一面是五年計劃勝利的宣告，一面是不斷的、規模愈來愈大的清黨、肅軍和審判案的排演。蘇維埃工人貴族的利益與廣大下層人民的利益，已隨着經濟的進展而引起更尖銳的衝突。經濟的提高必然繼着階級自覺的提高，廣大下層人民覺得必須把蘇維埃的民主恢復，把官吏的特權取消，把過去一切重新加以檢討才能保證下一階段的發展，但正因爲如此，蘇維埃官僚却更頑固地維護自己的地位，更害怕人民的干涉，結果形成了經濟發展與政治文化猛烈倒退的奇特現象。

如果我們沿着一九二八年以後的經濟建設路線，留心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則後者顯然是向下的曲線。在清黨、肅軍和審判案的掩飾之下蘇維埃與黨的民主內容逐漸被挖空，十月革命之花——老布爾什維克逐漸被消滅，依賴於格·別·烏與常備軍的軍事官僚專政逐漸代替了無產階級專政；在軍隊中，建立民兵制的黨網不僅已放棄，而且將民兵在軍隊中的比重減削了百分之五十一，恢復最反動的哥薩克騎兵隊，恢復十月革命初期所深惡痛絕地廢棄了的階級制——從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帥；十月革命賦予婦女的特權——墮胎令也廢除了，青年被剝奪了干預國家政務的發言權，婦女——青年——兒童又重重新回到神聖的家庭中，聽任家長的指揮；文化的自由創造代之以衙門的勒令；民族的獨立自主逐漸被專橫的大俄羅斯政策所扼殺，受害最深、受肅清最頻繁的就是蘇聯的第二個大民族——烏克蘭；最後，而重要性不稍減的就是加入『國際聯盟』的外交代替了世界革命的政策。

一九三六年通過的『世界上最民主的新憲法』是代替列寧時代的憲法的退化和墮落加以合法化而已。『各盡所能，各取所值』——計劃經濟加計件工資制——代替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原理；全體人民均『普

通、平等和直接」的選舉法——對農民人口的讓步——代替了依照階級和產業團體之選舉制；一句話，在空洞的「民主」外衣之下掩飾着的波拿帕專政代替了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民主政制。而波拿帕主義的最大特點便是依靠於「全民選舉」、「秘密投票」等「公正」的手段。

七 戰爭中的蘇聯

蘇聯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她之遭受納粹德國之殘酷的進攻，這是她長期孤立與世界革命不斷失敗的邏輯後果，這一點也雄辯地證明我們上面的結論：蘇聯的存在只是在世界規模上產生兩重政權的過渡局面，她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而不是牠的終結；不是她經過世界革命推翻世界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完結她，任何苟安的企圖都只是一種反動的幻想。希特勒的計劃就在說明這一點的真理。

任何制度，戰爭都是牠的準確的試金石。蘇維埃制度當然也不能例外。我們不要忘記當這個新制度被迫而受這種殘酷的試驗時，牠是受了上述官僚主義的嚴重災害的，內戰的英雄（以杜加且夫斯基為首的整個參謀部）、十月革命之花（整代的老布爾什維克，列寧的政治局——史太林除外）以及差不多所有舊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傳統都被人扼殺了，就在這種情形下，希特勒大膽向牠挑戰。但戰爭的結果却證明希特勒估算錯誤了，他太注意於蘇維埃制度的弱點而忽略了他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德國本身的脆弱性，他不知道一個蹩腳的工人國家却比許多資本主義國堅韌得多！蘇聯的國有企業在過去三個月五年計劃中所造成的成果雖然充滿缺點，但却足夠經得起一個持久和殘酷的戰爭。

當然，如果我們籠統地把這次戰爭的勝利視為無疵的結果而加以讚揚，這等於我們把過去計劃經濟的成果加以同樣看法一樣，這對於歷史的真相是無益的。軍事手段只是內政的延長。既然蘇維埃制度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渡物，則牠在和平時代所表現的，在戰爭、在巨大的危機打擊之下，只有表現

得更尖銳。

在德蘇戰爭的最初階段，敵軍迅速的佔領了歐俄的大半土地，這些土地都是蘇維埃的工業中心，這些地方的喪失等於喪失了蘇維埃全部工業出產的百分之五十。除此以外，還有巨量工業人口的死亡或被俘，結果引起了勞動力，尤其是熟練工的嚴重缺乏。這對於蘇維埃的生產不能不引起惡劣的後果。光是戰爭的頭八個月已喪失了納粹占領區的八千萬人口，前線兵員的補充還不斷從後方吸引大批大批的青年。結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蘇維埃當局大量的運用女工和童工。事實上戰爭剛發生一個星期之後，真理報已正式宣布：「在企業和辦公室中工作的婦女有一千一百萬人，在集體農場中工作者有一千九百萬人。」（一九四一年六月廿九日真理報）我們要知道：一九三六年，全蘇聯的女工才不過三百五十萬人哩！但光是動員婦女尚不能解決勞動力的缺乏，戰爭頭一個月，一九四一年七月，人們又決定動員十四歲以下的兒童進工廠。一九四三年七月，農業人民委員會納達可夫在湯包夫區的一個集會中演講說：「在戰時的今天，農田工作的主要部分是由少年男女的集體農民來完成。」（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真理報）據蘇聯官方的估計，戰爭的頭兩年工廠中的童工已由戰前八個月的一百萬增至三百萬，集體農場中的童工尚除在外面。普遍應用女工和童工所引起唯一嚴重的後果便是把原已低下的技術和熟練水準降得更低。這種低降的技術水準再加上生產管理員的無能、惰性和獨斷使戰時蘇維埃的生產力空前的低落。一九四一年二月，戰爭剛剛發生不久，在聯共十八次黨大會中正式暴露蘇聯維埃的工廠只運用了牠們的能力的三分之二、一半、甚至更低。為什麼呢？人們當然不會把原因說出來，但除了技術工人的缺乏之外，管理員的無能和貪污，却無論如何是個不可忽略的原因。關於這一點，在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中表現得更清楚。

真理報的社論不斷的警告個別的集體農民「規避他們的義務。」這就是說，集體農民們太注意於自己的一塊小菜園，太熱心於囤積糧食和做買賣了

。而這種保有私產的集體農民無非是變相的富農而已，他們故意拖延，甚至吞沒交納給國家倉庫的糧食，他們攔截了集體農場的一切管理責任，他們就利用這個地位逐漸致富，成了『百萬富翁』。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真理報報告：光是在一個縣分裏，就有一百一十一個集體農場的主任被撤職，另外某縣又被革除三十個。在黎亞贊郡委會全體會中，『諾窩·特列瓦斯克、沙波茲康斯克、烏可拉夫斯克、普龍斯克、特魯伯奧斯克、和其他許多區的黨領袖受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未能實現播種計劃。在基洛夫郡委會全體會中，『莫洛夫斯克、烏爾沁斯克、蘇維茨基及列卑雅斯克等區的領袖也受到相同的批評。』（一九四三年六月真理報）這些受批評、被撤職的領袖就是集體農場的『富農』。

上級管理員——官僚們的無能、失職、自私、貪污和『發國難財』與一般下層的人民的生活狀況，在戰時形成更難忍受的對照。

戰時軍事工業的生產吞沒了一切，過去和平時期重工業與輕工業的不平衡發展在戰爭中表現得更尖銳，一般消費品的生產差不多全部停頓了。人民簡直只能從手工業方面獲得少許的日用品。通貨膨脹與黑市的活動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更形惡化。他們除了靠半餓的配給口糧過活之外一無所有。真理報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指出：街車不能正常行駛，工人每每遲到工廠。至於工人的生活，牠憂心地描寫說：

我們試走進一間皮革廠的飯堂看去。工人在這裏迫得排隊站三四十分鐘。飯堂開原是供四百人之用的，但只供給六隻椅子，兩只茶匙。飯堂間總共只有八張小桌子。廚房間沒有一件不用的用具；殘食物的鍋子全是塞滿破布的腐爛。……該廠的主管人，安得列也夫竟淡然置之，無動於中。他和黨組織的書記竟不為這些可憎厭的現象傷心。

這當然不是唯一的例外的狀況，還有：

在基洛夫城裏，紗廠工人的共同宿舍沒有光線，房子是飢餓的、不舒服的。……屬於這個工廠的公寓房子却是一些空房子；其中有一半被那些與工業無關係

的私人所占據。同時有一部分工人却住在不適於人住的營房中。……（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真理報）

這是多麼殘酷的對照呵！這些『無動於中』的管理人，這些佔據空屋的官吏與那些污穢、可憐的工人！和平時期的等級分化，在戰爭時期，由於物質基礎的縮小，顯得更無精、更厲害了。不過我們要補充的指出：儘管在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之下，下層人民所表現的維護國有財產的熱忱和犧牲精神（如忍受長時間的工作日與惡劣的待遇和生活等），與上級管理員和官吏的自私和冷酷也形成一個明顯的對照。

戰爭差不多動員了每一種物質力量和每一個人口，因此和平時期一切社會矛盾都集中地表現於戰爭機構中。既然在後方，在生產的領域中不平等的分配與等級的分化達到那樣可驚的程度，在軍隊中、在整個政治的領域中，表現得更清楚。軍隊的等級制久已在士兵與軍官間劃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但戰時的試驗比任何試驗都來得更無情，而軍事機構却是最直接受這種無情試驗的。自蘇芬戰爭以來，那些元帥和將官們已顯得非常無能和不中用。他們一個一個的被撤換了，伏洛斯洛夫和布且尼代之以丁莫生柯，後者又被朱可夫所代替。官僚們被戰爭暴露得愈無能，他們對下層兵士和一般人民也愈畏懼和不安。從這裏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人們不用革命號召和教育來鼓舞士氣，來分化敵人的隊伍，却反而運用一種狹義的愛國主義，恢復沙皇軍官——蘇伏勞夫，彼得大帝及一切舊沙俄時代的和所謂『民族英雄』的崇拜。人們走得這樣遠，爲了想取得巴爾幹人民的援助而又害怕鼓勵他們起來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竟把十月革命時代謊爲反動的殞尸而埋葬了的泛斯拉夫主義復活起來。拿這種沙文主義的古老幽靈來鼓勵人民，唯一的好處就是：人民不會恢復十月革命時代那種大無畏的批判和改革精神。這對於維持官僚地位和特權是必需的。不僅如此，爲了使那些不平的靈魂得到安慰，人們還拾起舊沙皇的另一反動工具——希臘正教，德國社會主義革命以至世界革命的

號召也漢羅斯福——邱吉爾等民主英雄的崇拜所代替了。國際歌也取消了，代之以另一種內容的愛國歌；共產國際也解散了——這個登峯造極的工作不僅滿足了蘇維埃官僚的要求，還滿足了美國獨占家們的要求。美國的 The Hartford Courant 說：

第三國際死去了。馬克思的夢想完結了。共產國際想『將革命原則推廣全世界』，想醞釀『革命的無產階級革命』，這個列雷派的觀念已死了……

支加哥論壇報說：

史大林殺死了馬克思主義教義的魔鬼。他槍斃了那些布爾什維克派，因為這些人的王國是全世界，他們的靈魂是爲了世界革命。

美國那位『同情蘇聯』的民主派和國際合作派， Jackson 在他的『蘇聯要求什麼』一書中非常中肯的下了『一個結論說』：

蘇聯從世界革命活動的焦點到自我中心的高度的國家主義的國家的轉變，開始於史大林對托洛斯基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歷史性的勝利，而繼續發展以至於今日一九四三年五月蘇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的正式解散，這個演變達到了一個自然的高峯。（參閱裏一紅譯中文本第九頁）

這是『一國建立社會主義』所達到的『自然的高峯』。人們往往籠統地稱蘇維埃之取得戰爭勝利是十月革命遺產之勝利，因而又把官僚們的『天才的領導』也包括到這個遺產裏，這是對歷史的殘酷的歪曲！十月革命的活力不是表現在蘇伏羅夫崇拜——泛斯拉夫主義——希臘正教——沙文主義的一連串舊俄羅斯野蠻主義的『天才領導』中，而是表現在紅軍士兵與工作人民的無比英勇和頑強的戰鬥精神中。前者只有抑制後者！如果人們今天以擊退一個德帝國主義自豪，人們却忘記了，蘇聯今天以二十一年的經濟建設爲後盾，耗去六年功夫，償付難於補償的代價來戰敗一個脆弱的帝國主義者；二十年前，她僅僅憑藉一份殘破的沙俄遺產，一枚新生的幼稚的紅軍，三年功夫也會擊敗過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內部敵人呀！這足夠證明一種真正革命的集體的創意力勝過於官僚們的『天才領導』多多了。假如軍事是內政的延長，則蘇維埃官僚在戰爭中的無能和浪費只不過是他們在和平建設中的同一

特性的延長而已。

八 第四個五年計劃

這次戰爭對蘇聯的破壞，我們只能得個大概的總結算：煤的生產損失百分之六十，鋼鐵百分之五十，全部工業生產能力損失約百分之六十。鐵路受破壞者有六萬五千基羅米突，四千一百個車站，七千座橋梁和建築物。被毀的工業中心達一千七百多個，村莊達七萬個以上，家屋六百萬所。牛被殺死或搶走達一千七百萬頭，豬被殺死二千萬頭。待重建的區域達二十萬萬平方公里，戰爭造成的損害約值一千三百億美元，比之戰前最高的歲入（一九三八年）也高出六倍。人口死亡一千七百萬，殘廢三百萬，占蘇聯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一九四三年，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二只得到一九四〇年的三分之一的消費品，而一九四〇年一般的消費已被縮減了。蘇聯當局希望今年末能恢復的也只是達到一九四〇年的百分之七十。這就是蘇聯戰勝德國所償付的可怕代價，差不多把過去三個五年計劃的成就全部犧牲了。

克林姆宮爲了修補這個致命的創傷，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間又宣佈要進行第四個五年計劃，並規定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開始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但後來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延至七個月後，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才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中正式通過牠。本來經過那樣大規模的戰爭破壞之後，蘇維埃當局如果能在民主的光照之下，把過去的計劃加以嚴格的檢討和修正，把戰爭對蘇維埃經濟所造成的每一條裂痕加以精細的估算，然後在新的五年計劃基礎之上，開始復興的建設工作，當然能收到資本主義國家所夢想不到的效果。但不幸官僚集團久已窒息了蘇維埃民主，他恰在宣佈實施第四個五年計劃的時候，同時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又進行新的『肅清』。這又一次證明：人們三番四覆宣佈那個『不可克制地勝利了』的『社會主義社會』還是充滿矛盾的，還沒有『消滅階級』，還迫得人們企圖靠不斷的

、愈來愈兇猛的『肅清』來穩定牠。

現在我們大略地檢討一下新計劃的內容。牠含有這幾個特徵：着重於（一）東部建設和（二）重工業。這表明西部工業區破壞的深度，以致計劃設計者不敢把重點放在牠的恢復上；另一方面重工業，尤其是機器生產的特別着重也證明蘇聯工業受害之深，迫得差不多要從頭幹起。不管官方如何誇大，宣佈要超過戰前的水準，我們沒有理由相信這個計劃的最後一年能達到這個目的，事實上，官方公佈的戰時損失數字愈驚人，則愈顯得人們對新計劃誇張之虛偽性。直到今天，距離新計劃的頒佈已一年，但官方的數字尚未發表出來，人們顯然仍在維持一九三九年以來的秘而不宣的態度。光是這一點已證明這裏面藏着的是弱點而不是優點。

但幸而我們眼前有官方發表的『統制數字』。現在我們把新計劃規定一九五〇年的『統制數字』與一九四二年，即第三個五年計劃末年的『統制數字』比較如下：

一九四二年(第三個五年計劃)

一九五〇年統計數字

(統制數字單位百萬噸)

銑鐵	二二・〇	一九・五
鋼	二八・〇	二五・四
鑛鋼	二一・〇	一七・八
煤	二四三・〇	二五〇・〇
石油	四八・〇	三五・四

這是官方規定的計劃數字，其結果如何尚未可知，但就是假定一九五〇年能百分之百的實現上列的數字，除了煤之外，沒有一項能超過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統制數字』。

在消費品工業方面，我們可以把一九三七年，即第二個五年計劃末年的數字與一九五〇年的統制數字比較：

一九三七年

一九五〇年

棉織品	五，一〇〇	四，六八六(單位百萬米突)
皮鞋	一八〇	一五六・三(單位百萬雙)

除此以外，差不多所有消費品的數字都不僅低過第三個五年計劃，而且低過第二個五年計劃。

還有，實現這個紙上的計劃是需要勞動力的，克林姆宮怎樣去彌補戰時勞動人口的損失呢？據官方計劃宣佈：『一九五〇年從事於蘇聯國有工業的手和頭腦工作者數字規定為三千三百五十萬。』一九三八年，即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的一年，官方的勞動數字是二千七百萬人，那末，爲了實現一個較低的計劃數字，反而要加多五百七十萬人了。這是勞動生產力低下的最有力的證明！不僅資本的裝備惡化，甚至技術的水準也降低了。但就是取得這種不熟練的廉價勞動力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產業工人的物質待遇那樣低，想吸引國外工人的流入既然辦不到，就是吸引農民也辦不到，何況集體農場也正在鬧人荒？爲了解決這個問題，蘇維埃當局只好沿着戰時的道路走，繼續大規模的利用女工和童工，據官方數字指出，往後將有四百三十四萬童工加入重工業生產各部門（一九四六年七月五日真理報）。童工徵用平均每年爲五十萬，到一九五〇年就要提高到一百二十萬。

但光是女工和童工的運用當然還無法達到計劃所要求的勞動數字，結果，爲勢所迫，人們只好利用數百萬德、日的戰俘和集中營的大批囚犯來做強迫勞動。

除了勞動力外，還有資本：這裏包含償付勞動者及一般消費者用的消費品生產資本與製造資本本品的重工業設備。蘇聯當局取得這種資本的方法不外：（一）增發盧布；（二）舉借外債；（三）直接向佔領區沒收工業設備作爲戰爭賠償。當蘇維埃民衆陷於普遍貧乏、戰時通貨膨脹已十分嚴重的時候，增發盧布只能造成材改的波產和更架的包幾；至於舉借外債，那本來是

一種不可避免的手段，但因為在戰爭期間，蘇聯已欠下美國十五億元債款，如果再向美國借六十億元（史大林所提出的數字），則必然要對資本主義世界作更大的讓步，甚至要犧牲國家貿易獨占，但這樣一來，不僅蘇維埃制度傾覆，就是寄生於其上的官僚統治也要傾覆了，人們在冒那樣大的危險之前，不得不躊躇起來。那末，爲了應急，只好採取第三種政策，直至今天爲止，克林姆宮已從德國、東歐、巴爾幹各國及中國東北搬運了不少工業設備，甚至傢具和火車墊子等。但這些東西是否全部滿足新五年計劃的要求？牠們有多少是因爲不合用而廢棄了的，有多少是因爲出於缺乏知識而糟壞了的，又有多少是在拆除和搬運的過程中毀壞了的，我們當然無法知道，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懷疑。

集體農場在新五年計劃中也並不比工業好。一九四〇年，集體農場保有五十二萬三千架曳引機，十八萬二千架聯合收穫機，及大量其他裝備。官方估計戰爭的損失計曳引機十三萬七千架，聯合機四萬九千架，其他工具五百萬。計劃宣布要在五年內製造兩倍於戰前的曳引機。但今年七月間收穫時，現存的曳引機和工具尙未修理而且因爲缺乏燃料放閑不用。比如在波爾他娃省，雖然收穫已屆，却有百分之四十的聯合機尙未修理好。在克拉斯諾達斯克和米特拉夫羅普爾等區，許多機械一尙放在修理店中，雖然幾天以前，集體農場已開始收穫了。』在薩拉夫夫和顧比些夫兩省『半數聯合機尙在待修中。』這都是七月間真理報供給的材料。這些現成機械之未加修理和放閑與另一個更可愛的現象同等嚴重，那就是今年五月十六日，駐美國蘇聯大使館的『情報』指出的：

在後方工作的機械不久就用壞了，因爲缺乏有訓練的幹部之故……

正因爲勞動技術水準的低下才把官方的誇大數字打了一個巨大折扣哩！既然許多現成的曳引機和聯合機都待修理和放閑，又既然機械那樣易於被生手弄壞，把曳引機增加到戰前的兩倍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在集體農場中，在過去三個五年計劃實現之後，雖然人們已宣佈『社會主義完成了』，但原始的勞動工具——馬匹仍佔一個絕對優勢。自從『百分之百集體化』引起牲畜的空前浩劫之後，從來就沒有復原過。現在我們試把第四個五年計劃規定的一九五〇年馬匹生產最高數字與一九二九年及一九四五年比較一下。

一九二九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五〇年（單位百萬匹）

三四·六 一〇·五 一五·三

我們不要忘記：這還是五年後才達到的目的哩！

生產資本不足與勞動生產力之低落還不是唯一的致命的條件，官僚們對於生產的無知和寄生性才是蘇維埃經濟的一種難於忍受的制動機。戰爭中和戰後，官僚集團已大形擴大了，除了新的軍事閥閣之外，秘密警察和普通警察的機關龐大到驚人的程度，格·別·烏的精銳武裝已由二十五萬增至一百五十萬。共產黨的黨員由一百四十萬增至五百萬，他們都是『行政』、『技術』與各種各式管理員。戰前官僚與工人的比率爲一與十，現在已成了一與五，甚至一與三之比。國家監察部長華西利埃夫在最近一次最高蘇維埃會議中甚至指出一間肥皂廠僱用六個工人，而行政——技術人員却有十五人。另一間工廠只有四個工人，管理員却有六個，他繼續憂傷地指出說：

事情竟一至於此，爲了維持一個行政機關，某些企業要支出比之牠們全部人口的價值高出許多倍以上的款項。例如 *Voichayevsk prom kombinat* 廠有價值四千盧布的出品，但支付給管理機關的薪水竟達——一萬零七百盧布。

這就證實了九月二十日喧傳於全世界的聯合社莫斯科電：『多數集體農場，管理員充斥，而田中工人反感缺乏。』

官僚們『充斥』於國家生產機關，甚至往往超過了生產的工人和農民的數目，他們還有時支出比之全部生產品的價值要高的薪水，不僅如此，他們還像臭蟲一樣吮吮國有企業與集體農場的每一滴液汁。貪污、舞弊的現象已

公然流行。眞理報充滿關於這一類消息的報道。在喀爾吉茲共和國，五個建築廠的主管人被送監禁了二百六十六萬四千盧布（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日眞理報），在阿斯特拉罕區，一件集體農場財產的侵吞案子竟把全區黨部的重委領袖都控告了。（七月四日眞理報）伏爾加——裏海漁業托辣斯被控「光是去年」便侵吞了一千三百萬磅魚。省委對克拉斯諾雅斯克區負責工作人員此種道德墮落和犯罪行為并不驚奇。這批人現在已撤職待審了。還在一九四四年該區已發生侵吞集體農場財產的案子了。（同上眞理報）

這無異又證實了上述聯合社的同一電報：

蘇聯政府今日明白承認集體農場之大規模舞弊及低能。……史大林以部長會議主席名義頒布布告，力言集體農場之被濫用，範圍擴大，……同時，共黨監察委員會秘書齊達諾夫亦發表布告，列舉違反集體農場規則之定例，謂農場管理員非法佔用一部分公產以自肥。農場工作者不能獲得適當工資，乃偷竊牲畜、穀物、黍稷、牛乳、牛油、肉類、蜂蜜、水菓及蔬菜。……

廿四日合衆社的消息證明蘇維埃的工業受到同等的災害：

……莫斯科各報均載國家管理廳正進行對全國各工廠之清算，將舞弊之工廠監督、工程師、及會計員交付審判。彼等實偽造生產數字，收受非法津貼，盜用廠方基金，並將公產作為私產。

當然，上層官僚的唯一辦法，只是忙於從那些下級官吏中找尋替罪羔羊，人們會把過去三到五年計劃及所有其他政策的錯誤加給老布爾什維克來承受，舉行無數次駭人聽聞的肅清和審判，現在爲什麼不能舉行同樣的肅清和審判呢？雖然每一次肅清之後，人們老是聲明：「資本主義的最後殘餘已消滅了。」

九 總結與前途

我們只簡略地把二十九年來蘇維埃國家的發展回顧一下。我們只能側重於內部的發展而很少提到她對外政策的變遷，而且即在描劃她的內部情形時

，我們也追得遺漏了許多。這是在一篇受限制的文章裏無法避免的缺點。但假如人們不懷成見，對我們上面所描述的歷史過程和事實終歸會發生這樣的疑問：「十月革命」是在墮落和被叛賣的過程中，還是「社會主義」當眞實現或「完成」了呢？事實上這樣的疑問也是多餘的，我們擁護和同情一種新制度，我們必須同時也有勇氣面對眞理。自從科學的社會主義產生以來，無數勇敢的人們爲牠的實現而奮鬥，而死，他們所解決的是這個制度能終於使他們超脫一切階級社會的自私、壓迫、剝削、貪心、利害的打算和卑屈之感。恩格斯曾用一句話總括這種高貴的人類要求：「從必然的王國走到自由的王國」。蘇維埃官僚最初宣佈「一個國家是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過了十五年之後，即經過三到五年計劃之後，便又宣布：「社會主義已不可克制地完成了。」這就是說：「階級已消滅了。」這是對於科學社會主義概念的一種最殘酷的諷刺。我們能相信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容許計件工資、女工和童工之普遍應用、和強迫勞動之存在嗎？我們能相信社會主義與希臘正教、汎斯拉夫主義、沙皇彼得大帝——蘇伏羅夫的崇拜、要求無情賄款和割地的外交、對國家和領袖的盲目屈從……有共通點嗎？最後，社會主義能够與格別烏的棍棒、紅軍將官的階級標記和無數的貪污、舞弊、肅清相容嗎？社會主義是令國家「凋殘」而不是令國家硬化成一個數層的波拿帕專政的。爲什麼人們把社會主義了解得那樣廉價和卑賤呢？當然，我們並不企求在一個落後和孤立的國家裏能够造成奇蹟，但對於蘇維埃官僚在過去二十九年內所造成這種矛盾的結果，我們至少應該承認：蘇維埃官僚還處在盲目的「必然的王國」中，距離「自由的王國」還遠得很呀！以眞名呼實物本身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個科學的構成分子，那末，爲了社會主義的利益，我們又怎能把一個充滿嚴重矛盾，處在墮落與前進的交叉路口的過渡社會冒稱爲社會主義社會呢？我上面提到的「蘇聯之友」之往往盲目地崇拜蘇維埃官僚的社會主義定義，當然并不是面面俱到。其頁頁中多有是月之是日也。

本主義統治者的惡毒的攻擊起了強烈的憎惡，而傾向於維護蘇聯的一切的。他們的錯誤不在於他們的維護蘇聯，而是在於他們因此而天真地抹煞了這個新制度的矛盾。「假如一個新的制度也像你所描畫的那樣充滿痛苦的癡癲和矛盾，我們還希望什麼呢？」人們也許這樣反駁。而且確乎有不少「十月革命」的同路人和朋友，當發覺而且相信了這種「黑暗」時，便聳着肩，悲觀地走到退隱或者甚至更壞、走到「民主」帝國主義的陣營中去了。人們那樣害怕「黑暗」，因此不是盲目的崇拜「絕對的美」，便是盲目地抹煞「相對的醜」——從盲目的樂觀跳到悲觀，這兩種態度對於社會主義都是不中用的。

蘇維埃制度給了人類的第一個教訓就是：計劃經濟確乎能替人類歷史創造一個更高的基礎，假如整個地球能按照這種方式加以改造，人類就能够迅速地提高生產力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階段上，戰爭、貧窮、國家界限的衝突就立即退到歷史的野蠻時代中去，人類真正的文明時代就會到來。

但蘇維埃制度還給我們另一個重要的教訓：當不平衡發展公律使社會主義革命在某一國家，尤其是一個落後國家取得勝利時，如果這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不能維持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和國際性，即一種孤立、落後和缺乏平衡的條件將必然造成官僚主義的波拿帕制，這種政制本身就是過渡時代的一種緊張的矛盾的產物。當馬克思替未來的無產階級政權設計時，他只能把他放在一種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健康和正常的物質基礎上來描寫，所以他所能預見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能最徹底、最無畏地反映無產階級內部各種層分的民主制度，牠僅僅對敵對階級「專政」，但對無產階級內部各種前進與落後的黨派則保證其最大限度的自由。但歷史的實際發展比一個理論的公式豐富得多。馬克思之替無產階級政權起草那種典型的民主制度，正類似於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以前孟德斯鳩之替資產階級政權制定那種古典的民權一樣，他們只是也只能以未來國家之最正常的狀態為根據的。馬克思之不能「預見」無產階級專政在一種特殊的情形下不得不經過複雜的、歪曲的過程，正

如孟德斯鳩之不能「預見」資產階級政權要經過特爾米多和波拿帕的複雜階段一樣，這不是他們的錯誤，而是個人對歷史具體過程底預見的局限性的表現，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也只能替我們指出未來社會的一般遠景和達到這個遠景的一條正常的道路，他是不能替代我們詳細指出達到這個遠景的每一條曲折的小徑的。無產階級的第一個成功的大革命與資產階級的第一個偉大的革命——法國革命那樣類似，使我們可以在法國大革命中尋出某種共通的規律來解釋俄國的十月革命過程。俄國十月革命也有牠的「雅各賓民主的專政」階段，即列寧時代的蘇維埃與黨，也有牠的特爾米多和波拿帕主義的階段，即一九二三年的官僚主義勝利以及往後軍事官僚專政之跋扈的生長。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十月」之經過這樣曲折的過程，同樣歸因於新生政權的孤立、幼弱和不穩固，但歷史的類似也僅止於此。這兩個革命中間的最大不同就是：法國大革命是資本主義的要素在法國舊封建制度內發展到最成熟的結果（我們不要忘記：資本主義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當雅各賓的小資產階級專政替資本主義澈底地肅清一切舊制度的殘餘，鋪平了一條康莊大道時，資本主義確乎已取得了「不可克制的勝利了，因為任何舊制度復辟的企圖都已失去物質的基礎了。但「十月革命」在一個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裏取得勝利只是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成熟了的表現，如果這個革命只限制於俄國本身，則無產階級所能創造的社會主義要素，在比重上，將遠落在牠在澈底消滅沙皇舊制中所附帶助長了的資本主義要素之後。農民經濟（不管採取公開或隱蔽在集體農場中的小生產形式）之終於成為國有財產的嚴重威脅，雄辯地證明：俄國資本主義復辟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已愈來愈成為不可忍受的威脅了。正因為如此，蘇聯比之十九世紀的法國更迫切地需要廢除波拿帕主義的官僚專政，恢復十月革命的真正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個真正愛護蘇聯的朋友真誠的願望！

美國通貨膨脹與物價管理局的作用

克萊爾著
康君譯

在這次大戰期間，美國的通貨膨脹到了可驚的程度。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的一種延遲的結果）開始於戰時，往後加速的上漲了。戰後一年的今天，物價正以最高的速度漲騰着——雖然那使牠上漲的通貨膨脹，經過戰爭的幾年早已完成了。膨脹了的通貨，在未達到充分的程度時，將會推使物價更加高漲。

政府經過物價管理局來管制物價，與工資統制或工資凍結一起，都會在資本家的戰時計劃中盡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並不是這些政府的計劃防止通貨膨脹，下面的證據將證明這一點。牠們只能把大部份通貨膨脹的利潤歸給某些大資本家，但對資產階級中的小魚的利益則加以剝奪。

通貨膨脹的總額，如與戰前的通貨狀況相比較，則表現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底如下記載中（以聯邦儲備局的數字為根據）：

通貨膨脹發生於『資金比貨物多』，而物價被居奇起來的時候。今天，通貨膨脹的狀況是：

聯邦儲備局估計，操在國民手中的流動資產為三千億美元。牠比二十五年前引起困難的通貨膨脹力量大八至十倍。

儲金為一千四百五十億元，比一九三九年美國消費者所用的金額大兩倍。

從一九三九年八月起，核對數目餘額的均衡從二百七十億元增至七百二十億元。單是這項現金即大於一九三九年消費者所用的總額了。

拿來比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狀況（刊載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的另一箴言報），則是：

引起第一次大戰後貨幣貶值的經濟壓力，比起今天威脅着戰後安定的龐大壓力，是顯得微弱無力了。

第一次大戰後，國民的儲金只有二百七十億元，今天則達一千四百五十億元。

第一次大戰後，流通的貨幣只有七十二億元，今天則是二百六十七億元。

第一次大戰後，核對總數目的餘額只有二百七十三億元，較諸今天却是六百九十三億元了。

在前一次戰爭之後，絲毫看不出有像目前的通貨膨脹前途。牠像被一個鋼製的圈套所困，正等待解脫出來。

誰握有過剩的通貨

美國的經濟制度，被大黨的荷包中通貨和銀行中通貨所拖累，沒有充分的貨物供人購買。這比新聞記者所描述的『通貨膨脹前途』尤有過之。這是一種成熟的通貨膨脹，牠已經是完成了。

瞥看一下過剩通貨的數目，就够顯示牠是來自利潤而非工資了，因為工人們沒有機會儲蓄這樣大的款項。無論如何總有充分的官方數字來證明這點的。據農業經濟局統計：美國百分之四十的家庭，只佔有存款的百分之十，每家計有四十元。其他百分之三十的家庭，佔有存款的百分之十一·五。居首位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却佔存款的百分之六十。他們不是靠工資來儲蓄的

物價管理局在戰時的作用，是要『抑低物價』，爲的使工資凍結。大體上，他們這樣幹，但他們仍有所偏袒，在許多方面都容許犯規等事情。物價管理局壓低了房租，而且對農民所收受的物價加以嚴格的統制。這種房租統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房租暴騰的情形相對照。在上次大戰中，農民的物價會被政府加以管制，——雖然沒有物價管理局那樣嚴格。被強有力統制的房租和農作物這兩個範圍，都操在小所有者手中。另一方面，在食物和衣着的範圍內，物價管理局容許牠們漲價一倍或一倍以上，這種漲價和第一次大戰時是一樣的。但即在這些地方，物價管理局實際上也抑低物價在不受統制所能到達的水準之下；因爲我們已經見到：過剩貨幣的總量多於第一次大戰時的八倍或十倍哩。

大戰結束時，大的商業又開始在日用品的市場中銷售了。這就完結了他們對物價管理局底限價作用的需要，這種需要完全完結了。從此時起，他們就只能利用物價管理局去『漲價』。物價管理局也正式批准他們加價。他們經過這管理局將抬高物價的責任加諸政府肩上。他們今天就這樣在利用着牠——物價管理局縱容物價上漲，說是『因爲費用增加』，或某些別的口實。同時牠又強行壓制工資的增加。僱主們都對政府堅守工資的定則，因爲如果他們支付更高的工資，那物價管理局是會拒絕給他們以『物價救濟』的。

當物價管理局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宣告結束的時候，工資凍結也解凍了。一月之後，物價管理局恢復了，牠的第一道法令是宣佈牠要『拉轉工資』，要取消工人一月來已經爭得的任何工資。從此，物價管理局只能夠供給物價上漲以官方的掩護物，同時又替（而且強迫）工資凍結加以辯護。

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

當我們轉向這問題的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的原因時，便可以更清楚地明瞭政府管制物價的性質了。政府聲稱通過物價管制和工資凍結來防止戰時

通貨膨脹，那末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

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最近會對通貨膨脹的原因加以正確而簡潔的說明：

『通貨膨脹的泉源是政府的入不敷出，以印發鈔票的方法來彌補財政。』

由於政府彌補入不敷出而引起的戰時通貨膨脹，就是物價管理局的一個口實。參院議員塔夫特——共和黨的參院領袖，在六月二十七日責備物價管理局時曾經說：

『我非常強烈地感覺到：物價管理局在大戰中是重要的。……我想，凡是冷靜地考察這問題的人都一定會得出結論說，不管物價管制有多大缺點，假如我們每年要負擔五百億元的虧空去進行戰爭，那物價管制是必需的。』

在我們開始爲自己探尋通貨膨脹的過程以前，我們可以從官方來源方面找到更多的證據。政府的虧空造成另一種結果：牠生產了戰爭利潤；而這就是隱藏在通貨膨脹與物價管理局後面的真正動機。政府的入不敷出，就是戰爭盈餘的泉源，這種盈餘給予資本家以戰爭利潤。政府造成虧空去供給戰爭利潤。

財政部在這方面給予了一些數字，關於政府和私人在戰前和戰爭當中，從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這六個年頭的全部開銷，牠刊印了一個摘要書。聯合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刊出這個摘要，敘述這六年期間：

聯邦政府支出三千六百五十億元，而稅收却只有一千五百六十億元。因此牠入不敷出達二千零九十億元。

州和地方政府稅收爲五百八十億元，但支出僅五百億元。因此牠們可餘存八十億元左右。

私人和公司盈餘二千零十億元，因爲他們的收入除納稅外還有七千七百三十億元，而他們的開銷則是五千七百二十億元。

實際上，由州及地方政府所積存的八十億元餘額，加上私人及公司

所盈餘的二千零十億元利得，恰好等於聯邦政府的二千零九十億元的虧欠。

財部中人說：既然「總支出與總收入實即是同一數字——兩者是一個銅幣的兩面」，那末這件事便不是偶然的了。

我們可以依「圖二」的表解，去細看這個過程，這表解簡明地描述出資本主義制度中商品與貨幣的流通。這圖解中標示「新貨幣」的部份代表通貨膨脹，在開始討論時暫把這部份擱開不談。請用手掩着牠或者假設牠不在那個表中。

商品與貨幣的流通

圖示的商品是一件衣服。製造所製成了布，把牠賣給一間工廠。工廠把布製成衣服，賣給一間商店。然後由這商店零售給消費者。最後的售價是八元。從衣服引回去的八條線，表明這些貨幣的流轉情形。

雖然製造所在能够開始製造以前，實際上必須購買棉花或羊毛等原料，但爲了簡明起見，我們仍以牠爲開始。可是，即使再回到更遠的生產的諸階段去，也不致改變圖解所表明的要點。

製造所賣布給工廠是二元。牠得到了二元，然後支付出去。我們可以假定半數給工人，作爲工資，其他一半則給予牠的主人，作爲利潤、利息和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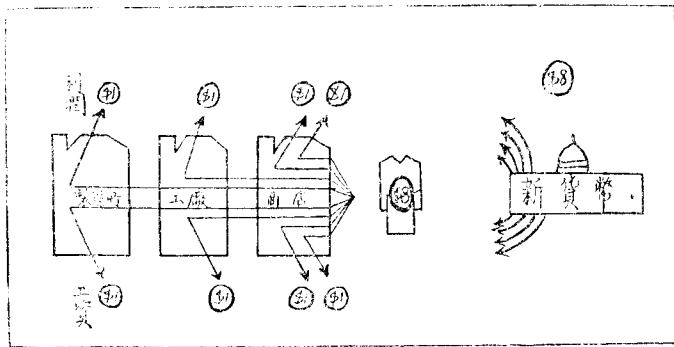


圖 二

金。這兩條線表示一元作爲利潤落到主人手裏，另一元付給工人當做工資。工廠把衣服製好，賣價是四元。其中二元給回製造所當作布價。工廠留下二元，便要像圖示那樣，一元給廠主，一元給工人。

商店以四元代價買了衣服，照通常的零售價，賣兩倍的價錢，即八元。然後，付給衣服原價四元，商店自己留下四元，這四元要像圖示一樣付給工人二元，作爲廣告和推銷費，其餘二元給店主人。

於是衣服以八元的價格賣出了。重要的地方是：在這種流通期間，恰够八元的純收入在這經濟制度中是付給各個主人和工人。這八元恰好够買衣服的收入。

我們可以假定這件衣服代表所有商品的總生產額。工廠主和工人可以帶貨幣到市場去，而且全都只有恰够的貨幣去購買市場出售的商品。在通常的情形底下，這種商品和收入之間的均衡往往是存在的。

八元的衣服 於付出的八元收入，因爲非常好的理由是：收入來自衣服。正如經濟學者所說的一樣，收入與生產品相等。這是一定的，因爲收入來自生產品，和八元收入來自賣價八元的衣服一樣。

我們可以找出工資增加在這個經濟制度中所發生的影響。假定圖示中工廠的工資是增加了，工人因此得到一元五角而不是一元。這就是在工廠所得的二元中只留下五角給工廠主了。工人們會得多一點，但在這經濟制度中並不會增加多些總的購買力，工廠主的收益將會因工人收入的提高而下跌。

在這裏，會因工資的增加而使購買力有剩餘嗎？不，因爲總的購買力不會有所改變。仍然有恰够的收入去購買生產品。工廠可以因貨物缺乏而提高價格，因而將工資增加的負擔移在消費者身上嗎？不，因爲不會有缺乏；不會有購買力的過剩，去引起貨物的缺乏或價格水準的改變。在這種場合，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價值、價格與利潤」中扼要說明的一樣，既然工人購買力的增加來自工資的增加，則：

……他們的購買力增加，一定與資本家購買力的減少相呼應。因此，商品的總的需要不會增加，但這種需要的構成部分則會改變。需要增加的一方面將會被需要減少的另一方面所抵消。（第十五頁）

馬克思指出：典型的結果只能增加工人購買必需品（如食物和衣服）的需要，同時降低資本家購買奢侈品的需要。這只能造成必需品價格暫時的上漲，以及奢侈品價格暫時的下跌——直至工人所需要的生產品增加起來。然後，價格再度平衡化，但這個時候，會有更多的生產品供給工人而奢侈品則減少。

高價貨物的強調

資本家的報紙說：工資增加了，於是引起通貨膨脹。假如這句話是真實的，我們就會看見：正是市場中工人方面的需要增加，同時奢侈品方面的需要減低。但情形恰好相反。工業正在停止生產廉價的物品，轉而生產高價的商品。他們反對物價管理局的『最高的平均價格』法規，該項法規迫使他們將一部份生產品歸入低價商品欄中，現在牠已給國會取消了。股票市場正在繁榮，因為廠主們握有大量過剩貨幣來投資，這筆游資是超過他們所能處置的。

除市場中的過剩通貨外，銀行中尚有更多的通貨沒有流到市場中去。收益與出產間的平衡被破壞了。牠是被政府用以支付戰爭利潤的手段所破壞的。

讓我們回頭看看圖二的表解，仍然將『新貨幣』這部分暫置一旁，去尋出戰爭利潤的線索。假定政府需要那部份爲任何目標（包括戰爭）而生產的物品吧。牠可以徵稅去購買。假定政府向圖二所示的一切廠主和工人每一元收入徵收二角五分的稅吧。那政府可得總數二元去買物品。廠主和工人的購買力將降低而爲二元。貨幣與商品間的平衡不會有所變動；這裏仍然沒有過

多的貨幣，沒有超過商品的剩餘貨幣。

一個國家在戰時必須比平時生產得更多。可會有足夠的稅收去支付這種戰時的生產費用嗎？有的，恰好足夠。如圖二所示的，生產品創造出同等數量的收入。增加了的戰時生產品會產生一種恰够購買牠自己的收入。政府可以向這種收入徵稅去購買原料，供給戰爭的消耗。

徵多少稅呢？政府在戰時每年大體上要開支六百六十億元。他們不能從工人那裏徵稅，工人們沒有獲得這麼多的收入。并且，他們必須讓工人足夠維持生活，不然便不能生產了，而大多數工人都只得到够維持起碼生活的工資哩！即使政府將重稅加在靠薪水爲生的人們身上，也不能從工資中充分得到巨款去支付戰費。

另一種唯一可徵稅的收入就是利潤。利潤是足够支付戰爭生產品的。不能不——而且已經是——剛剛足夠而不再多些。政府可以向那些利潤徵稅去支付戰費。正如財政部所發表的一樣，恰爲政府所不徵收的數目就成了盈餘。但向利潤徵稅便不會留給資本家以戰爭利潤。

祇有兩種彌補政府支出的方法：靠徵稅或靠通貨膨脹。政府不願向資本家們的戰爭利潤徵稅。因此牠選擇那不生產品收益徵稅而購買的方法。這就是說：牠必須創造一種不靠生產的虛構的收入。這種虛構的收入，或虛偽的貨幣，就是通貨膨脹。

人們有時會這樣說：政府籌款有第三種方法——借債。這可以由兩種方法做到：一是從私人和公司，二是由銀行。政府向私人和公司借債，實際上並不是第三種方法；牠只是延遲選擇徵稅或通貨膨脹吧了。到了付還借款的時候，政府必須在兩種方法中擇取其一。另一種方法，即政府向銀行借款，却是沒有延緩的通貨膨脹，這一點我們馬上見到。

通貨膨脹造成表解的右面部份（『新貨幣』）。圓頂的建築物代表政府。流向外去的八條線代表政府新創造的購買力——八元。政府沒有放出商品

去與貨幣相配合。這就說明通貨膨脹的貨幣何以是虛構的購買力。牠並不和商品相匹配。

供給與需要

通貨膨脹是政府的行為；牠是由政府所創造的新貨幣造成的。牠是由虧空造成的，因為虧空就是政府需要新貨幣的原因，有了新貨幣政府就可以支出比稅收更多的錢。

如圖二所示的，通貨膨脹將收入的額外八元投到市場去買衣服，此外還有廠主及工人們已經保有的八元。這就成了十六元買原價八元的貨物。這就產生了我們在美國所見到的情形：貨幣比貨物更多，一切物價水平之普遍提高，代替了一部份物價高漲與另一部份物價降低。

通貨膨脹的貨幣引起對貨物一時的人工造成的需要，產生一種典型的短暫的景氣，這也是我們在美國所見到的情形。這樣的通貨膨脹景氣，常常是被一種突然的崩潰所伴隨的。

來自通貨膨脹的貨幣，和來自生產的貨幣一樣購買貨物。市場中有十六元來買八元的商品，結果，造成高度的需要及適應這需要的價格上漲。牠們漲到衣服價格變成十六元時為止。另一種說法是：在這種經濟制度中，每元只值五角。來自通貨膨脹的虛構的收入，奪去了來自生產的收入之一半。牠吸取了每元的一半價值。

這就是戰爭利潤積聚的情形。當資本家消費他們的虛構的收入時，他們便買得真實的貨物。或者，他們付出這筆虛構的貨幣作為工資，工人於是用牠去買真實的貨物。通貨膨脹的貨幣，吸取了實際貨幣的價值。物價漲起來。每一金元都貶值了。靠限制政府將來的支出來停止這件事，是無法可想的。游資已經由資本家及其公司放在銀行中。水是從龍頭來的。

政府并不靠印刷來發行超額的紙幣，只是靠銀行借款。普遍的觀念認為

通貨膨脹來自印刷紙幣，但這是不正確的。銀行的放款——並非印刷機——乃是現代各國通貨膨脹的普通方法。事實是法律如此規定：銀行借款給政府，牠只是在創造貨幣。這就是『華爾街日報』所說的，政府的虧空，『以等於印紙幣的方法』來彌補了。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的『新聞週報』雜誌曾概述戰爭中這種作法的統計：

政府大約從銀行借了一千億元的債，以政府的公債為担保。收入一千元公債的銀行，便因政府而建立起一千元信用。紙幣便造出來了，宛如牠已印發出來了一樣。……因為銀行在政府公債方面作巨大投資，現在便有全部銀行收入的一半左右來自公債的利息。

說銀行大大地『操縱』政府公債，比稱牠為『投資』將更為正確。正如上引的雜誌所暴露的：他們並不投入分文。銀行放給政府的債款是空的。牠們之握有一千億元的政府公債宛如一件贈品。

各銀行得到這公債，以政府支票的方式造出同等數量的新貨幣。政府簽寫支票，去支付槍砲、艦船、飛機及其他軍火等購買之用。

公司得到政府的償付，如果不自行存儲在銀行裏，便當作付工資或買原料而支出。牠把收入送入這個經濟制度的流通界，并造成本文開頭所報告的銀行存款及流動資金之增長。

這些資金是不勞而獲的，但却為購買商品而支出。又當政府償還公債本息時，銀行將要求政府付貨幣給他們，這些貨幣將用來購買值一千億元的貨物。

一千億元的貨物有多少呢？美國全部工業的資本裝備，在大戰開始時約值四百億元（根據自上引的參院報告）。因此，單是銀行的戰爭利潤，便獲得了等於美國工業設備兩倍的紙幣支配權。唯一的不幸是：當使用這些紙幣時，却買不到同等的貨物。因此，這些紙幣便被供養着，像生產的實際收入

上面的一條寄生蟲一樣。牠是被物價上漲和一切貨幣貶值所供養的。

政府向銀行借款，大約佔戰時虧空的一半，牠產生了我們今天所痛感的通貨膨脹。另一半的虧空，從私人 and 公司借來彌補的，也是同等巨量的虛構紙幣。牠還沒有膨脹了紙幣的制度，但確實會成爲集中政府紙幣的把持者（因爲政府那時將不願比現在徵收更多的稅）。

兩千億元紙幣

很明顯的，資本家經過他們的戰爭政策，靠紙幣免除了一切積累的正常限制。他們能够遠遠超出真實財富底積累的可能性之上。現在，他們握有二千億元的紙幣，這比國內真實的工業財產總額（工廠的實際建築物、機器和貨物）要大四倍。困難的就是：當他們將這些紙幣換取真正貨物時，真實的財富勢必擴張起來應付他們這大量膨脹了的虛構的美元價值。這表示物價上漲、生活程度增高。只要資本家們去開支這些虛構的價值，物價高漲是無法制止的。

雖然目前的通貨膨脹與戰時財政緊相連繫，但一般說來，通貨膨脹的運用並不應視爲只是一種戰爭的手段。實際上，在這個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資本主義制度有一種擴張的週期的慾望，這就以導向資本的虛幻的擴張。戰爭財政只是一個特殊的例子、虛幻的擴張反過來又造成通貨的膨脹。所以在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戰爭中和平時期的通貨膨脹傾向是週期的。

從這種通貨膨脹原因的檢討中，我們可以見到：獨占家冒着多大的風險，他們在戰時又多大需要物價統制。他們的利潤，正傾出龐大數量的貨幣（沒有商品可以滿足牠們）傾入這個經濟制度中。大量的貨幣必然要流到市場中，藉以支付給戰時的工人，和充作資本家購買之用。這種過多的需要必然會鼓舞和平時期市場物價的膨脹，同時工資也必不可免地增加。獨占家們都處於最易受敵的地位。他們沒有物價管理局，便要喪失無數億元。物價管理

局好好地替獨占家們服務，在戰時抑低物價，現在則又幫助他們提高物價。

過去通貨膨脹的歷史顯示出：貨幣一旦貶值之後，她便永遠貶值。不久或者較後一點，一切物價都漲到新的水平，去和貨幣的較低價值相競賽。結果工資也提高了；工資的提高通常要經過較長的時間，因爲工人們的談判權力較小。按照物價增加工資，亦即按照生活程度的自動增高，便會消除掉時間上的拖延，這種拖延在已往通貨膨脹時期延緩了工資的提高。按照物價增加工資的口號，使工人運動注意到問題的關鍵，因而以最有效的方法，動員牠的談判權力。

資本家從時間上的拖延中獲得利益。他們愈是能够剝削工人的談判權力，愈是能够在物價上漲時更長期地抑低工資，則他們的利潤也增加得更多。目前他們控制工人的方法，就是繼續戰時的工資凍結，用物價管制的約束，用香餌似的舊物價管理局底外貌作爲後援。物價管理局因爲在另一時期中會真正地限制過物價，她便以這種聲望去幫助上述的工作了。工人們承認牠過去做的事情也很可憐，但他們又知道牠確是做過一些事情。

資本家的政治家們，在政府提高物價的新的時期中，正利用着政府管制物價的一般作用，去維持工資凍結。把事實弄得清楚，把物價管理局在戰時所作事情的動機指出，把牠在那時也不比在目前較爲代表工人利益的作用指出，——這對於工人運動是很重要的。

物價管理局爲什麼被撤消

美國「肉荒已經遍及全國……醫院中拿馬肉給病人吃……先鋒論壇報記者乘了飛機投函店……物價管制政策是更加惡化了，它進一步將引到經濟不景氣，它表示出有力資本家底強大影響和杜魯門政府的無效。」（大公報紐約特派員十月十二日發專電）

「官方頃宣布，政府已決定裁撤物價管理局。此項決定乃係依照新法律規定，藉以恢復供求之自由。」（法國新聞社華盛頓十月十七日電）

「經過了長期的無肉日子，這當然是一個解放，但這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它加速目前的通貨膨脹趨勢……工資穩定亦將失效（取消「凍結」）。有些經濟學家畏懼在一年內就可以看見經濟的不景氣……」（十月十七日大公報專電）

中東的逐鹿場

Elijah Ben-Horin 作
黃敬存 譯

中東問題，尤其是所謂巴勒斯坦問題，現在已成了我們這個星球上最複雜、最紛亂、最使人感到迷惑的重要問題之一。但正由於它的複雜、紛亂、和使人迷惑，也就很難得到正確而明晰的報導。這在我國尤其是如此。黃敬存君所譯出這篇『中東的逐鹿場』，并據稱『作者曾久居巴勒斯坦，於此任巴勒斯坦導報編輯凡四年』，這就本文對於中東各弱小民族及外來列強在這些弱小民族中所引起的複雜關係和矛盾的分析看來，證明作者對於中東問題是認真觀察和研討過的。因此我們認為這篇文章發表出來，對於國人了解正在紛亂中的中東問題不無幫助。但作者提出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即英美蘇的互相協調來解決中東問題的方案，是可疑的。因為，假如英美蘇能協調解決中東問題，那就早已不會引起現時的可怕紛亂和矛盾了。依我們看來，中東的問題同遠東及其他弱小民族國家的問題一樣，只有那些弱小民族完全脫離列強的干涉，獲得真正的自主獨立，自行建立自己的前途地位，才算獲得了真正的解決。但要達到這一點，則那些列強本身又必須加以大大的甚或根本的改造，才有可能。所以，最後說來，中東問題的解決是與整個國際問題的解決分離不開的。

(編者)

構成中東之謎的若干成分，有些是明顯的，或是可見的，它們極端混亂

地擺在我們的跟前：阿拉伯人與猶太人；所有教會的基督教少數民族，（其中有一部分，大多數美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比如敘利亞之少數基督教徒，景教徒，加爾底亞人等）；派別分歧的回教徒；亞述人和亞美尼亞人；德盧塞斯人與庫提斯人及腓拜太陽者；蘇彝士運河波斯灣以及達旦尼爾海峽——如果我們把中東之名概括近東，則後者也包含在內。中東的油藏比之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多；它在戰略上與交通上的價值是無可比擬的，這就是我們之謎的不可見的極成部分；列強的利益，地方的因素在他們手裏只是工具而已。這帝國主義競爭一個區域的統治權的賭注就是這個區域握了世界權力的一根鎖鑰。

中東內部鬥爭的原素是極其豐富的，而這種內爭又容易引起全世界的反響。亞塞爾拜然並不是克林姆宮製造出來，如果明日世界要碰着庫提斯人入的問題和他們要組織一個獨立的要求，這也不是惡意的產物。中

東有着近三百萬的庫提斯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們便已得到允許，可以自行組織獨立的國家了。換句話說，那兒經常有着政治的走卒，但他們的行動却為世界的利益所引導與節制。

因為中東在世界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如果照着一定的限度去分析當地任何單獨的問題是沒有用處的。他們完全交織在一個模型裏，他底線索的盡頭不在東方的印度洋，也不在西方達旦尼爾海峽，而一直通到倫敦、莫斯科和華盛頓。要想在開羅、耶路撒冷、或德黑蘭把結子剪開，是沒有效果的。

中東積着大量的炸藥，足夠燃起瀾漫世界的烈火。但在另一方面，明智的政治手腕可以為人類運用這種炸藥作為努力建設的槓桿。油類可以推動坦克車和轟炸機，但它同樣可以發動高速度的舟車。民族和宗教團體的紛岐很容易引起糾紛，但它同樣可以產生一種更輝煌的文化。

石油現在是人人談論的對象。在中東的各種衝突與困難的後面都可以看出石油的問題來。在中東的地下有着近乎三百億桶的石油儲量，這的確已經

證實，而無須懷疑了；適當地推測一下，還要加上七百億桶。這是一種很值得重視的油量，它遠較美國本土和加勒比的總儲量為多，而且，也許還等於蘇聯已知和未發見的儲油的總量。但是，我還敢說，通常對於油的因素在中東競爭中所估的重要性是估計過高且強調過分了。

在表面上看來，蘇聯要求北伊朗的油權是最近安全理事會上一切激論的原因。但是，如果冷靜地把蘇伊的衝突分析一下，便可以證明油在事變的發展上是無從宏旨的。蘇聯對伊朗的油藏是這麼迫切需要，以致不惜掀起三強間嚴重的衝突嗎？伊朗北五省的石油蘊藏是千真萬確，而西方的列強懷抱着任何的野心都跟這地域裏的油藏有關係嗎？

對上述問題的忠實答案應該是否定的。不要說她現在控制了東歐和中歐的全部油田，蘇聯在其本土上已經有足够的油量，不但可以供給目前的需要，而且可以供給大規模的建設和工業化的需要。誠然，蘇聯在戰時油產不足，須要新資源的接濟，但這種需要還不至急切到要訴諸戰爭。無論如何，英美兩國沒有理由反對伊朗北部的蘇維埃特權。這裏自來便屬於蘇聯的政治經濟的勢力範圍，其他的列強要在這裏從事有利的開拓根本是不可能的。而且，這一地域還沒有開發過，石油的存儲也不會證實。英國佔有伊朗西南部豐富的油田，美國也進行着在伊朗東南部得一特許權。此外，英美控制着阿拉伯的全部油藏。沒有一個英國或美國的公司要在北伊朗取得經營地，理由很簡單，在這裏經營是不能獲利的。

如果造成這些紛擾的原因不是石油，那麼，是什麼呢？事實的真相是這樣：列強欲得北伊朗石油之心不及他們不願他國佔有這塊土地之心一半的強烈。蘇聯不需要這些油，但她厭見英國的勢力逼近她底邊疆和裏海。英國不需要北伊朗的石油，但她決定防止或阻緩蘇聯闖下波斯灣來。

問題的關鍵在於誰能取得中東戰略地位的控制權，其他的枝節不過是這關鍵的掩護吧了。我們可以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亞述人的情形。當英國認

為亞述的基督徒不能安全地置於土耳其統治之下而要求摩蘇爾區脫離土國時，她便掀起了亞述人的問題來。但當摩蘇爾併入拉克後，英國立即把亞述人完全忘記——甚至於把阿拉伯人對伊拉克人的大屠殺都寬恕了。

我們還不需要回溯得那麼久遠。當安全理事會正在為着蘇、伊的糾紛而感到棘手時，倫敦的英國政府却宣布外約但獨立。這地方在約但的東邊，是國聯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地的重要部分，居然一下子變成了獨立的王國。是誰決定廢棄國聯的委任統治權呢？不是國聯，不是委任統治委員會，不是聯合國，甚至不是三強的會議。它是由英國偏面地做出來。而且，做得非常匆忙，沒有等待英美的巴勒斯坦問題研究會的建議或行將瓜代國聯的委任統治權的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的決定。

外約但的現狀決不比以前較有獨立性。這兒還是僅有三十萬居民，大部分是伯杜因的遊牧文盲。這兒沒有工業，只有微弱的商業，貧乏的交通，沒有文化機關，沒有經濟的開發。在政治上，軍事上和財政上，外約但和她的國王都還是完全依賴英國。

誰都有權發問：如果英國可以不顧國際的協議，在外約但建立一個傀儡國，為什麼不容許蘇聯今天在亞塞爾拜然，或明天在庫提斯坦做出同樣的事，或後天造成一個更大的亞美尼亞蘇維埃呢？

三

「英國無落日」，蘇聯亦然。英國的工黨政府和蘇聯的蘇維埃制度都不能變更這種真實的事實。艾德禮與史太林不是從事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辯論，而是從事於兩種龐大統治權的爭霸。中東便是他們決鬥的場所。在中東逐鹿場上所發生的事端沒有一件不牽涉到英蘇間超越一切的爭逐。這種爭逐的終極出路，不是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便是這兩大國間的和平合作，以美國為第三者和仲裁人。這裏似乎沒有中間的途徑了。

我要引申密爾斯博士的話。他是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七年和一九四三至

一九四五年間的伊朗財長。他建議美英蘇共管伊朗，期間由二十五年至七十五年。這是改變爭霸局面的唯一方法，也是建立一個為多數人民謀幸福而不是為少數封建領主圖私利的進步文明政權的唯一途徑。

下面便是密爾斯博士描述的伊朗的情況：

『……不滿與不服從瀰漫着。政府不能代表民衆，也不是為民衆服務。據我的意見，如果伊朗要使國內安定並取得外國的尊重，沒有外力的管制，它是不能做出必需的事體的。在伊朗，獨立和自主都不是事實，也不會變成事實，如果伊朗人被認為現在已能够在政治上解決自己的問題。在一個期間內，伊朗所需要的是更多的外來干涉，然而是一種新的建設性的干涉。』

如果這是伊朗的實情，則過去是征服國的伊朗，將成為長久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在中東的許多國家中，她比較上是何等的實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願他們在普遍情形下有無成立國家的資格，在特別情形下有無進步的自主政府，這些國家都被給予名義上的獨立了。我們已經談論過外約但的情形；敘利亞、黎巴嫩和伊拉克也在同一的類型裏。利比亞也是如此，在這兒，一種同樣的計劃似乎在進行中，名義上是獨立，實際上是依附英國，作為對蘇聯要求獨管前義大利殖民地的一種打擊。

的確，密爾斯博士的建議最近已經為一家首要的英國週報所主張。描述了藉於英國的有力支持而把法國驅出中東以及阿拉伯聯盟的建立的情形之後，這週報說着：

『……從蘇聯的觀點來看，可以從英國的政策中引伸出來的唯一結論是要努力組織起中東以對抗蘇聯。……打算在一個假想的反蘇的阿拉伯集團上以建造英國未來的權勢，這種政策在我們看來是建築在沙漠之上。阿拉伯聯盟沒有軍事上價值，它底經濟資源是微小的，它受着內部磨擦的妨害，而且沒有絲毫的理由可以相信它還是忠於英國。……到最後，蘇聯要求的憑藉將是這樣：她要給窮困的阿拉伯農民以一種結束地主的剝削和經濟現代化的希望。』

『為英蘇雙方計，維持維邱史原來的政策，無疑地要比較聰明。至少，在口頭上，這種政策互相承認各別的勢力，在尊重各別的利益的基礎之上合作，一致地為着增進落後的民衆的生活標準而努力。』

我要強調，如果容許目前的衝突繼續進行，一定要釀成大禍。美英蘇在中東的合作似乎是一種遠較『明智的夢想。』

四

無論如何，如果三強採取比較明智的合作策略，則各種問題便可以在保障列強的正當利益和顧全對弱小民族的道義的方式下得到解決。對主要的問題加以分析便可以證明這是正確的了。

首先，讓我們說明列強的正當利益吧：英國在中東的利益是從石油與交通的觀點上取得優先權。英國跟蘇聯不同，在國內沒有石油；英國又不是個緊密的大陸國，而是一連串遍布全球的領地。因此，如果英國要維持其帝國並做一個列強，她必須保持她底油源和交通綫。

蘇聯在中東有兩種主要的利害關係：她需要一個通往溫暖的海洋的出口；懼怕在近東與遠東有一道反蘇或反蘇維埃的警戒綫。第一種顧慮引起了蘇軍在伊朗的示威和對土耳其的要求——實在是集中在海峽的要求；第二種顧慮推動了蘇聯反英的一切詭計。

美國與法國同樣關心中東的石油和其他的資源，並且在這區域裏有着宗教的和情感的聯繫。

列強這些正當的願望並不是完全不相容的，而他們的並存將遠較現行的制度更能使中東的人民——我指的是民衆而不是統治階級——幸福。

列強間真正的諒解可以容易地處分中東的三種主要國際財產：石油，蘇彝士運河和海峽。只要牽涉到石油的問題，如果相互間的恐懼和不信任能夠除去，則在各方面開拓地域的區分是沒有困難的。中東的石油足夠滿足一切

的需要。進一步言，這種天然的富源可能而且應該為中東人民本身的福利而使用，在中東的土地上投資，用在開發的計劃上，可以把當地的民衆從現在的困厄中拯救起來，這是西方的能力所能辦到的。

如果把海峽和蘇彝士的問題同時處理，並且適用同一的尺度，便容易得到一個正當合理的解決了。每一處都是一道國際航線，而與一個強國發生衝突的關係：蘇彝士運河是英國海軍交通的主要動脈，而博斯普魯斯與達且尼爾海峽是蘇聯到地中海唯一的出口。事實上，蘇彝士運河可能為埃及獨立的主要障礙，而這兩個海峽構成了土耳其國家安全的主要危險。這兩部分的國際權威是太大了，不能安全地把握在弱小民族的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海峽曾經一度國際化，但不久又回到土耳其的統治之下了。蘇彝士運河現在在英國手裏，到一九六八年便要歸還埃及，完全由埃及統治了。當然，解決的途徑在於對這兩道航路的國際管理權的建立。在蘇彝士運河的管理機構中要由一個英國人爲主管，在海峽的管理機構中要由一個蘇聯人做首長。埃及和土耳其應該從航路的交通上得到他們的歲入，但他們不能要求或希望對這些富於國際意義的戰略地位負起單獨的責任。

五

如果以誠信把國際合作的原則同樣地用在中東地方上的問題和衝突上，則一切的事情都可以解決。要是英國企圖防止蘇聯闖入地中海和紅海，則北非、利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的前義大利殖民地都會繼續招致國際的糾紛。蘇聯曾經要求利比亞的單獨託治權，這也許是海峽爭論中的一種講價還價的策略。英國鼓勵阿拉伯聯盟要求其領土的獨立，這不過是一種笑話而已，因爲這個沙漠國絕不能夠執行其國家職權。一種美英蘇的共同託管制度，和着厄立特里亞一部可能的讓與，包括一個到達紅海和阿比西尼亞的出口，是能够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爲當地人民的利益而開發這些地方的唯一制度。

像在利比亞一樣，在亞塞爾拜然和庫提斯坦，三強的共管權將是一種最

善的策略。關於亞美尼亞和喬治亞蘇維埃共和國的要求，在作任何決策之前，應該對其歷史背景與現時情況作一番國際的研究。無論如何，應該記住，亞美尼亞人只有一個大集團在蘇聯境外，在黎巴嫩有超過十萬的人數。對於黎巴嫩問題，如果在保障其基督教羣衆的生存發展的途徑上謀解決，則這十多萬亞美尼亞人的問題將失去其緊張性了。

我們還要注意中東的三個主要集團：阿拉伯回教徒，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以外的小數基督徒。這三者現在面對着同一的敵人——由反動的酋長，封建的地主與落後的牧師所推動，而由英國所引導的狂熱的『汎阿拉主義』。這不但跟猶太人的巴勒斯坦與基督徒的黎巴嫩站在對立的地位，而且與阿拉伯民衆的重要利益背道而馳。

『汎阿拉伯反動』的恐怖常常被引爲波爾夫不履行諾言的主要理由。（譯者按：一九一七年英國政治家波爾夫發表宣言，定巴勒斯坦爲猶太人的故鄉）如果不是爲了這種恐怖，則許多人都會同意巴勒斯坦許給猶太人，而他們有回到故鄉的資格了。英美巴勒斯坦問題研究會所以屢次不能提出澈底解決問題的方案，其根本的原因是由於蘇聯不曾被邀請共同研究與共同負責。

英美蘇在巴勒斯坦共同託管權與法英美在黎巴嫩共同統治權的建立，可以解決中東的猶太人與基督徒問題，此外沒有別的辦法。在二三十年內，巴勒斯坦將成爲一個優異的猶太共和國，而黎巴嫩也成爲一個基督徒的國家。他們兩者將是進步的人類的忠誠合作者。他們兩者可以被信任尊重列強的正當利益並且注意他們的勞動羣衆底社會與經濟的需要。他們所需要的是一個時機，這時機只有在列強的協同下才能够給予他們。

一旦猶太人的巴勒斯坦和基督徒的黎和嫩以及列強的文明勢力穩固地建立起來，便能給伊拉克、敘利亞、和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國權開闢了進步的途徑。這種發展的先決條件已經具備了；許多世紀以來，他們已經在等待着賢明而善意的官吏的來臨和施政了。

法國大革命的起因和背景

F. A. M. Mignet著
西岑譯

米涅是法國王政復古時期三大史家之一，他的名著『法國革命史』對於卡爾·馬克思唯物史觀之形成很有影響，這一點樸列哈諾夫在他的某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過。他雖然在法國革命的每階段中都是寄其同情於較右的派別，但他也像法國當時的文壇鉅匠巴爾扎克一樣，儘管同情於已頹敗落的階級和人物，然對新興的階級和人物仍予以忠實的刻劃和描繪。本文係『法國革命史』一書的導言，分析革命的起因和背景極其客觀也極其精細，尤為新的歷史學派開山之作。

譯者

我準備將法國革命的歷史作一番簡要的考察，這革命開始一個新社會的紀元，亦猶之英國的革命開始了一個新政府的紀元一般。它不僅使政權更迭

，且使國家的內在條件亦全部為之改變。革命以前，中世紀的社會形態依然存在。土地被區劃為互相敵對的省份，人民被區分為彼此仇視的階級。貴族政治上的權力雖已全失，但他們的特殊地位却仍『原封未動』：人民無權利可言，皇室威權無限；苛政、階級的立法以及特殊團體的特權使法國陷於極度的紊亂中。革命卒以一種更合正義且更合時宜的制度代替了那些種政。它以法律代替了專制的意旨，以平等代替了特權；將人們從階級的區分下解放出來，將土地從各省的經界下解放出來；將工商業從公會和行幫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將農業從封建的隸屬和什一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將財產從限制承襲的障礙下解放出來，務使一切事物均處於一個國家，一種法律制度及庶民一體的條件之下。

法國革命為求實現這樣的大改革，須得戰勝無數的困難，一時的暴行自不免與悠久的福祉攪在一起。特權階級曾百計制止它；歐洲各國曾出面干涉它；因此而激起鬥爭，其奔發之情殆不可遏，其勝利亦不可限量。國內的阻力導來了羣衆的主權，國外的侵略導來了軍事的統治。儘管是無政府也好，

專制也好，目的總算是達到了：舊社會終崩壞於革命之中，在帝國之下終於建設了一個嶄新的社會。

當改革已成爲必要，且完成此改革之時機業已到來時，其勢殆不可阻遏，一切皆爲之助。倘是時人們能互相諒解，自可致於幸福；富者將斥其羨餘，貧者將以獲得其實際之需要爲滿足，革命於焉悄然實現，歷史家將永無暴行及流血事件可資紀錄；他只單純地展示人類向更智慧、更自由、更幸福的状态推移而已。但各國編年史中，尙不會出現過此類高貴犧牲的實例；那些人本應該自動犧牲的，却拒絕這樣做；那些人本需要這種犧牲的，乃至不得不訴之暴力苛迫的方式；善之實行——也像惡一樣——須藉助於侵佔手段，并挾一切暴行以俱來。人們自來徒知訴之於強力，而不知訴之於自主之力。

吾意以爲考察重要時期的史實——從三閱會議(States-general)開幕時起至一八一四年止——須於描寫革命之進展時，同時解釋其各種危機。蓋藉此可以窺見，那開端時頗有佳兆的革命，由於誰的過錯，後來却那樣可怕的惡化起來；法國怎樣的變成了共和國，又怎樣在共和國的廢墟上產生了帝國。這各種階段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蓋產生此不同階段之事變的應動力實不可抗。若以爲事能沒有可能換一副面貌，這種論斷固未免失之輕率；但革命

既由於那樣的起因，復誘致了、激起了那樣的熱情，自然會選擇那樣的道路并得到那樣的結果，這乃是當然的事。在未述及革命本身的史實以前，且讓我來分析一下，那成爲革命之導火線的三閥會議，究以何因緣而召集。於追溯革命之導因時，我希望顯示出，革命之不能避免，亦猶之不能加以控制一樣。

法蘭西的專制皇朝，自其建立以來即不會具有固定的形態及確定的、衆所共認的公共權力。最初國王係由選舉而來，主權在民，君主純然只是一個軍事首領，一切的決定，一切事業的推行，全視公共的表決以爲斷。國家選出首長，在戰神廣場(Champs de Mars)中，由君主主席，行使其立法權，在各地法庭中，由其職官之一出席指導，行使其司法權。在封建制度之下，此皇室的民主，變而爲皇室的貴族政治。專制的權力日益提高，貴族剝奪了人民的權利，亦猶之後來君主奪去了貴族的權利一樣。在這一時期中，皇位已成爲世襲；君主在政治上雖備虛名，但却變成了個別的采邑所有者；立法權屬之諸侯，在其廣大領土中或在男爵會議(Barons' parliament)中行使之；司法權屬之陪臣(Vassal)，在領地法庭(Manorial Court)中行使之。一言以蔽之，權力是在日漸集中，本來是由多數人轉入少數人之手的，後來復變本加厲的由少數人轉入一人之手。經過幾世紀以來不斷的努力，法蘭西的君主宰摧毀了封建的建築物，且終於在那廢墟上專制自爲起來，一步步的侵佔采邑，收服陪臣，壓制男爵會議，取消領地法庭或分別加以管制，既獲得立法權，復限定司法權的行使必須在法學家會議(Parliament of Legists)中代表君主且以其名義行之。

三閥會議本不經常存在，只是於窘迫時爲着增加補助費的目的始召集之，其成份係由國內三閥——貴族、僧侶、第三閥或平民——所組成。其初創時，適值皇室特權正在擴展中，故始則爲所控制，後來終於被解散了。歷來君主擴張權力計劃所遭到的堅強反對，很少自該會而來，因該會可由之任意

召集或解放，泰半係由貴族方面而來，他們初則爲着統治大權，繼則爲着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奮起與君主相抗。從非立·奧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到路易九世這一段時期中，貴族們努力的目標在於保持自己的權力；從路易九世到路易十四世這一段時期中，他們努力的目標在於成爲皇室的重臣。佛蘭德(Franche)派的運動，乃是貴族最後一次的反抗運動。在路易十四世治下，專制皇朝業已根深蒂固，且無可抗辯的統治着全國。

法蘭西的政府，從路易十四時起至革命時止，專制的程度已達於愈益橫暴的地步；因君主們所擁有的權力實較其所行使者爲尤大。對抗此侵佔無限權力的壁壘是如此的脆弱。國王可用密詔(Lettres de cachet)來處罰人民，用沒收手段來處分財產，用特別稅來處理公共收入。固然，某些團體具有那被喚作特權的防衛手段，但這些特權已不大被人重視了。大法院(Parliament)固有批准或否決特別稅之權，但國王可召開御前會(lit de justice)迫之承認，并用放逐手段來處罰其成員。貴族可豁免捐稅；僧侶可有『自由輸將形式』自動獻納之特權；某些省份享有減稅的權利，某些省份可自己決定稅額。這便是法蘭西的可笑自由，便連這點自由也只是有利於特權階級，有害於平民。

不自由的法蘭西，其內部組織狀態更爲惡劣；不公平的分配較之權力的濫用尤難容忍。那分爲三閥，三閥本身又分爲若干等級的國家，却成了專制制度的一切詬病和不平等的一切罪惡之犧牲品。貴族分爲：廷臣(他們全恃君主的恩澤，亦即是平民的血汗以爲生，其目的在於榮任各省首長或在軍隊中擢昇要職)；賜爵的新貴(他們掌管內務，其目的在於獲得總管之職，以便利用獲得的地位來營各種私利)；法律家(他們管理司法事務，只有他們纔有資格充任此職)；和土地所有者(他們利用着那殘存的封建權利以魚肉農民)。僧侶分爲二級：一種是主教和長老牧師，他們收入極豐；一種是傳教牧師，他們極其窘乏。那受宮廷之踐踏與貴族之凌辱的第三閥，其本身亦

分爲各種公會組織，而他們彼此之間却互相投報以從上層階級受來的毀謗與輕蔑。這一閥的人擁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却須向地主繳納封建地租，向僧侶繳納什一稅，向國王繳納捐稅。他們既不能分享政權，復不能參預行政，又不能充任公職以報償其一切犧牲。

由於路易十四世過份長期的緊張和過度的濫用，君主專制之主要源泉已爲之枯竭。由於酷愛支配，又因年輕煩躁之故而喜怒無常，他終於削平了一切的反抗，壓制了各種的反對，——如貴族的反抗，這表現於其叛亂之中，——如大法院的反抗，這顯示於其異議之中，——如新教徒的反抗，他們採取信教自由的方式，這使教堂方面目之爲異端，皇室方面目之爲作亂。路易十四世常用招入宮廷的方法來羈縻貴族，在那兒他們可沫寵尋歡以爲其內附之報酬。大法院自來本是君主工具，却企圖與之分庭抗禮，君主卒傲岸地迫使其藉口結舌達六十年之久。最後，南特敕令^①之廢除，乃使此項專制主義的工作得竟全功。專制的政府不僅不願受反抗，并且還要求其臣民從而附和之，仿效之。它於既經束縛人們行動之後，復進而迫害其信仰；它爲着繼續施行此項壓迫起見，常將那些不會觸犯他的人也置之法網之中。路易十四世運用此無限權力，內則與異端鬥爭，外則與全歐洲爲敵。此種壓迫爲野心家所翊贊，爲龍騎兵所執行，爲勝利所鼓舞；法蘭西的傷痕掩於桂冠，她的呻吟亦爲勝利歌聲所遮斷。但到後來，那班天之驕子們死去了，勝利也完了，工業也移到國外去了，貨幣也逃匿了；情形很顯然，專制主義之成功正以耗竭其源泉，且於來日未臨以前即已將其來日斷送了。

路易十四世之事實即反動的信號；至是人們的態度乃爲之激變，由難堪而趨於懷疑，由服從的精神轉而爲清議的精神。在攝政時代，那財富與知識併臻的第三閥已日形重要，至貴族則已失其尊崇，僧侶已失其信仰。在路易十五時代，宮廷方面屢從事於勞民傷財的戰爭，僅獲小勝，又復與輿論進行暗鬥，與大法院進行公開的鬥爭。無政府狀態乃乘機而入，大權旁落於君主

女寵之手，威信益墜，反對派則日有新的進展。

大法院的地位和制度都發生了變化。皇室授給他們以權力，現在他們却轉而以之反對皇室。按之普通經驗，同盟者於勝利之後，馬上即會決裂，故貴族爲大法院與皇室之聯合努力所顛覆以後，勝利者的內部亦隨即發生紛爭。皇室想用「鬼死狐烹」的手段來對付大法院，大法院也力求制馭皇室。這種鬥爭，在路易十四世治下君主佔勝，在路易十五世治下則勝敗參半，僅足以使革命暫歸停頓而已。就其本質講起來，大法院之被需，僅在其能作爲工具以資利用。特權的行使，及成爲獨立機關的野心，却驅使着它走向抑強扶弱的道路。它更番的佐君主以抗貴族，佐國民以抗君主。正唯其如此，它纔能在路易十五、十六兩朝深得人心，縱使它反對宮廷只是出於爭權之念。輿論不究其動機，其所讚美者非其野心乃其反抗行爲，其予以支持，乃因叨其庇護之故。由於這樣的鼓勵自會使之勇氣倍增，它對於當局已成爲一種不可侮的力量了。在打銷君主極度高傲和不容反抗的意志以後；在對「七年戰爭」提出抗議以後，在獲得對財政措施的監督及對耶穌會派 (Jesuits) 的破壞以後，它的阻力是如此的堅強而持久，使無往而不遭其對抗的宮廷，不得不於下列二途中選擇其一：或者是爲其所制，或者是將其制服。後來宮廷方面很想將首相毛滂 (Maupeou) 所建議的解散計劃付諸實施。這個大膽的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曾提議「把國王從法院的書室中救出來」，另組一個依權附勢的機關來替代那敵對性的大法院，全法國推事區中，有效巴黎榜樣者，一律如法加以泡製。

但政變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反對專制的潮流是如此的有力，致使君主亦爲之遲疑惶惑，且甚至還遭到他的宮廷的否決。一種新的權力出現——這

① 一五九八年四月十三日，法王亨利四世頒佈有名的南特勅令 (Edict of Nantes) 正式承認信教自由的原則，及新舊兩教的平等權利，至是乃爲路易十四世所推翻。——譯者。

便是輿論；這權力雖未被承認，其影響正自不弱，且其裁決開始具有無上的威信。前此無足重輕的『國民』(Nation)，現已逐漸擁有各種權利，且沒有一種力量足以與之分庭抗禮。這乃是一切新興權力必經的歷程；在他們未被延入政府之前，他們常自外加以監視；隨後便由監督權過渡到合作權。第三閣分享政權的時機終於到來了。在前一個時期中，他們企圖實現這一目的，但不曾如願，因為他們努力的時機還不會成熟。那時他們剛獲解放，尚未具備那造成優越地位且進而握取政權的條件；因為權利是只能由實力得來的。以故在歷次的騷動中亦猶之在歷次的三閣會議中一樣，它只是處於第三位；一切都是在它協助之下進行的，而它自身却一無所得。在封建的暴政期中，它會幫着君主反對貴族；當內閣的財政的專制制度盛行時，它又幫着貴族去反抗君主；但在前一個時期中，它單純的只是君主的奴僕；在後一個例子中，則只是貴族的奴僕。鬥爭所涉及的範圍，及引起競爭的利害關係，被視為與之毫無關涉。在佛蘭德時期中，貴族受到決定性的打擊時，它便放下了武器；這充份證明它所能發生的是何等次要的作用。

最後，在經過一個世紀的絕對服從以後，它又重新出現於戰場之中，但已是獨立的姿態了。過去了的絕無法挽回；現在貴族已無法重自失敗中崛起，亦猶之君主專制之不能重新回復其全盛時代一般。宮廷另有了一個反對者，因為它總得有一個的，政權是絕對不會沒有一個候補者的呀！第三閣的力量、財富、知識及團結力與日俱增，被注定了要從事戰鬥，且代之而興。大法院只是一個團體，不成其為階級，在這次新的角鬥中，它雖有助於政權的移轉，但却不能把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來。

宮廷方面對於第三閣的進步向上曾經盡過力，且對於它向上的主要方式之一——智識的發展，予以贊助。君主的極端專制，有助於人心的浮動，且不期而造成輿論。由於鼓勵性的褒揚，卒開啓了非議之門；因為我們不能召來一種有利於我們的檢察而到頭來不致反受其害的。當勝利歌聲、慶祝和詠

詞停止下來的時候，控訴開始了，十八世紀的哲學家卒繼十七世紀的文學家而興。一切的事物都變成了他們研究和批評的對象；政府、宗教、苛政和法律。他們宣佈了人權，暴露人們的願望，并斥斥不公平的現象。一種強有力的輿論形成了，政府遭其攻擊乃至不敢加以壓迫，甚至於不得不把那些受攻擊的人換去；廷臣由於趨時，當權者迫於需要，都不得不服從它的決定，改革時代為哲學時代所道來，亦猶之後者為文藝時代所道來一般。

這便是一七七四年五月十一日路易十六世即位時法國的狀況。財政短絀（這既非大主教佛里黑〔Cardinal de Fleury〕的復原內閣所能改善，亦非推赫雷長老〔Abbe Terray〕的破產內閣所能見功），威信掃地，難於制馭的大法院，以及操切的輿論；這就是新皇從他的前代所承襲下來的諸般困難。路易十六世，就其趨向及品性而言，是所有親王中最適合於其時代的。人民深惡專制，他傾向於放棄此種特權；人民痛恨路易十五世宮廷難堪的淫佚，而新王品德純潔，欲望單純；人民要求那已不可免的改革，他尊重公眾的願望，且以能滿足此種願望為榮。但行善與繼續作惡同其不易；因為無論強迫特權階級服從改革或強迫全國服從苛政，都需要有足够的精力；而路易十六世既不是一個改革家，又不是一個專制魔王。他缺乏那種在國內完成大變革的果斷，而此種果斷，無論是對於一個想限制自己權力的皇朝，或是想擴張權力的皇朝，都是同樣重要的。路易十六世賦有一種健全的品格，善良而正直的心腸，但他在行動中沒有忍耐及堅持之力。他的改良計劃，遭遇到他所不曾預見的阻礙，而他對於這些阻礙又不知如何加以克服。他於是停止其贊助改良的努力，一若他人亦可終止其阻撓改良的企圖一般。直至三閣會議召集時為止，他的治績殆表現於對改良事業長期而無結果的努力中。

路易十六世於其即位時選擇莫赫伯(Marquis)為首相，他的政府優柔寡斷，這顯然應該由他負責。新王年紀徂輕，深感責任之重大及自身能力之欠缺，他信賴着這位因反對宮廷女寵而見棄於路易十五世的七十三歲老年

人的經驗。但他所找到的只純然是一個廷臣，却不是一個政治家，而他的不幸的影響却與路易十六世的全期統治相終始。莫氏對於法國的福利及其主人的榮譽漠不關心，一心只打算如何去固全祿位。他住在凡爾塞宮裏，和君主的房間相連，主持着各種會議，使路易十六世的心靈變得游移不定，使他的性格變得狐疑莫決；他使之習慣於採取半步政策，朝令夕改，坐觀各種勢力相互齟齬，且特別教以自己不出面，一切事委之於人的必要。莫氏有選擇大臣之權，這些大臣便紛紛向他邀寵，猶之他須向君主邀寵一般。由於怕危及自身的地位，他把那些有與援的人一一排去，指定了一批需要他的援助以掩護自己并以實現其改革計劃的新人。他陸續引進杜葛 (Turgo)、馬勒謝伯 (Malessherbes) 和列克爾 (Neckel) 等人指導部務，他們每一個人都會按其專長在政府各部門中實行改革。

馬勒謝伯是法學世家的子弟，承襲了大法院的美德，却不會承襲他的偏見。獨立的見地與高貴的心腸兼備於他的一身。他希望給每一個人以應有的權利；給被控訴者以辯護權；給新教徒以信教自由權；給著作者以出版自由權；給每一個法國人以身體自由權；他并且建議廢止酷刑，重頒南特敕令，并廢除『密詔』及檢査制度。杜葛是一個元氣充沛、思想綿密且性格異常堅定的人，他想實現一種更廣泛的計劃。他聯合馬勒謝伯，庶幾藉其助力以完成一種使政府歸於統一使全國歸於平等的制度。這個精力絕倫的人，經常以改良人民地位為己任；他獨力從事於廢止奴役與特權的偉業，而這是在後一時期中，終於由革命完成了的。他主張把農村自賦役之下，各省自經界之下，商業自內地稅之下，工業自各種桎梏下一律解放出來，最後，則務使貴族和僧侶也像第三閥一樣，平均負擔捐稅。這個偉大的人物，馬勒謝伯譽之為『具有倍根的頭腦，勞批塔爾[●]的心腸』，他希望經由省議會使全國習於公共生活，以為恢復三閥會議之準備。假使他能够久於其位的話，也許他能以法令實現革命。但在特權與奴役制度下，一切謀公共福利的計劃都是行不通

的。杜葛因其改良傾向為廷臣所不滿，因其取消賦役、監護制及內地稅致為大法院所不悅，因其才識之優，深受路易十六世賞識，致召那位老首相之忌。君主卒捨棄了他，雖然同時注意到，只有杜葛和他纔是關切人民福利的僅有之人；君主們的地位是何等的可憐可歎呵！

在一七七六年繼杜葛而總管財政的是克魯奈 (Clugny)，他原是聖多明峨 (Saint Domingue) 的總管，六個月以後，他又為列克爾所代。列氏原是一個外國人，他是新教徒，又是一個銀行家，與其稱他為大政治家，不如稱之為大行政家來得恰當；他設想了一套改良法國的計劃，不像杜氏的那樣廣泛，執行時又出之以十分緩和的態度，甚得時人的贊助。他之被任為大臣，原為羅維巨欸以供應宮廷，他便利用宮廷的窘迫以獲致人民的自由權利。他用命令來重建財政系統，且使各省穩健地協助其行政。他的觀點是聰明而且公道的；他的主要着眼點在於力求收支的均衡，其方法不外：擯節開支；平時取給於稅收，在急迫情形中，借征將來的稅成為必要，則取給於公債；使各項稅收由省議會核定其數額；且為便於推行公債計而創行公佈財政收支的辦法。這種制度是根據公債的性質而來的，因發行公債需要信用，需要行政的公開；這制度又是根據稅收的性質而來的；因徵稅須國人承認，且需參預其行政管理。任何時候，政府應到財政短絀須籌補時，它倘若向承銷公債者開口，那便一定要製一份決算表；倘若向納稅者開口，那便一定要讓他們分享一部份政權。因此，發行公債引起了財政報告問題，增稅又引起了三閥會議問題；前者使當局處於輿論制裁之下，後者則使之處於人民裁判之下。列先爾對於改良事業雖不像杜葛那樣操切，可是他也想予苛政以更張，像他的前任想予以徹底的破壞一樣，但他并不比杜葛更為幸運。他的緊縮政

[●]M. L'Hopital 十七世紀時人，早年曾就學意大利。寬容令之頒佈，氏與有力焉。氏力主對異教徒只應施以文字攻擊而不應加以迫害，新教徒之享有自由集會權，氏之力也。——譯者。

策爲廷臣所不悅；由各省市議會核定稅額的步驟，又召來那希望壟斷反對權的大法院的非難；首相又因其聲譽日降而不能予以容恕。他終於一七八一年被迫離職，這在公佈那著名的報告書數月以後，而這一報告書使全法國人民猝然明瞭國事的真象，且使專制政府永遠失去了存在的可能。

列克爾辭職不久之後，莫赫伯便死去了。路易十六世的皇后起而承襲了他對君主的影響。這個善良而軟弱的君主，經常需要人指導他。他的皇后年青、貌美、積極而又富於野心，對他取得了絕大的支配力。瑪麗·特麗莎（Marie Therese）的女兒，太像她的母親了，也可以說太不像她的母親了。她將輕佻的舉動和支配慾聯在一起，其所以攬權，只是爲着安插一些人來斷送她自己與國家而已。莫赫伯因不信任舊的廷臣，經常選任了一些深孚人望的大臣；他固然不會支持他們，但縱不會爲善，至少也沒有增加罪惡。在他死後，舊的廷臣代替了深孚人望的大臣，由於這些人的過失，致使他人力求用改良方法以謀補救的危機，卒一發而不可收拾。這種不同的選任方法是極堪注目的；蓋由於人的變更帶來了行政制度的變更。革命確從這個時期開始；拋棄改良計劃與恢復無秩序的舊態，使革命加速到來，且助長了羣情的憤激。

卡隆列（Calonne）從州知事的地位被召來綜理全國財政。在一七八三年卡氏未被委任之前，已經有兩個人相繼接替過列克爾的職務。卡氏是一個大膽的、聲名顯赫的且富於辯才的人；他極其整暇且賦有豐富的心靈。不知是由於無心之失，還是由於有意鑄成大錯，他竟一反前任之道而行。列克爾力主節約，卡氏却自詡其浪費政策。列克爾由於廷臣而倒台，卡氏則力求得到他們的擁護。他的詭辯是以豪奢爲本的；他用盛宴來穩住皇后，用恩俸來羈縻貴族；他大規模的增發紙幣，顯得他的財政手腕廣大、靈活，好使一般人信服他的觀點果然正確；他甚至於以身作則的按時支付到期借款，藉此欺騙那些資本家。他在平時仍繼續舉借公債，致把列克爾經由明智舉措替政府

掙來的信用喪失殆盡。事實既已如此，增闢財源之法又一籌莫展，他爲了固全祿位起見，乃不得不訴之於增稅之一途。但他能向誰伸手呢？人民已不堪担負，而特權階級又什麼也不願拿出來。可是這必須即作決定，卡氏深寄希望於新花樣之中，乃於一七八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在凡爾塞召集名流會議（Assembly of notables）。但俾人莫息願以證明那建基於豪奢上的體系到了末日。一個由『子』得勢的大臣，是不能由『取』來維持其自身地位的。

政府自上層階級中挑選出這些名流來，組成一個行政會議，這既不是經常存在的機關，也不是一種專門委員會。卡氏原意自然是想避開大法院和三閣會議逕向這種比較帶附屬性的會議致詞，以爲總易於駕馭一些。但此會既由特權者組成，自難望其作何犧牲。當他們看到吞滅一切的政制所擁成的深淵時，更無意出此了。他們很吃驚的發覺到，幾年之間，公債總額已達十六萬萬四千六百萬佛郎之鉅，而歲入的短絀竟年達一千四百萬佛郎。此項暴露，實即卡氏倒台的信號。他終於倒台了，由他在會議中的政敵森區大主教（Archbishop of Sens）布利列（Brienne）繼之。在布利列想來，大多數的名流是會傾向他的，因爲他們曾與之聯合以反對卡氏。但特權階級之不甘犧牲，初不因人而易其態度；他們幫助布氏攻擊政敵，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是爲了布氏的野心，這對於他們是不感興趣的。

被非難爲缺乏計劃的森區大主教，實無法制定一種計劃。他既不容繼續卡氏之豪奢；而回復到列克爾的緊縮政策又爲時過晚。節用在前一個時期固爲安全之道，但在此時却不靈了。這時僅有三途可循：或求增稅，此爲議會所反對；或者舉債，但已經沒有信用；或者要求特權階級犧牲，但他們并不願出此。視祿位爲人生主要目的的布氏，處境既艱，手腕又弱；結果空懷壯志，一無所成。他的精神是很積極的，但缺乏精力；他的性格輕率而沒有定力。行動之前他很勇敢，但其後却又軟弱起來，由於沒有決心，缺乏先見并經常改變方法，他毀了他自己。本來只剩下一些不高的步驟可資採取，

由他不能選定其一而始終貫徹之，這是他真實的錯誤。

名流會議是不甚就範且極端吝嗇的。在批准組織各省省議會、管理穀物貿易、取消舊役 (Corvées) 及一種新印花稅以後，便於一七八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散會了。他們把這次的發現，如關於君主的窘迫、大臣們的錯誤、宮廷的浪費以及人民無可挽救的不幸，散佈到全法國。

失去了此項援助的布利列，乃轉而乞靈於曾放棄過一個時期的增稅辦法，以求增闢財源。他向大法院請求將兩種敕令——印花稅與地方補助費——予以備案。但正當精力瀰漫野心蓬勃時期的大法院，內閣的財政難關適足以助其擴張權力，乃拒絕予以備案。他們被放逐到特洛伊 (Troyes)，對流放的生活感得厭倦，內閣乃以接受上述兩種敕令為條件，允將其召還。但這只是敵對行為的暫時終止；君主的窘迫立即使鬥爭更為頑強而猛烈。財政大臣又提出一些籌款的新申請；他的生命完全托之於一串公債的發行，其數額竟達四萬四千萬佛郎之多，這必須得到備案纔行。

布利列預期到大法院的反對，乃藉『御前會』以取得此項勅令的備案，但為着緩和推事們及輿論的情緒起見，在這次會議中又提出了恢復新教徒權利的議案，同時路易十六世又允准每年公佈財政情形，且在五年以內召集三閣會議。但這些讓步已不充分：大法院拒絕備案，且起而反對內閣的專制。某些會員，奧爾良公爵 (Duke of Orleans) 亦在其內，卒被放逐。大法院通過反對密詔的議案，并要求召還他們的成員。此議案雖為君主所取消，但為議會所堅持。戰鬥的空氣於是濃厚起來了。

巴黎推事區為全法推事區所支持，且為輿論所鼓勵。他們宣佈了國民的基本權利及其自身無批准增稅之權；並且由於利害關係而傾向自由，由於壓迫而變為激昂慷慨，他們宣佈反對暴虐的禁錮，且要求經常召集三閣會議。在此項勇敢行動之後，隨又議決該院成員不能免職，且不容任何人侵害其職權。這大膽的宣言召來了以下的後果：會員兩人——德卜利門尼爾 (Duplomb)

menil) 和弱斯拉德 (Goussard) ——被捕；大法院改組，另行創立一個擴大宮廷會 (Plenary court)。

布利列深知大法院的反對是有系統的，每一次補助費的新要求，每一項公債的認可，都會要引起新的反對。放逐手段雖有補於一時，但只能使反對暫停，而不能澈底予以消泯。他於是計劃着將大法院降為純粹的司法機關，且與堂顯大臣拉邁濃 (Lamoignon) 相結合，以圖實施此方案。拉氏是一個工於政變的人。他具有膽識，毛滂的果決，高度的審慎和剛直他兼而有之。但他對於政權的強制力究有多大，及何者能在當時行之有效的問題，看法頗有錯誤。毛滂用更換成員的辦法來改建大法院，拉邁濃却希望使之完全解體。前一方法若能有成，僅足以造成暫時的寧靜；後者則足以一勞永逸，因其在破壞大法院的權力，不似前者僅圖加以更張已也。不過毛滂的改造永無止境，而拉氏的辦法又窒礙難行。後一方案的實施終於精密的計議定了。在同一天當中，全國法院的推事均遭放逐，以便新的司法組織代之而興。這位堂顯大臣剝奪了巴黎大法院的政治屬性，以之授於由大臣級的人所組成的擴大宮廷會，且削減其司法權以加惠於一般裁判吏，他把後者的裁判管轄權大予擴張之。輿論憤激起來了；小宮 (Chatelet) 方面提出了抗議，各省聞風興起，此擴大宮廷會既不能組成也無法行動。風潮發生於道芬尼 (Dauphiné)、布利坦尼 (Brittany)、普魯芬司 (Provence)、佛蘭德 (Flanders)、蘭日多克 (Languedoc) 及比戎 (Bearn) 諸省；內閣以前只是遭到大法院的經常反對，現在却代之以更有聲色且帶有叛亂性的反抗了。貴族、第三閣、各省甚至僧侶都參加在內。布利列迫於金錢的需要，召集了一個僧侶的特別會議，隨即向君主進言，要求撤消擴大宮廷會，并恢復三閣會議；此後只有該會纔能補救財政上的紊亂狀態，保證國債并終止當局間此類衝突。

森區大主教，由於他和大法院的爭執，製造出一種政治上的糾紛，卒延緩了財政上的困難。當前者緩和下來時，後者又重新出現了，這使他的引退

無可避免。布利列既不能增稅，又不能發行公債，擴大宮廷會既無法利用，大法院又不願召還，最後的一着，只好答應召集三閣會議。由於這種方法加速了他的倒台。他被召到財政部，要他設法補救由他所增大的財政困難，并籌措他所未能籌到的款項。其所以致此，蓋因他曾觸怒全國，激起了全國各團體的騷擾，連累了政府當局，且使三閣會議之召集無可避免，而此舉則被宮廷視為最壞的籌款方法。他於一七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下台。倒台的原因係由於債息的停付，此乃破產的開始。這位大臣最受非難，因為他是後來的一個。他承襲了過去的錯誤與困難，而他僅採取了一些不充分的手段以與其處之困難地位相搏鬥。他曾經試用過陰謀和壓迫；他對大法院會加以放逐，停止其職權并予以解散；一切都成了他的障礙，他孤立無援。在長期奮鬥之後，他倒於疲倦和衰弱之中；我不敢說這是由於他沒有能力，即使他再堅強些，再老練些，即使他是黎塞留 (Richelieu) 或蘇雷 (Sully)，他仍舊是會要倒台的。這已不復屬於任何人強制籌款或壓迫人民的問題了。所能為之原諒的是：他那無以自拔的地位，並不是由他造成的；他唯一的錯誤是在於貿然接受了這一職位。卡隆列利用列克爾所獲致的信用以達浪費之目的，他却承襲了卡氏的過錯而倒台。前者破壞了信用，後者思以強力重建之，却把威信破壞了。

召集三閣會議變成了政府唯一的方法，君主的最後手段。一七八七年七月十三日帝國的大法院和貴族們會熱烈提出此項請求；道芬尼省在維奇爾 (Vielleville) 會議中以及僧侶在巴黎的大會中，均曾以此為請。各省為之作輿論上的準備，而名流們則為其前驅者。一七八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君主已允於五年內召集之，翌年八月八日乃決定提前於一七八九年五月一日正式開幕。列克爾被召還了，大法院恢復了，擴大宮廷會撤消了，裁判區制廢除了，各省都滿意了；新任大臣準備一切以從事代表之選舉及各閣之拉攏。

此時反對派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前此他們是一直保持着一致的。在

布利列時代，內閣遭到全國各團體一致的反對，因為他們受到了內閣的壓迫。在列克爾時代，內閣也遇到同樣團體的阻礙，因為他們希望把權力握為己有，把壓迫施之人民。專制的政府變成了尊重民意的政府，但仍不免遭到他們的反抗。大法院是為着統治權而不是為着公共的福利繼續鬥爭；貴族與三閣聯合一致，與其說是為了愛護人民，毋寧說是為了反對政府。所有的團體都會要求三閣會議；大法院希望能支配它，像一六一四年的情形一樣；貴族則希望重新恢復其業已喪失之影響。因之，法院方面建議，一七八九年的三閣會議應以一六一四年的為榜樣，輿論則加以排斥；貴族拒絕同意第三閣的雙倍代表權，此兩閣復趨於分裂。

雙倍代表制之要求，係由於時代知識、改革需要及第三閣所已臻的重要地位而提出。在各省會議中，此項原則業被引用。布利列於離職之前，會要求當代作家發表意見，俾知何者為組織及召集三閣會議最佳的方法。在那些擁護人民的著作中，息耶 (Sirey) 「論第三閣」，鄧特萊克 (D'Herbainville) 「論三閣會議」的有名論文，赫然亦在其列。

輿論日益堅決，列克爾雖想滿足此項要求，但又不敢直接做主，他希望調和各閣俾獲一致之同意，乃於一七八八年九月六日召集第二次名流會議，以討論三閣會議之組成及會員選舉問題。他原想勸誘該會接受第三閣的雙倍代表權，但終遭拒絕，本來應該不問名流們意見如何單獨加以確定的問題，至是仍不能自作決定。列克爾並不是一個預先鏗除阻礙以避免爭執的人物。他對第三閣的雙倍代表權問題，以及後來所發生的按閣或按人數表決的問題，都不肯採取主動的地位。當三閣會議集議時，此攸關於政權狀態及人民地位的後一問題，只好訴之暴力以求其解決。

列克爾因第三閣的雙倍代表權不能通過於名流會議中，乃召開閣議予以通過。九月二十七日的皇室宣言，勒令三閣會議之代表人數至少應達千人，第三閣的代表則應等於貴族僧侶兩閣代表人數之總和。列克爾更得到允許

將下級牧師加入僧侶階級將新教徒加入第三閣之中，好讓他們能選出代表。地方會議被召集來進行選舉；每一個人都努力運動己方的人當選，且紛紛宣言以表示其觀點。大法院在此次選舉中影響很小，宮廷則全無影響。貴族雖也選出了幾個深孚人望的代表，但大多數均只是忠於該閣本身的利益，對於第三閣，猶之對於宮廷方面大家族的寡頭政治一樣，極端予以反對。僧侶選出了一些主教和長老為代表，他們深與特權階級相結納，至一般牧師的代表則擁護民衆的——亦即其自身的事業；最後講到第三閣，他們所選出的代表，開明、堅定且願望一致。貴族代表共為二百四十二位紳士，其中有二十八位原為法院中人；僧侶方面有十八位大主教或主教，三十五位長老或教區牧師和二百零八位普通牧師；平民方面選出了兩位教會中人，十二位貴族，十八位村鎮長，兩百位縣議員，二百十八位律師，十六位醫生及二百十六位商人和農民。三閣會議的開幕期則在當時業已規定為一七八九年五月一日。革命便這樣發生了。宮廷起初曾無效的試加阻止，隨後則努力加以撲滅。

。君主在莫赫伯氏的指導下，曾選任過一批深孚人望的大臣，試圖改革；後來在皇后的影響下，却選任了一批廷臣，企圖樹威。施行壓迫亦猶之實行改革一樣，均少成效。在將緊縮實之於廷臣，征課實之於大法院，公債實之於資本家以後，他又來尋求新的納稅者，并向特權階級發出呼籲。他要求那些名流（包括貴族和僧侶）分担國課，但為所拒絕。他於是第一次的向全法國求助，乃有三閣會議之召集。在未向全國交涉以前，他先向各團體洽商，只是在後者拒絕時，他纔轉而向那素畏其干預與協助的權力呼籲。他寧願與那些個別的，本應處於次要地位的非正式會議相商洽，而不願與那聯合一切勢力代表全國利益的大會相週旋。直到這個大時代為止，每年都看到政府虧負的增加，反抗亦因之愈烈。反對的趨勢由大法院轉到貴族，由貴族轉到僧侶，更由僧侶轉到人民方面來。他們各視其參加政權的程度以開始其反對運動，直到這一切私人的反對溶化或消逝於全國反對的大潮流中為止。三閣會議只是把那業已形成的革命正式予以議決而已。

本誌發行部為預約發售『合訂本』特別啓事

本誌一至六期合訂本，發售預約期間，原定十一月底截止。祇因存書不多，僅裝成六百餘冊，未及一個月，即承各界踴躍預約，訂購一空！今後惟有再版出書；同時將前訂發售預約期間，提前至本年十一月一日截止。并重新訂定『再版合訂本』發售預約如后：（一）自第一卷創刊號至第六期，合裝成一巨冊，封面用厚紙精印。（二）全書一百萬言。計五百面頁。（三）定價一萬五千元。預約發售，八折優待，計一萬二千元，掛號郵寄費在內。（四）發售預約期間，自卅五年十一月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底截止。（五）預約函款（郵票通用），俱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十六號本誌發行部收。

求真雜誌社發行部啟

卅五年十月廿五日

中國農業的階級構成

天野元之助著
李 炎 彬譯

關於中國農業問題，因為統計材料的不足，一向在黑暗之中。同時，方法的不健全，更使這方面的研究簡直可以說是一片尚未被開墾的處女地。國外方面，除了匈牙利人馬札亞爾在十多年前寫過一本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而外，其餘的值得提起的，可以說是很少很少，這幾年經中國農村雜誌一派人士的提倡，方才引起各方面的人士注意。八年戰爭中，日本人方面研究中國是非常熱烈的，但成績可並不多，這位天野元之助先生，因托庇在華侵略機關滿鐵調查所之經濟與便利，潛心研究中國農業問題，下了十幾年的苦功，可以說是頗有成就，本篇係選譯其論文一部份。因其方法與材料，兩皆新穎可取，希望國內人士能予以深切的注意。中國農業問題，最後的究極的說來，就是中國的土地問題，這是中國目前的根本問題。這個根本問題不能合理的解決，就可以決定我們國家的命運，甚至可以決定我們整個世界的命運，我希望這篇譯文能引起社會上廣泛的研究土地問題的興趣。

譯者 附誌

一 耕地問題

一 耕地面積

關於中國耕地面積，因為官廳統計的不足信賴(註)所以在各學者之間盛行着許多推定。其中劉大鈞氏的『中國農田統計』(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經濟問題』(民國十八年三月輯錄)與張心一氏的『中國農業概況估計』(民國廿一年十二月)的數字，大體成爲今日諸資料的基礎。例如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情報告』，就是以張心一氏估計作準則的。可是這些數字，並不能說它完全正確，因而在此打算以南京金陵大學喬啓明、蔣傑兩先生部分調查及其他資料的改正數字，來作爲示例。從之，二十三省的耕地面積約有十二億七千萬市畝，其墾殖指數隨各省情形之不同，總平均不過只有二二·三%

註、土地所有者，當將其所有地短報，求免課稅，對於新墾地往往隱瞞。在

官廳方面，也是馬馬虎虎，(這一點，從前談到，以後還要提起)。如上海附近的

揚子江三角洲四縣土地之陳報及清丈，結果顯示較以前課稅地增大一二·六%到

三五·三%，平均增加二二·三%，即其一例。(J.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37 Chap. VI. The Land)

二十三省耕地面積表

省 名	總面積(市畝)	耕地面積(市畝)	墾殖指數
河 北	三〇,六八,四〇五	× 九,五三,三九一	四三·一
山 東	三〇,五六,六九〇	× 一〇,一六,六〇六	四三·一
山 南	二八,三三,〇六五	× 一〇,五三,三二〇	四〇·四
河 南	三三,七六,九九五	× 五,五八,二〇六	一六·四
山 西	二九,一六,四二五	× 三,九三,九九六	一三·六

甘肅	五九,二四九,二五五	×	二二,六六六,八二六	三八
江蘇	一五八,四四六,九九〇		一〇七,八七五,一六〇	六八一
安徽	一一五,一〇二,四六〇		八五,六〇九,八六〇	四〇〇
江西	二五二,三五四,〇八〇		七五,七〇六,二二八	三〇〇
湖北	二七九,一六二,二二〇		一七九,〇〇三,五八六	四六五
湖南	三三三,一八五,三六〇		一一三,一一四,八八三	三五〇
四川	六〇五,四〇〇,〇五五	×	八八,七四四,二七五	一四七
浙江	一〇七,〇六七,一六〇	×	五三,三三七,四七	三四五
福建	一八八,五七七,二四五	×	二二,四六四,〇六四	一一八
廣東	三三三,七六五,〇一〇	×	五九,一三三,七六五	一一七
廣西	三三九,八二二,一九〇		四〇,九九四,四九三	二二四
雲南	五九,八七〇,四〇〇		二七,九二〇,二九三	四六
貴州	二六四,七二〇,二二五		二二,四九三,二八	八二
本部十八省合計	五,四九四,一七四,七七〇	一	三,三三三,五〇〇,一五	平均
察哈爾	〇八八,三〇〇,二六〇	×	一五,五八八,八三三	〇四
綏遠	四三六,〇〇三,〇〇〇		一七,七七七,一〇〇	三八
甯夏	四三三,六七四,七六〇	×	一,四〇六,八八六	四〇
青海	〇〇〇,二二二,〇〇〇		七,八〇八,二二六	七〇
新疆	一,一四六,二二二,〇〇〇		一四,九三三,二二六	〇六
邊區五省合計	四,八五二,五九〇,三三〇		五七,六六四,四七六	平均
全國廿三省合計	一〇,三四六,七六四,一〇〇	一	三,九〇〇,九七六,一〇	平均

【備攷】喬啓明、蔣傑『中國人口與食糧問題』（民國廿六年四月）

總面積依據參謀本部陸地測量局統計。（曾世英『中國各省區的面積』『測量公報』第廿四期民國廿一年十月三十日）

×河北、山東、河南、山西、甘肅、四川、福建、廣東、察哈爾、綏遠、甯夏

十一省耕地面積，係採用張心一的估計，將舊制畝以〇·九二一六市畝的標準來換算市畝。

陝西的數字係採用資源委員會最近的統計。但是，這個統計的結果，證明土地面積比起陸地測量局數字較大；因之，只採用一一·六墾殖指數來乘上記土地面積而算出耕地面積。

江蘇的數字，係採用上記資源委員會統計，以上述的方法來算定的。

浙江、雲南的數字，是根據陳長衡「我國土地與人口問題之初步比較研究及國民經濟建設之政策商榷」『地理學報』第二卷第四期（民國廿四年十二月）所發表的數字。

廣西的耕地面積，係由資源委員會測量十萬分之一的陸地測量局軍用地圖及『第二回廣西年鑑』材料做成。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墾殖指數，係根據劉大鈞『中國農田統計』最後校正的數字，再由其指數算出耕地面積。

貴州數字因張心一的估計缺一縣，故照該省八十四縣的比例，加上一縣。

新疆數字因張心一的估計缺十縣，故照該省六十五縣的比例補作。

青海數字，係根據中央農業實驗所呈報該省各縣耕地面積，再參攷丘成初「青海各縣土地人口調查」『農報』第二卷第一期（民國廿四年一月一日）中之材料而作成

再者，根據唐啓宇先生之推定，二十三省的耕地面積，約為十二億三千萬畝，其墾殖指數不過一〇·九%，較之前表更低一·四%。

二十三省耕地面積表

省名	總面積	耕地面積	墾殖指數
河北	三三六,七三〇,七六〇	一一七,五五六,六三三	三五·三
山東	二五〇,一〇〇,九〇〇	一〇八,九三三,四四六	四三·五
河南	二七九,一三七,六〇〇	一〇七,八二二,五五九	三九·〇
山西	二六六,一四一,四〇〇	五九,九九〇,四〇〇	二二·五
陝西	三二七,〇〇六,五〇〇	五五,四四六,六三三	一七·四

甘肅	六九、八九〇、〇〇〇	三〇、二五〇、八三三	四、八八
江蘇	一七二、九五一、六八〇	一〇、六四〇、四七七	六〇、三六
安徽	三三三、四七四、九四〇	五五、八七〇、五五三	三三、九三
江西	二七三、八二一、五六〇	五六、七〇八、四四九	三〇、七一
湖北	二九九、〇三〇、九四〇	五二、三四三、六二二	一七、一七
湖南	三三〇、〇六六、七〇〇	五三、五二一、五七〇	一五、二六
四川	六五六、九五六、四四〇	九八、五三三、四六六	一五、〇〇
浙江	一六四、四七七、二四〇	四一、〇五六、〇二五	二四、九九
福建	一七〇、〇三三、七〇〇	二六、九三三、二四〇	二二、六六
廣東	三六四、三九九、三六〇	四二、五九〇、一〇一〇	二一、六九
廣西	三三三、七三〇、九六〇	八五、六三三、五三二	三三、三三
雲南	六四八、七五五、四八〇	三二、七九七、五二二	三、三六
貴州	二七三、三三九、五〇〇	五〇、五五〇、一五二	一七、六〇
本部十八省合計	五、九六六、六三三、四八〇	一、六三九、九七八、八七七	平均 一九、五九
察哈爾	二二、一四八、六〇〇	一六、八〇七、八八九	三、九九
綏遠	四九四、八八六、三二〇	三三、五七七、三三四	四、五五
甯夏	四九二、二七〇、四八〇	二二、一六六、七四四	〇、四三
青海	一、三三九、二七七、九三〇	一、一〇六、〇六〇	〇、一七
新疆	二、六七一、〇〇〇、一三〇	一、六三〇、三〇一	〇、六〇
邊區五省合計	五、三九四、三三三、六〇〇	五九、五七九、三六六	平均 一、二二
全國廿三省合計	一一、三六〇、九六六、〇八〇	一、二七〇、五五八、一七五	平均 一〇、八九

【備攷】唐啓宇「我國土地之墾殖指數與可耕地指數」『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二十五年七月三十日）

此外，土地委員會的推定表，僅限於二十省八百四十縣。它的墾殖指數，比起上記兩表較高——約為二二・二％。

二十省八百十四縣墾殖指數表

省名	調查縣數	墾殖指數	省名	調查縣數	墾殖指數
河北	八四	四六、八八	四川	二一	三二、五二
山東	八四	四八、二八	浙江	六一	二八、三九
山西	一〇四	二四、三五	福建	四八	一二、七七
陝西	五六	一七、八六	廣東	五	七、二七
甘肅	三四	八、四五	廣西	九	一〇、一〇
江蘇	六一	六〇、八四	雲南	三一	七、二九
安徽	四〇	二三、四四	貴州	二五	一九、八二
江西	二四	二〇、一一	察哈爾	一五	四、三六
湖北	四九	一七、八四	甯夏	一〇	四、六一
湖南	四四	一五、二七	青海	一〇	四、一二
平均計		八一四	二二、三四		

省名	喬啓明蔣傑 兩氏推定	唐啓宇 氏推定	土地委員 會推定	省名	喬啓明蔣傑 兩氏推定	唐啓宇 氏推定	土地委員 會推定
河北	四五、二五一、三	四六、九	福建	一一、八	一一、三	七二、八	
山東	四四、二四三、六	四八、三	廣東	一一、七	一一、七	七、三	
河南	四〇、三三九、〇	—	廣西	一二、四	二三、九	一〇、一	
山西	二三、〇二二、七	二四、四	雲南	四、六	三、四	七、三	
陝西	一一、六一七、五	一七、九	貴州	八、一	一七、六	一九、八	

【備攷】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以上係最近發表，號稱權威的推定表，拿它和各省比較起來，時常能看出顯著的不同的。在利用中國的統計時，是很有必要去蒐集和整理、檢討它。從這個意味上，參攷以上三表所體現墾殖指數來作成一覽表，只是爲了比較便利而已。

二十三省墾殖指數表

甘肅	三、八	四、九	八、五	本部十八省平均	二二、一一九、六三三、六
江蘇	六八、一六〇、三六〇、八	四、〇	四、〇	察哈爾	四、〇
安徽	四〇、〇二三、九二三、四	三、八	四、六	綏遠	四、六
江西	三〇、〇二〇、七二〇、一	〇、四	〇、四	甯夏	四、六
湖北	四六、五一七、二一七、八	〇、七	〇、二	青海	四、一
湖南	三五、〇一五、三一五、三	〇、六	〇、六	新疆	〇、六
四川	一四、七一五、〇三二、五	一、二	一、一	邊區五省平均	一、二
浙江	三四、五二五、〇二八、四	一、二、三一〇、九	一、一〇、九	全國廿三省平均	一、二、三一〇、九

再者，爲了參攷上的必要，還可一看特賴貢尼氏由地域上所分別顯示之既耕地面積及墾殖指數報告表

由地域上所觀察的不同耕地面積及墾殖指數表

地域別	總面積(方哩)	耕地面積(方哩)	墾殖指數
華北平原	一二五、〇七八	八二、八一二	六六
黃沙山地	二〇九、五一九	三五、三七三	一七
山東山地	九〇、七六一	一八、一七八	二〇
華中山地	一二八、二三六	一九、三一九	一五
長江流域平原	七五、七五三	五三、一八九	七一
四川平原	七五、四一八	二九、四四八	三九
長江南部山地	一五五、四二八	二九、一六八	一九
東南沿海區	七〇、九〇九	一一、〇二六	一五
兩廣山地	一四四、〇八六	一一、〇二九	八
西南高原	一五六、八〇〇	五、八八一	四
合計	一、二三一、九八八	二九六、四二三	平均 二四

【備攷】Carlo Dragoni, General Report on Some Line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for China 1933 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報告彙編第一集特賴貢尼報告』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引用數字抄錄。
由此看來，耕地在中國土地上所佔的比率是特別低，和後面所顯示的耕地人口密度併起來一看，一般慣常所謂『地大物博』之中華的稱呼，似乎有點不相稱。

二 耕地人口密度

至於中國耕地人口密度一點，如左表所示，到是很高的。

二十一省耕地人口及農民密度表

省名	一方里耕地人口密度	一方里耕地農民密度	省名	一方里耕地人口密度	一方里耕地農民密度
河北	一、〇八一	九三六	廣西	一、六二一	一、一七一
山東	一、四〇五	一、二〇四	雲南	一、七五六	一、一七一
河南	一、二〇四	一、〇〇三	貴州	一、七五六	一、一七一
山西	八四四	七〇二	察哈爾	五二七	四一三
陝西	一、二七七	九三六	綏遠	四四三	三〇一
甘肅	一、〇二八	七六六	甯夏	八六〇	六一一
江蘇	一、六二一	一、二四〇	新疆	八四四	五六九
安徽	一、六二一	一、一三九	廿一省平均	一、六〇四	一、一三五
江西	二、八一〇	一、八三三	日本	二、九八九	五九九
湖北	二、二一八	一、四五三	英國	二、八九五	一四
湖南	二、八一〇	二、〇〇七	包括英格蘭及威爾斯		
四川	一、七五六	一、一七一	法國	五〇八	七三
浙江	二、六三五	一、七五六	德國	八八八	一二四
福建	二、二一八	一、六二一	比利時	一、九三八	一四八
廣東	三、〇一一	一、八三三			

【備攷】日本及其他的歐美數字，係據矢野恆太、白崎亨一共編的『昭和十三年版』

，日本國勢圖會』（昭和十三年二月）三十一省字，係據陳正謨『我國人口之研究』（統計月報第十四期，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號合刊）

陳正謨氏的計算數字，從部分的看來，是頗有疑問的；許仕廉氏把二十二省一方哩耕地人口密度，推定為一、一六五人；吳文暉氏則將本部十八省，推定為一、二七三人。再者，巴克教授由其二十二省一五四縣一六八地方一六、七八六農場調查資料算出一耕作面積（Crop area）一方哩農家人口密度，八大農區全體平均為一、四八五人，其中報告小麥地帶（旱地地帶）一、二八八人，水稻地帶（水田地帶）一、七四六人（J.L. Buck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37 及 Statistics 423—4 pp.）這些因了調查而選定的地方關係，作為中國全體來看似乎過高了點。

農民戶數在二十三省對全體戶數的百分比表

省名	張心一氏推定	土地委員會推定	省名	張心一氏推定	土地委員會推定
河北	七·七%	—%	浙江	六·八%	七·一、六%
山東	八·八	八·六、九	福建	七·一	—
河南	八·四	八·一、八	廣東	六·二	—
山西	八·三	八·〇、二	廣西	—	(八七、二)
陝西	七·三	八·二、四	雲南	七·一	七·七、六
甘肅	七·四	八·二、二	貴州	六·七	八·二、四
江蘇	七·一	七·八、二	察哈爾	七·八	六·三、六
安徽	七·一	八·一、三	綏遠	六·八	—
江西	六·七	七·七、七	甯夏	七·一	—
湖北	六·七	七·八、八	新疆	六·七	—
湖南	七·〇	七·三、一	青海	—	七·三、五
四川	六·八	六·八、九	平均	七·三	七·九、一

【備考】上表加(X)符號數字據廣西省政府統計局『廣西農林』（民國廿五年七月）又，在中國，因近代的工業發達的遲緩，農民戶數占全戶數百分之七十三（張心一氏推算）至百分之七九（土地委員會推算），而與日本英國比利時的稠密人口，有本質上的不同，因不僅是人，就連家畜與家禽，也是養育於耕地之上的。那麼，下記的數字，有再檢討的餘地，會由余氏說過：『例如山東，一方哩就養育了三、〇七二人，二五六匹驢子，二五六頭牛，和五二一只豚』（F.H. King,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1911）就與這點相近了。

【附記】泰瓦納如次的說：『除掉西北，中國不足以說有牧畜之存在』『牧畜在中國不能盛行，問題不在氣候與土質，而在人口對天然資源上幾百年來，人口對資源關係，如果土地適合於耕作人類的食物，則不允許進行牧畜業』，『歐洲貧民養牛沒有土地，中國貧民有土地而不能養牛』（R. H. Tawney,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 1933）

地帶不同所見人口密度表

地域	人口	一方哩人口密度
1 華北平原（白河、黃河、淮河平原）	八千萬人	六五〇人
2 揚子江中流、下流地帶	七千萬	八五〇
3 山東、江蘇、安徽、江西、湖南 有廣幅而平坦的河流與丘陵地帶	九千萬	三五〇
4 東南沿海地帶（浙江、福建、廣東）	七千萬	三五〇
5 四川盆地	四千四百萬	八〇〇—一、〇〇〇
合計（七十餘萬方里）	三億五千四百萬	平均 五〇〇

【備考】W. H. Wa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33

以上是一般的攷察，中國不論是歷史的、地理的，不論是經濟的、社會的，在各地表現着各式各樣形象，要概觀它是困難的。中國農業人口，藉翁

文顯氏的話來說，是蒐集在上表五個地帶上的，在不足全面積(連滿洲在內)一七%(一)到(五)土地(七十餘萬方哩)上擁有總人口八三%以上，(三億五千萬人)，即一方哩約有五百人。

現在，將農民所有的耕地面積看起來，這又是難找出正確的數字的，藉土地委員會及張心一氏的報告，作成如左的耕地面積表。

農民所有的耕地面積表

省 名	相當農家一戶		相當農民一人	
	耕地畝數	產物畝數	耕地畝數	產物畝數
河 北	七八	二二、七五 二七、八八	四、二一	五、一六
山 東	八四	一九、三一 二七、七五	三、七〇	五、三二
河 南	一〇五	二二、一六 三五、九九	四、二二	六、五六
山 西	六六	三四、五二 三四、九六	七、四五	七、五四
陝 西	五六	二八、五一 三一、六三	五、〇二	五、五七
甘 肅	三五	二八、八四	五、四八	—
江 蘇	三八	一四、三三 二二、九五	三、八〇	六、三五
安 徽	三三	一五、九八 二二、二三	二、五六	三、七二
江 西	二三	一九、八五 二二、七八	三、五二	四、〇四
湖 北	四七	—	—	—
湖 南	五五	—	—	—
四 川	一三	—	—	—
浙 江	五一	—	—	—
福 建	四一	—	—	—
廣 東	五	—	—	—
廣 西	八	—	—	—
雲 南	二七	—	—	—
貴 州	三五	—	—	—
平 均	計七九一	—	—	—
察 哈 爾	—	—	—	—
綏 遠	—	—	—	—
甯 夏	—	—	—	—
新 疆	—	—	—	—
總 平 均	—	—	—	—

【備攷】土地委員會『全國土地調查報告綱要』民國廿六年一月及張心一『中國農

業概況估計』民國廿一年十二月(括弧內之數字)

又，依據實地調查的結果，相當農民一戶的耕地面積，在河北是二三·〇五畝，河南是一六·二一畝陝西是二八·一六畝，江蘇是七、〇五畝，浙江是九·〇六畝，這六省平均起來，不過是十三畝半，比起上列的數字是更較狹小，(吳文暉『現代中國土地問題之探究』『新社會科學雜誌』第一卷第四期，民國廿四年三月)

維持中國農家最低生活的必要耕地面積，被推定全國平均十六畝半(古樸氏推定) 十七畝半(陳重民推定) 或二十一畝(倍開氏推定)，更從舊材料，即台朗氏(J.B. Taylor) 民國十一年(1922 A. D.) 的調查來說，則南方十畝以下，北方二十五畝以下的土地所有的農家的家族收入，都在一百五十元以下的貧乏線下，從上述的數字看來，可以想見一般。如果在社會經濟較好的時候，相當於一畝的農產物價格(水田一二·二九元旱田九·一九元)(陳正謨『中國各省的地租』民國廿五年) 算起來，年收入僅一百七十五元到二百四十三元，(不消說，有副業收入在內) 以二百元收入看來，則與左記農家生活費調查表對比，一家五口以上的生存實在是在非常困苦的狀態中。

七省廿四地方農家生活費表

調查地名	調查者	調查年次	戶數	相當一戶成年男子	相當一戶生活食物費	在生活費中所佔食物費	
			戶	人	元	%	
北京郊外黑山扈等村	李景漢	民六年	6	49.9	335.3	147.7	65.8
北京郊外掛甲屯村	又	民五年	100	27.7	163.9	105.0	64.3
河北定縣	又	民七年	4	4.5	24.4	17.7	72.5
河北平鄉	巴克	民三年	1	3.0	8.6	5.8	67.4
河北鹽山	又	民二年	1	10	113.3	63.0	55.6
河北鹽山	又	民二年	1	26	153.0	86.3	56.4

河南新鄭	又	民三年	1	4	5.0	28.6	571.0
河南開封	又	民三年	1	1	5.0	49.7	261.6
山西五台	又	民二年	1	5	3.0	25.3	83.0
安徽懷縣	又	民三年	1	4	0.0	18.1	171.7
安徽宿縣	又	民三年	1	6	5.0	25.9	151.4
華北小計			1	57	4.9	12.9	133.5
安徽來安	巴克	民三年	1	0	3.0	18.8	48.0
安徽和縣	湯惠孫	民三年	1	0	4.0	23.3	59.6
江蘇江甯淳化鎮	杜修昌	民三年	1	0	10	38.6	191.6
江蘇江甯太平門	巴克	民三年	1	7	8.0	31.5	133.5
江蘇江甯土山鎮	又	民三年	1	7	8.0	31.5	133.5
江蘇江甯上下五旗	言心哲	民三年	1	6	4.0	28.1	116.6
江蘇江甯餘糧莊	湯、杜	民三年	1	5	4.0	26.1	191.7
江蘇武進	又	民三年	1	5	4.0	26.1	191.7
浙江嘉興	馮紫蘭	民三年	1	3	3.0	17.8	131.6
浙江嘉興	張宗弼	民三年	1	3	3.0	17.8	131.6
浙江蕭山湘湖	湯、杜	民三年	1	6	5.0	33.0	111.3
福建連江	巴克	民二年	1	6	3.0	26.6	171.7
華中小計			7	53	3.6	20.5	161.1
合計			9	77	5.9	29.2	261.3

由此看來，在中國目前社會經濟體制之下，因資本、技術的落後和墾殖指數的低下，使得耕地人口密度很高，人口的大半，不得不從事於農業，在寡少的土地上，多數的人口和家畜，度着飢餓的生活。這種土地飢餓——土地缺乏的情形，由上述的概說，可以窺見其蘊了。

三 荒地的開墾

在此，暫時不能不談到那在中國可開墾的未耕地問題。依據唐啓宇氏的推定，如左表所示，全國面積約殘留下百分之五、七一。

二十三省未開墾的可耕地面積表

省名

可耕地面積

可耕地指數

河	北	三、二七〇、七〇七畝	一、四二%
山	東	三二、九九九、九五五	一三、一九
河	南	八、五九四、一一一	三、一一
山	西	五、六六三、四一六	二、一五
陝	西	二一、一一四、一八二	六、六五
甘	肅	一七、四一九、〇二四	二、八一
江	蘇	二〇、一一六、〇〇七	一一、七〇
安	徽	三、五七二、一六七	一、五三
江	西	七、九九五、五九〇	二、九二
湖	北	九、七四八、四〇九	三、二六
湖	南	一六、五一六、九六七	四、七一
四	川	三五、七三八、四三〇	五、四四
浙	江	一二、三六九、四四〇	七、五二
福	建	一三、七七一、八一七	六、九九
廣	東	二七、一四二、五三七	七、四五
廣	西	二六、九四七、六八三	七、五三
雲	南	七三、一一二、四八九	一一、二七
貴	州	二九、八一五、四六〇	一〇、三八
本部十八省計	平均	三六五、九〇八、三九一	六、一四
察	哈爾	四九、五八〇、九六〇	一一、七七
綏	遠	四六、四二〇、三二九	九、三八
甯	夏	二三、〇八七、四八六	四、六九

青 海 六四、一九一、四八八 五、一八
 新 疆 二二、九七七、四八一 〇、八六
 邊區五省合計 二〇六、二五七、七四四 平均 三、八八
 全國廿三省合計 五七二、一六六、一三五 平均 五、七一

【備放】唐啓宇「我國土地之墾殖指數與可耕地指數」『實業部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民國廿五年七月十三日

又，中央農業實驗所的報告，與它大體相似；各省的比例，則如左表所示，有大小不同。

二十二省荒地狀況表

省名 報告件數

河	北	四一〇	一二、〇%	二六、二%	三、一四%
山	東	一八二	一六、九%	三六、九%	六、二四%
河	南	一三八	一一、五%	二六、三%	三、〇二%
山	西	一三八	一三、八%	二七、七%	三、八二%
陝	西	六八	一九、七%	二三、〇%	四、五三%
甘	肅	二七	一七、八%	一五、八%	二、八一%
江	蘇	一六七	一一、二%	二〇、〇%	二、四四%
安	徽	五九	一一、〇%	三四、八%	四、一八%
江	西	二九	一七、九%	二八、五%	五、一〇%
湖	北	二二	一七、八%	三九、二%	六、九八%
湖	南	四一	二二、五%	五〇、九%	一一、四五%
四	川	六五	一六、七%	二二、九%	三、八二%
浙	江	三八	九、八%	一九、五%	一、九一%
福	建	二五	二〇、八%	四六、七%	九、七一%
廣	東	三八	一六、二%	四八、五%	七、八六%

廣西	五〇	一七、二	一七、九	三、〇八
雲南	二八	二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貴州	二二	二一、〇	三三、〇	六、九三
舊察哈爾	八	七五、〇	五七、〇	四二、七五
綏遠	一〇	三四、五	五七、一	一九、七〇
甯夏	三	五三、三	二一、七	一一、五七
青海	一三	一八、〇	四三、〇	七、七四
綜合平均計	一、五八二	一九、一	三三、三	六、三六

【備攷】土地總面積，係指在各報告區域的荒熟田地的總面積。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情報告』第二卷第十二期，民國廿三年十二月。

【附記】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農情報告』(Crop Reports, 係由在廿二省壹仟二百多縣農情報告員六千多人(無薪給)的農業狀況——全國主要產物及其他農產物生產量與各省農產物預想，各省農村經濟盛衰的事實及其原因和趨勢等——報告集合而成的，每月發行小冊子一本這個報告員的成分由其中二六〇四人報告看來鄉村小學教員最多，佔總數二五%，其次是農民，佔二二%，更其次是學界——即從事教育事業的，如縣督學、區教育委員會等與以農業學校、職業學校為中心的學生佔一七%，其他尚有鄉村及縣城工作人員，教會工作人員等等(中央農業實驗所『農情報告』民國廿三年六月)

即在比率上，六%前後雖然是很低，可是從其絕對數上看來，實超過五億七千萬畝。可是這些土地的放棄，大多由於在現時社會經濟體制下的資本，技術稱成的落後。下面所示過去六十年來耕地面積及農村人口增減表，也可窺見一斑。這個調查，中央農業實驗所與金陵大學教授喬啓明協同進行的，雖然它到底可信到什么程度，固為一疑問，總之，可以顯見耕地的開墾，是如何的遲緩，和與這相聯的農村人口的增加趨勢，是如何的緩慢。

六十年來中國耕地面積及農村人口增減趨勢表

省名	種別	報告件數	同治十年	光緒十年	民國二年	民國廿九年	光緒十年	民國二年
河北	耕地	四一〇	一〇〇	九八	一〇〇	九八	九八	一〇三
山東	耕地	三九〇	一〇〇	一一二	一一二	一四〇	一一二	一〇八
河南	耕地	一八〇	一〇〇	一〇三	一〇五	九九	一〇三	九四
山西	耕地	一〇六	一〇〇	一一九	一二二	二二八	一九一	一〇三
陝西	耕地	一三八	一〇〇	一〇四	一一〇	一〇五	一〇四	一〇六
甘肅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江蘇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安徽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江西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湖北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湖南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四川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浙江	耕地	一四六	一〇〇	一〇三	一一〇	一〇一	一〇三	一〇六

人口	七一	一〇〇	一〇二	一〇七	一二三	一〇二	一〇四	一一五
福建 耕地	二五	一〇〇	九六	九二	八一	九六	九六	八七
人口	二九	一〇〇	九二	九三	八八	九二	一〇一	九四
廣東 耕地	三八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二	一〇一	一〇〇	一〇一
人口	六二	一〇〇	一二三	一四二	一五七	一二三	一一五	一一〇
廣西 耕地	五〇	一〇〇	一〇五	一〇七	一二三	一〇五	一一一	一〇五
人口	六六	一〇〇	一〇九	一四九	一六四	一〇九	一三六	一〇九
雲南 耕地	二八	一〇〇	一一一	一三三	一三一	一一一	一一〇	九九
人口	三五	一〇〇	一三五	一七九	二二七	一三五	一三二	一三三
貴州 耕地	二二	一〇〇	一一五	一二一	一三〇	一一五	一〇五	一〇八
人口	三三	一〇〇	一〇六	一一八	一二八	一〇六	一一一	一〇八
察哈爾 耕地	八	一〇〇	一〇四	一一二	一二〇	一〇四	一〇八	九三
人口	八	一〇〇	一〇四	一四四	一六〇	一四一	一二六	一一一
綏遠 耕地	一〇	一〇〇	九五	九三	八八	九五	九七	九五
人口	一四	一〇〇	一三九	一七二	一七五	一三九	一二四	一〇二
甯夏 耕地	三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二	九九	一〇〇	一〇二	九七
人口	五	一〇〇	一四三	一〇一	八八	一四三	七〇	八七
青海 耕地	一三	一〇〇	一六九	一七五	二〇三	一六九	一〇四	一一六
人口	一〇	一〇〇	一六七	一六一	一七二	一六七	九六	一〇六
平均 耕地計一、五三二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一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〇
人口計一、六三二	一〇〇	一〇〇	一〇八	一一七	一三一	一〇八	一〇八	一一二

【備攷】平均數字由二十二省各時期耕地面積及農村人口數算出。『農情報告』第二年第五期及第十二期，民國廿三年五月及十二月。

由此看來，全國耕地在過去六十年來只增加了一%而農村人口却增加了三一%（每年千分之四·四強的比率），從同治十二年到光緒十九年，廿年之間耕地增加了一%，這以後的耕地面積，大體保持現狀而無增減，農村人

口在這六十年內，可以分作三個時期來看，前二期增加了八%，最後廿年來則增加了一二%。然以省別來觀察，則最近廿年來湖北、青海、江蘇、貴州、浙江、四川、廣西各省，和人口增加相關聯，一部分未墾荒地正在開闢着，耕地的面積在擴大之中。但福建、察哈爾、山東、綏遠、陝西、寧夏、江西、河北、湖南諸省，却看到耕地減少。關於耕地荒廢化的原因，當在本章以下各處詳述，這種荒廢耕地使其恢復，可耕荒地實際上大部分作為耕作條件惡劣地方，而遺留下來。

幾年來高呼『西北開發』『西北移墾』，正如翁文灝氏所說，這些地方雨量很少，（每一年在廿吋以下），且多高原、山岳、及沙漠，受自然的惡劣條件的限制。節約的農業最適宜地，在西北部只有不廣大的若干沖積平原——即渭河平原、綏遠平原、河套平原、寧夏平原、西部甘肅平原，新疆崑崙及沿天山山麓峽隘地域，在這裏人工灌溉是絕對必要的，加之，這些地方是廣泛的散開着，彼此之間交通很不便利，它的開發更為困難。

【附記】在以上西北地方的農耕地總面積，約為四萬七千方哩（一億八千八百萬畝）（假定一方哩（四千畝）平均人口密度為三百，則為一千四百萬，如果假定為四百人，則能支持一千九百萬，這個數字恐怕到了頂點了。在渭河平原，除了現在的人口之外，只不過能增加五十萬人，綏遠、河套、甯夏平原，也只有同樣的比例；甘肅的涼、肅、甘及其他的耕地，還能容納二百萬人口。新疆人口，最大能增加到三百萬。因此，在西北農耕地帶全人口增加可能數僅只八百萬，最大的推定也不過一千萬人，將來是不能有更大的期待的」（翁文灝『中國人口分布及土地利用』『獨立評論』第四號，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 W. H. Wo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33）

近年來在各省政府支持之下，進行耕地開拓等擴張。現以山東省為例，在沿黃河口道十五縣，約有一萬七千多頃（百七十多萬畝）砂礫地當作不毛之荒地被遺棄着，在土地飢饉時，省政府（建設所）利用黃河泥土作為第一

期計劃，使這些砂鹹地逐漸成可耕地化——即在黃河上設置「虹吸管」，進行引黃河的水混合泥沙與鹹土，由反應作用使礫粉變為肥沃之方法。我在昭和九年十月，由省城濟南到清河鎮黃河堤防上，會親睹利用河身與耕地高位之較差，依水平開掘而設置虹吸管。『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四日）濟南通訊，在章邱王家梨行（我所親睹的），齊河的紅廟，齊東的馬鬃子，蒲台的三旺莊及濱縣蠅子齊五地裝置虹吸管，如馬鬃子所完成的二十吋虹吸管，在當時已使八百多畝窪地，平均約一米突厚的淤泥沈澱了，據說虹吸管一日的効率，平均能得百畝的淤田，又根據建設廳長張鴻烈氏「五年來山東之建設」一文所說，在山東所完成的，有如下表。

山東省虹吸管設備狀況表

縣名	地點	虹吸管直徑	工程費	淤田面積	平均一日淤田面積
歷城、章邱	王家梨行	二吋	一〇、〇千元	六八、〇〇〇畝	三一〇畝
齊河	紅廟	一八	六、〇	四八、〇〇〇	二一六
蒲台	三旺莊	一五	四、六	二七、〇〇〇	一一〇
青城、齊東	馬鬃子	二一	九、二	六八、〇〇〇	三一〇
合計			二九、八	二一一、〇〇〇	九五六

【備攷】張鴻烈「五年來山東之建設」『中國經濟』第三卷八期（民國廿四年八月）

中日事變之前，由河北、山東、河南三省建設廳水利技術員組成的『黃河虹吸工程勘查團』，從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中旬到七月下旬，由河南開封至山東河口逐一查勘，約可在河北省沿岸六處，山東省四十五處，河南省九處設置虹吸管，將來依此計劃，企圖灌田二十二萬四千多頃（二千二百四十萬畝），使農產收入增收一億二千二百萬元（『南京中央日報』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此外，國民政府最大建設事業之一的導淮工程，自民國廿年四月以來到

事變當時會積極進行着。由導淮委員會總技師須慢氏所稱之計算，如果這個工作完成，可將淮河流域的私有土地「荒廢棄置的面積七百五十萬畝」及「淮河流域的湖、河、灘、蕩未墾公地二百九十多萬畝」及「高寶湖畔之沼澤荒地約百萬畝」，皆可改良為耕地之極大的耕地擴充。（須慢氏「導淮問題」『中國水利問題』民國廿六年二月）雖說中國人口過剩問題不能僅由如是耕地增加而解決，但却是農業生產上之社會關係，不更廣泛的社會經濟體制本身上解決之關鍵。

【本章完】

第一卷第六期目錄

時事評論	華萊士「和平」演詞之分析	海明
論評	從軍事政治和經濟觀察內戰及其出路	海明
論評	論收回香港九龍問題	康君
論官僚資本		陳人白
官僚制度下的教育		陳覺玄
美國操縱世界的命運		劉少嚴
第二次大戰與美國獨占資本之生長	△美國一半人口生活在水準以下▽ △出版自由下之出版獨占▽	帕萊斯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史的研究		李雲編譯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
秦漢大一統與先秦諸子的結局		子規譯
答張大軍先生論維新運動		唐文甫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續完）		歐世伯
△思想與實際▽		
評稽文甫先生的道家與小農		李季
李季的邏輯與態度		蔡尚思
論古典主義戲劇（下）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		李毓鏞

爲古史辨派的第二次反攻再進一解

李季

一 避重就輕一蟹不如一蟹

讀過東南日報文史第十二期劉平先生對我在求真五期批評他的文字的反攻後，覺得他的大文是理由少，火氣大，避重就輕，答非所問；和他的第一文較，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因爲第一文插入與本文無關的文字六分之一，已嫌枝節，此文一文對於我所提及的鐵器時代問題的反駁，竟佔全文三分之二，而於古史辨派本身的剖白僅佔三分之一。他對於我的任何主張本可自由批評，不過他此等文字的主要目的既在代表古史辨派證明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一公式是真理，絲毫不含毒汁，便應當盡情反駁我對此公式的批評文字。不意他的第一文不獨沒有這樣做，並且老老實實承認『在史學方法上完全利用默證來作考據，當然是件最危險的事。』於是一轉，說『……顧先生的學說，事實上並不完全建立在「默證」上。這「並不完全」四個字已充分透露此公式至少有一部分建立在「最危險的」「默證」上。一個公式既已有一部分不正確，還能成爲公式，還能自欺欺人地說「本沒有什麼毒汁」嗎？劉先生既要做顧先生的代言人，正當將「並不完全建立在「默證」上」的有利的證據列舉出來，何以僅說一句空話了事呢？可見「並不」兩字也是不負責任的謊言。尤其是他的第二文未會替楊寬先生盡辯護的職責。楊先生的十六萬字中國上古史導論神話爲古史傳說的唯一來源，因此東挪西扯，拚命去『回復他本來的神話面目。』我對準這一點進以，從學理（如米勒的），古人所舉的史實（如展禽的），和文字本身（如后帝皇）各方面證明神話的來

源原爲人話，而古史傳說是包括人話和神話，後者並非唯一無二的來源，算是駁得他體無完膚。劉先生對於此等重要地方，不是避去不談，就是瞎扯，或用一句話輕輕帶過，而於枝葉，甚至於與此無關的問題，却談得起勁。即使他全般勝利，也不能證明古史辨的公式沒有毒汁，更不能證明神話是人話的來源，或古史傳說的唯一來源。何況他對於其他各點的說法也全都是同樣不正確的。

劉先生的大文，內容既如此貧弱，而標題却非常兇猛，叫做『「爲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展開攻毒的殲滅戰』，於是在文字中施用強辭奪理，隨意亂罵的伎倆。這是『雷聲大，雨點小』的勾當，不值識者一察。或如我們湖南一句俗話一樣：『先打雷，後落雨，落下來莫得（沒有）一瓜瓢水。』好，我們就來看看這一瓜瓢水罷。

二 黃帝的年代和唐虞的鐵器問題

在古籍無可考，而鋤頭考古學又已無形停頓的現時，要談黃帝的年代，幾乎不可能。可是我們却不願依照古史辨派的辦法，非到數十年或數百年絕無把握的地下發見後，乾脆不談上古歷史（『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胡適），或『利用新的武器——神話學』，將古史中的帝王送到天上了事。我們總應在萬分困難之中，求得一種近似。漢書律曆志所載『於黃帝兩種年代固不可靠，即史記五帝本紀所載黃帝之後，顓頊，帝嚳，帝摯，帝堯一脈相傳，也不能置信。關於這一點，崔述已有駁議，以爲『……上古帝王，

其交會之間，皆當有數十百歲，此衰而後彼興，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繼爲天子者哉？」（補上古考信錄下卷）通志五帝紀注引命歷序：黃帝傳十世，少昊八世，顓頊五世，帝嚳十世，合計三十一世。命歷序所紀也許不是完全虛構。當時的酋長經過選舉，終身任職。姑依三十年爲一世計算，約有一千一百年之譜。這就是我姑計黃帝應在紀元前三千四五百年之頃的根據。按現在一般大事年表的計算，黃帝在虞前四百餘年，正合安特森沙井期銅器的時代。即依我的計算，也合於應當改正的沙井期銅器的時代。何況我已經預先鄭重聲明：我所以談黃帝等等，只因有許多傳說附在他們的身上，不能不借作時代的標誌，和社會進步的符號。即使人們推翻了黃帝等等，於那些時期另換作酋長甲乙丙丁，也是可以的。這是一種治史的科學態度，而劉先生偏斥爲『畢竟守不住最後的巢穴了』（他如果稍顧事實，不能用『畢竟』，應用『預先』），斥爲『玄學方法』。這如果是玄學方法，那他們將有熊氏的黃帝一轉二轉，轉到天上，使黃帝變成上帝，使有熊氏變成上帝的奴才，又是什麼方法呢？

其次，關於唐虞鐵器時代的問題，我是根據五大理由來作假設的。第一，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是根據近代野蠻人的生活，實地考察出來的，大都靠得住。他的野蠻高級有鐵器的發明一點，對於建都於銅少鐵多的山西的唐虞夏自可適用。劉先生提不出絲毫反證，單憑『公式主義在作祟』七個大字，是推牠不翻的。第二，關於我所舉的韓非子，禹貢的鐵器和貢鐵等等，劉先生說：

『這些紙上證據實在都算不得證據的。韓非子所說的共工之戰，本非共工傳說的初相，禹貢決非高時的著作，已成定論。越絕書著作年代既晚，其中的傳說大都荒唐無稽。怎能引以爲證呢？』

某書晚出，不能作證的說法，是古史辨派先天的一貫的態度——從顧先生駁章鴻鉞先生到劉先生駁我，總是這一套法寶。可是劉先生此次又告訴我們：

『《山海經》神話中那些怪國，當然不是原始的神話，（誰也知道山海經一書是多次結集而成）。』

山海經的結集一直沿至漢代，而禹貢，韓非子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越絕書也不過是漢初的書。何以那些書上的證據『實在都算不得證據』，只有『多次結集而成』，時代不比越絕書爲早，而荒唐無稽又遠過越絕書，並含有『那些怪國，當然不是原始的神話』的山海經，可以做古史辨派的寶典，自由應用來造成『神獸論』呢？這叫做『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一書所含的材料是否可靠，應另有精密的和科學的方法去加以估量，不能完全以出現的早晚爲斷。胡適之先生拚死命排斥的漢代出現的周禮，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不是得到全文『稽』字的印證嗎？用晚出做理由去否定韓非子，禹貢，甚至於越絕書的材料價值，是最愚蠢的玄學方法（因爲書雖晚出，至少有一部分材料是從前遺傳下來的）。想不到這始終成爲古史辨派攻擊他人而又便利自己的主要武器！我現在明白告訴劉先生：要否定韓非子，禹貢和越絕書關於銅鐵的記載，須有確切的證據，晚出這句話未免過於籠統了。

第三，出鐵的地方先用鐵器，這是自然的道理。據現在所知，戰國時，首用鐵兵的是中山國，其次爲楚國。因爲這兩個都出鐵（中山靠近山西）。我以同一理由斷定唐虞夏應急速進入鐵器時代。劉先生却說：『我國銅少鐵多，容易採取是一件事，唐虞夏有沒有鐵器是另一件事。……殷墟經過中央研究院多少年來十多次大規模的發掘，地下還沒有找到用鐵器的證據哩！』殊不知銅少鐵多，容易採取，和唐虞以及『銅器之用已廣』（引郝步騫語）的夏代進入鐵器時代，實有連帶關係。不獨因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原來緊接在一起，並且因需要上的壓迫，不能不急速趨入這一途。至於殷墟雖未發見鐵器，然出土銅器中關於明器的部分含有一定分量的鐵和砒素，而牠的銅容器較哈爾斯大德和高加索鐵器時代初期的銅容器，內容更爲進步（參看古史

辨的解毒劑第三項)。這不是殷已爲鐵器時代的明證嗎?所謂科學的假設是於沒有得到實證前的一種合理的推測。倘若唐虞夏已有鐵器發見,自然用不着假設,更無執爭可言。劉先生對於我的假設,既舉不出確切的反證,加以推翻,自應以將來的發掘爲裁判者。然這種假設是從四方八面,古往今來的史實和科學中找到證據,並不像古史辨派的先生們只從詩經論語等書找證據,造成一個革掉古史的命的荒謬公式,只在山海經,楚辭天問和淮南子(因係自用,故淮南子即晚出也不要緊)寥寥幾部書中打滾子,不管怎樣違反現代科學的常識,一口咬定神話是人話的初相,孜孜不息地大做其反動工作,而自詡爲顛撲不破的真理!

第四,我引證五六千年前中華與東歐的交通,與巴比倫的交通,以及製鐵術的傳入,都是幫助唐虞夏進入鐵器時代有力的材料。劉先生無力反駁,便略去不提。專指責我不應從黎苗的字形上斷定牠們爲農耕氏族,不應從蚩尤銅頭鐵額的神話來證明黎已發明製鐵術。殊不知這是和本項所舉中西交通,蒙古倭頓諸氏族鐵的製造的傳入,以及亞洲自然民族在半開化階段已有鐵器等證據配合的,並非孤證。何能斥爲玄學方法?

第五,我指出製鐵當從農具始,而鐵器時代的開始即在此時。這和石雅以『始製鐵兵』爲『始用鐵器時代』,恰恰相反。不意劉先生竟說:

『李先生的第五理由是根據『石雅』的,我們已在前面指出是胡說了。』

劉先生要批評我的文字,這樣不忠實地加以描寫,即對得起我,也對不起讀者。

綜合上列各節,可以知道劉先生對於我的唐虞夏進入鐵器時代的五大理由,並沒有針鋒相對地而又詳盡地加以反駁,只用『公式主義』,『算不得證據』,『幻想』,『玄學方法』和『胡說』幾句空話來搗亂,而且大都不附理由,即附理由,也不成其爲理由。尤其是我的五大理由是有連鎖性的,他不獨加以割裂,並且任意取捨。像這樣不負責任的批評,只有古史辨派才

做得到。

三 關於圖騰皇帝和王亥的問題

劉先生關於許多小問題還有所辯駁,只好總在一起,予以答覆。

一、關於有熊氏一點,劉先生說:

『黃帝既站不住,就把傳說中「黃帝爲有熊氏」的有熊氏講出來,說是氏族的圖騰,證據在那裏呢?黃帝爲有熊氏的說法,初見於史記五帝本紀中,大戴衣的「五帝德」就不見。黃帝是不是有熊氏,也還是問題!這一點,崔述考信錄已說過。』

其實五帝德並非五帝的本紀,牠沒有講的事,後出的書講了,必定另有來源,就可目爲偽造的嗎?所謂另有來源,至少有三種:一、出自傳說;二、出自現已亡透的其它記錄;三、出自地下的發掘。關於最後一點,應稍加說明。許慎告訴我們說:

『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說文解字敘)

『往往』兩字表見不止一次二次。如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鼎汾水上,因改元元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史記孝武本紀)這種鐘鼎文自是史料來源之一。所以大戴禮沒有提及有熊氏,史記忽然提及,古史辨派不用絲毫證據,予以推翻,是絕對沒有理由的。至於有熊氏原爲圖騰的證據,就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暗示我們的。他的書最初十章明明是在考察近代澳大利亞人,坡里內西亞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狀況,接着才研究古代的希臘,羅馬,然書名却叫做古代社會。這就是表明近代野蠻人或未開化人的發展過程,正是國家成立以前的古代人——一切文明民族的祖先——的發展過程。所以他說:『……要知道在野蠻狀態中的雅利安民族之遠祖處於怎樣的境遇,便可以在今日的澳大利亞人及坡里內西亞人的狀態中看到他們的遠祖的典型。』(古代社會中譯本上冊二五頁)近代易洛魁種族中六個部族都有『

熊的氏族（同書同冊一〇六頁），這不是我們的『遠祖的典型』嗎？劉先生問我要證據，我指得出科學的證據來。但我向他討有熊氏非黃帝的證據，他只能回答我說：『大戴禮的「五帝德」就不見。』可是你要注意：這又是你自己承認的『最危險的』『默證』呀！

二、關於楊先生所說的『「爰」或亦為一鳥首人身之混合圖騰乎？』一語，因下面括符中有『吳其昌卜辭中所見殷先公先王三續考（燕京學報第十四期）據卜辭此形，斷為鳥首人身之狀』等語，一時大意，誤認為吳先生的假設。劉先生指為『搗鬼』。然楊先生雖作這種假設，仍被他自己的話打消了（『然吾人以史料之不足徵，猶未敢斷然判定也。』）他始終否定圖騰，不是事實嗎？誰有閒工夫搗他的鬼？

三、劉先生說：

『本來古史傳說中的鳥獸神話有出於圖騰遺跡的可能，像益、句芒、驩兜等半人半獸的神話，更有出於混合圖騰的可能。可是李先生認定唐虞已進入鐵器時代，是不是還有圖騰制的存在呢？』

他在這裏說『鳥獸神話有出於圖騰遺跡的可能』，便是承認在神話之前有人話。既是這樣，楊先生的古史傳說完全出於神話的主張，即不攻自破。因為在神話之前既有人話，這種人話便和我在前文中所說的一樣：『有一部分直接流傳下來，有一部分却轉變為神話了。』例如有熊氏，一望而知是最初的人話直接流傳下來的，而『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史記封禪書）自是神話。古史辨派一定要教條式地認最初的人話非轉變為神話，則不能再變為人話（古史傳說），遇着這種地方，無法解釋，只好推在材料晚出，靠不住這一類話上面。

至於劉先生問唐虞時代是否有圖騰制的存在，我可以告訴他：不獨唐虞時沒有，即黃帝時也沒有了。

『圖騰之稱，不始於澳洲，而始於北美之紅種。願他洲蠻制，乃與不謀而合

，此其所以足異也。聚數十數百之衆，謂之曰一圖騰。建蟲鳥獸百物之形，搗之為徽幟。凡同圖騰，法不得為牝牡之合。所生子女，皆從母以奠厥居，以莫知誰父故也。』（嚴復譯社會通譯蠻夷社會）

近代美洲的土人有圖騰，澳洲的土人也有圖騰，我們的遠祖還能例外嗎？不過這是女性本位時代的產物，到了男性本位時代，還只留下一種遺跡。通常說有熊氏是圖騰，朱虎熊麗是圖騰，要指牠們的起源講，才是對的。我在古史辨的解毒劑第三項不是明明指責楊先生『把圖騰的遺跡如朱虎熊麗，看做真正的獸』嗎？圖騰不婚之後，繼之以同姓不婚。觀於朱虎熊麗盡是姓，也應該知道圖騰早已轉變為姓了。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姓公孫』，崔述加以反駁；同紀索隱引皇甫謐說，黃帝『長於姬水，因以為姓。』我以為有熊或熊就是黃帝原來的姓。

四、關於呂刑的『皇帝』

，經典釋文作『君帝』，劉先生引墨子尙賢中和孟子盡心下『盡信書不如無書』趙岐注所引呂刑作『皇帝』，證明『呂刑』在戰國到漢的本子都作『皇帝』。兩種甚至於兩種以上的本子作皇帝，也不能證明『呂刑在戰國到漢的本子都作皇帝』，因為特稱肯定是不容易變成全稱肯定的。即退一步，承認確是如此。然周初到春秋的本子誰能證明一定也同樣作『皇帝』呢？何況尙賢中所引呂刑的皇帝，並不是指天。劉先生以為上面有『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一語，下面有『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就是『「墨子」把呂刑上的「皇帝」認是天帝。』倘若真是這樣，墨子一定也和古史辨派一樣，認禹為『上帝之屬神』，何以同篇中明明說：『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呢？查此篇提及『使能』，除上面一次外，尙有十次，都是指人王講的。所謂『天之所使能者』，也是經過人王的，觀於『故古聖王以審以尙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一語，就可以知道。所以墨子閒詰引孔安國傳云『帝堯詳問民患』，並云『孔疏引鄭康說，亦以此皇帝為堯。』至於趙岐所謂『天不能問於民』，雖指

皇帝爲天，然這大概是因他爲着要找一句恰和『冒聞於上帝』（『人不能聞於天』）相反的話，勉強湊成的，故疏仍以『孔安國云堯帝詳問民忠也』爲言。總說一句：無論呂刑爲『君帝』或『皇帝』，都是指堯而非指天，有呂刑本文和尙賢中可證。如果像古史辨派的主張一樣：皇帝是上帝，羣后和三是上帝的屬神，那不獨與呂刑取鑑前代刑制以作刑典的主旨全相背馳，並且和尙賢中的視皇帝羣后三后爲人類，也顯然抵觸（按尙賢中提及三后，稱爲『三聖人』）。由此看來，我對於呂刑的君帝或皇帝的解釋，始終不算是錯誤的。

五、關於王亥，我曾說不是楊先生所說的什麼『金神』，『刑神』，而是殷人的祖先，故卜辭稱之爲『高祖亥』，『高祖王亥』，而以亥日祭。『求真五期四二頁』但劉先生偏說：

『就卜辭來研究，王亥並不以亥日祭，有以『乙未』，『己巳』，『甲辰』，『壬午』，『庚申』，『庚午』，『癸卯』祭的。殷人的祖先，『上甲』以下，都以忌日爲廟號，而王亥以上就不這樣，因爲殷人祖先傳說中王亥以上這些祖先，在當時已是神話中的人物，從卜辭的祭祀上有差別，已很顯見。……所以卜辭確實批准了王亥爲神的說法，使李先生的『困獸之鬥』不得不宣告破產！真是『變成當面說謊，有點難爲情罷！』』

王亥除亥日祭外，本還有以牠日祭的，我上次只舉要點，故未提及。但據劉先生的『研究』，『王亥並不以亥日祭，』難怪他說我『說謊』，『破產』！可是我現在要寫幾條出來，請他再『研究』，『研究』。

- 一、『貞之于王亥，冊牛，辛亥卜。』（殷虛書契前編四卷八頁三片）
- 二、『辛亥，亥于王亥，卅牛。』（殷虛書契後編一卷二三頁一六片）
- 三、『辛亥，酒王，亥九羊。』（聽冰閣拓本一卷九頁一片）

據王國維說：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然葉玉森所考，並不盡同。還有一層，殷人求年，雖多求諸岳神，

也有求之於某祖某妣的。王亥之祭，正有此例：如『庚口獻貞門王亥，求年。』（殷虛書契所藏殷虛文字一頁三片）和『貞於王亥求年』（殷虛書契後編一卷一頁一片）是。王亥既有以亥日祭的，試問怎能以祭日的差異去否定他爲殷人祖先的資格？即視他爲神，也是因他能服牛，有大功德於民，死後被奉爲神的。何況劉先生自己明明白白說出『殷人祖先傳說中王亥以上這些祖先』的話來，是不知不覺已承認王亥原爲殷人的祖先，而非什麼『金神』，『刑神』。他就是要強辯，也辦不到，因爲卜辭所宣佈的是『高祖亥』，『高祖王亥』（按祖原作且），而不是『金神亥』，『刑神王亥』！由此看來，在卜辭面前『宣告破產』並『說謊』的，不是李季而是劉平及其所代表的古史辨派！

四 關於后帝皇帝皇的問題

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呂刑上的『君帝』或『皇帝』既同是指堯，對於我的主張一無變動，但對於古史辨派却最爲不利。因爲劉先生一口咬定『后』，『帝』，『皇帝』，『皇』等神號的漸次產生，而『上帝』，『皇帝』，『羣后』，『三后』的名辭一齊擠在呂刑中，使他着了慌，無從解釋！他於驚魂甫定之後，想出一句最可憐的話來，就是：『本來在一篇中怎能比較得出？』他應當知道：這一篇的出現如果很晚，自然比較不出，但牠既出現在周初，至少在墨子之前，連墨子也已視皇帝，羣后和三后爲人而非神，試問怎能決定此等『神號』出現的次序？他對於史記周本紀所舉武王追封先生之後，指爲取材於呂覽和樂記等書，算是有點影子，但對於國語魯語上展禽所說的『后土』，『黃帝』，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所說的黃帝炎帝，以及陳侯因齊敦所說的『高祖黃帝』，絲毫不用證據，僅憑『當然是『皇帝』的神號和『帝』的廟號出現以後才有的』這句空話來作答，又是自欺欺人之談。

當然，劉先生還會掉一掉花槍，令人莫測高深。他說：

該諸待漢皇。」這漢皇是指漢武帝，所謂「漢皇重色思傾國」，也是用武帝思念李夫人的故事，凡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能知道。不意古史辨派數一數二的「古史專家」連這件事都茫無所知，反譏笑我的「常識太不多了。」勇矣哉，此子也！

答吳流先生「論神話傳說之演變」短簡

草完上文兩日後，又接到友人所寄文史第十三期，因得拜讀吳流先生「論神話傳說之演變」李季先生的大文。所列八條，除一部分例證尚有商討餘地外（如第一第六等條），大都同意。近年來譯述之餘，雖喜翻翻繹裝書，但並不專治史學。不過自觀二十年來一部分古史專家的工作，不獨缺乏進步，可說是反而退步了。古人對於古史的附會甚至於編造，自然不能說是有，但一定要作出一個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死公式，視為史學界百五十年來的一大發見，便完全不是客觀的真理。同樣，古史傳說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出自神話，稍具歷史常識的人自無法否認，不過一定要主張神話為古史傳說唯一無二的來源，便變成一個死教條，又完全非客觀的真理。『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我國事事落後，連固有的學術思想也陷入絕境而不知改弦易轍，實令人怵目驚心，不能不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以一吐為快。吳先生『並不否認古史傳說從神話來，而神話又從人事來，和一部分的神話是由人話轉變而成的假定。』可說彼此意見接近，但並不完全一致。我認為古史傳說並不完全從神話來，實含有最初的人話。如黃帝為有熊氏的傳說決不是從神話而來，也不是後人隨意編造，而是由最初的人話直接保留下來的。因為有熊氏經得起現代考古學的證驗，而神話中夾入一隻「熊」，實無意義可言，即後人憑空使一隻熊和黃帝發生關係，也是如此。此外，如古代所傳的由採取果實而漁獵，而牧畜，而農業的社會發展的紀錄，更是由最初的人話直接流傳下來的，決不是「周秦之際的學者們所擬議的一種考古學般的推察，」也不是「得之邊裔民族之觀察」的「歷史進化觀」。我向來反對死教條，但認此為顛撲不破的真理，故不避重複，再陳於先生之前。其他論證，散見於前後三文，恕不多瀆，尚希指教。

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李季

Established in 1917

密勒氏評論報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has earned a recognized reputation for its progressive and impartial views, unexpurgated news reports, and fair, unbiassed reviews. Stay up to date by regularly reading China's oldest and most popular English-language weekly, Enter your subscription today.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60 Chung Cheng Road (E),
Shanghai.

Please enter my subscription for a period of 3/6 months, for which I enclose \$

Name:

Address:

(Street)

(City)

Rates:—Shanghai & Outports, 3 mos., \$6000; 6 mos. \$11,000.
Outports (airmail):—3 mos., \$8000; 6 mos. \$15,000.

論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

冰夷編譯

一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的本質

中世紀時代，歐洲到處受着同一種形式的自然經濟的支配。這種經濟形式在政治上構成了封建主義神權政治的制度。在這種環境中，神秘劇是最風行的，假使可以這樣說的話，而且是最普遍的戲劇表演的形式。

下一個時代——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或者所謂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在歐洲各國，是各以完全不同的速度完成的。布爾喬亞反抗封建地主貴族的鬥爭形式非常複雜多樣。大家知道，這種鬥爭組成了新歷史的主要內容。在這種過程之中，當然是有着與此相應的一般的路線的。譬如說，歐洲封建地主貴族的一般的文化，在大多數國家，是給宮廷貴族的文化，就是產生宮廷戲劇的種種形式的大小宮廷的文化所代替了。這種形式是這樣的富有持久的生命力，甚至於當布爾喬亞戰勝了地主貴族而建立自己戲劇方面的趣味和那所謂偽古典主義（*pseudoclassicism*）的宮廷戲劇為小市民的說教劇所替代之際，還是保持着它的許多重要特點。不可以忘記，這種新歷史的基本過程還雜着宗教的鬥爭。羅馬教會向改革運動進行着殘酷的鬥爭。這種改革運動是商業資本主義和個人主動的發現以及那起來反抗教會當局的科學與批判思想等等滋生茁長之無法避免的結果。但是，除了這些過程中的一般的路線之外，還是有着非常多樣和不同的地方。

無論如何，從文藝復興時代開始的英國和法國的戲劇、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戲劇等等各種不同的戲劇文化，可以說是形成新歐洲戲劇的各種不同的要

素以完全不同的形式結合成的戲劇：有在文藝復興時代和一般新歐洲的戲劇中得到這樣重要地位的復古傾向，有由各階段的階級鬥爭所確定的新的政治社會內容，有不過曾在中世紀時代蟄伏過一時的永遠不會死滅的民間表演，甚至於有教會的傳統，還有最要緊的是那和中世紀時代神秘主義分手而愛上現世的人性的催醒，希望在舞台上看見有情感和要求，有情感和思想，有喜怒哀樂之情的現代人的人性的催醒。注意力集中在地上，主的苦難對於文藝復興時代觀眾的吸引力不如野心勃勃的封建領主、嫉忌的丈夫和貪慾的商人等等最平常的情感了。

有許多條件促使新戲劇先產生在意大利。

這裏古代的傳統最堅固和最有活力。盧伊琪·唐納里在他那一本論意大利戲劇的書中說：

『假使說，古代思想和古代藝術，在中世紀時代，還沒有完全忘記，那末，特別沒有喪失的是拉丁戲劇的傳統。非但亞蒂拉喜劇和滑稽表演（*minos*）一直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於下層民衆之間，而且拉丁的悲劇和喜劇，甚至於在盛行基督教戲劇的時候，也是直接或者間接地存在的。十四世紀時，已經可以指出許多令人想到像是普勞特、特倫西和賽納卡等人的作品的喜劇和悲劇。貝特拉爾克（*Pl. Petrarca 1304—74*）有一部沒有流傳下來的喜劇「語言學」（*Philologia*），亞爾培丁諾·穆薩多（*Albertino Mussato*）寫過一部賽納卡風的悲劇，劇中有合唱，分幕等等也都一樣。維傑里奧，亞爾培蒂·庇查尼，亞萊丁諾以及其他許多無名作家也有把古代和中世紀時代的作風混合在一起而寫的許多喜劇。』

然而，使意大利成爲人文主義的祖國的原因當然不單是由於古代傳統之富有活力。

在意大利，那些從古羅馬帝國承繼下來的城市，在中世紀時代是文化的保存者和教育的中心，程度上比了歐洲其他封建主義國家要高深得多。威尼斯 (Venice)、熱那亞 (Genoa)、拿波里 (Napoli)、薩萊諾 (Salerno)、米蘭 (Milan)、翡冷翠 (Florence) 等等，更不必說羅馬了，都是商業的或者思想的巨大中心。其中有幾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船舶開到世界各地去，以自己的財富知名於世，它們很早就脫離了封建領主的勢力，而形成了共和的城邦。

這一個過程，非但是以反封建的鬥爭，而且是以各城邦內部的紛爭相伴結着進行的。因這許多內訌的結果，有許多城市裏出現了許多取得政權而成爲城市中無限制的統治者的市民。共和主義的形式雖然還保持着，但是這些統治者都成爲事實上的君主，有時候甚至於是新王朝的創業者。一切重要的城市裏都形成了這樣的豪華的宮廷：菲拉拉 (Ferrara) 有愛斯特族，維龍那 (Verona) 有拉·斯卡拉族 (La Scala)，翡冷翠有梅迪奇 (Medici) 等等。十六世紀下半葉，意大利成爲殘酷戰爭的舞台，成爲外來各國相爭的地方。外來各國的軍隊蹂躪它的領土，佔領許多地域，併吞各城市，在當地安插自己的官員等等。因此，商業低落，布爾喬亞的地位因貴族得勢的緣故而大大地縮小了。

這些歷史事件促成了市民階層和人文主義的興起。它們在意大利構成了一般性的人文主義和特殊性的戲劇的特點。連年不斷的內憂外患的戰爭妨礙了像在法國西產生的那種形式的絕對專制主義。所以，意大利的文化也帶着特殊的性質。下面我們可以看到，每一個國家的文藝復興運動都是各不相同的。假使說，在法國西，古典主義成爲比較自然地容納宮廷生活的思想內容的形式，假使說，德意志的人文主義很早就成爲反對羅馬的宗教改革運動的

表現，那末，意大利的人文主義第一是帶着學術性和形式美的性質的。第一，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者是一些學者、古風的愛好者、古代手稿的闡釋注解者、出版者和研究者。甚至於像貝特拉爾克和薄伽丘 (Boccaccio) 等等的詩人也是偉大的研究家。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所具有性質就是如此。我們幾乎沒有看見一個當時的劇本能保持較長的壽命。意大利沒有產生過一種偉大的劇作家。但是意大利的劇作家們寫過幾千部劇本，這些劇本都是機械地依照賽納卡、普勞特和特倫西的範本所作成，其中有極小部份是依照偉大的希臘劇作家們的範本所寫成。但是，即使如此，也沒有妨礙意大利在傳佈宮廷戲劇形式方面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因爲它所傳佈的這些宮廷戲劇的形式曾經鞏固地在歐洲保持了許多時候。羅馬教皇和封建領主以及在城市裏鞏固了自己地位的統治者，他們自己都是屬於文化水準較高的人文主義者之列，他們非但是藝術的保護者，而且他們親自寫作詩歌和劇本，從事研究古代的作家。所以，戲劇在意大利會生長成有教養階層的帶有學院氣息和因此而沒有靈魂的創作，那是不足爲奇的。廣大的羣衆階層，對於這種戲劇決不相關，他們有自己的戲劇，他們人山人海地聚集在市集的舞台之前，街頭的優伶們就在這種舞台上娛樂手藝人、學生、小商人、短工和農民等等。

關於宮廷戲劇，必需提起下列諸種要素。第一，它破壞了中世紀神祕劇所有的一致性。在中世紀的神祕劇裏，民間表演所含有的寫實主義、教會的神祕主義和騎士制度的趣味等等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達到高度成功的真正的羣衆表演的例子。宮廷戲劇是激烈的階級戲劇。這是它的第二個特點。工商業愈發達，統治階級和被壓榨的人民大眾之間的鴻溝愈加深，宮廷戲劇也就愈發達，它的演出也就愈奢華。第三，應該指出，宮廷劇場的形式本身就是容納少數觀衆的禁閉的劇場形式。這種劇場起初是在各處城堡裏和遠離工農居住的城郊的宮廷裏，——這一切都表現出它的

峻嚴的階級性。這一切好像象徵着一種思想：這種戲劇是指定給優秀觀眾看的，不是無產的羣衆所能達得到。最後，和任何劇場一樣，這劇場從它產生的那一個時刻起，就是以宣傳爲目的的。它是統治階級的財富和威力的展覽，是影響民衆想像力的工具。這種劇場是宮廷的一種裝飾，這不單是王公貴族，而且也是教皇們的家庭娛樂的一部份。貴族們向自己的客人們展示豪華的服飾和裝置。有名的教皇李奧十世 (Leo X 1475—1521)，原名喬伐尼·梅迪奇 (Giovanni di Medici)，他在梵蒂岡 (Vatican) 有一所劇場，該劇場的座位上充滿着愛斯特、龔查伽、梅迪奇等名門貴族的人物和紅衣主教、主教、公主等等。

宮廷戲劇逐漸把民間戲劇排擠出去，因爲布爾喬亞文化逐漸逐漸露了面：一切都是爲了少數無所事事的人，勞動的人民却什麼也沒有；前者享受獲得的財物，後者却爲了獲得這些財物而艱苦地勞動。

一 一 學院派] 戲劇

文藝復興時代戲劇的基本形式是在意大利形成的。因爲意大利比歐洲其他各國早一步踏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在意大利，十三世紀時，封建主義已經差不多到處給商業資本所征服了。商業資本的繁榮確立了十三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的意大利文化。新興資產階級文化業績的現象之一是大規模的人文主義運動，當時意大利的藝術是蓋壓着這一運動的印痕的。和人文主義的哲學、科學、詩歌等同一個時候，還有人文主義的戲劇 (所謂「學院派」戲劇) 也曾經在文藝復興時代起過重大的影響。這種戲劇有幾方面是接觸到學校戲劇和假面劇 (詳下面的)。「學院派」戲劇是在拉丁文中——在喜劇 (普特勞和特倫西) 和悲劇 (賽納克) 中——把握到的對於古代戲劇與古代劇場的興趣之復活的結果。「學院派」戲劇的作者——人文主義者——是商業資本時代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的思想家。和那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發達起來的封建主

義文化的傳統進行鬥爭的時候，文藝復興時代的資產階級，由他們這些前衛的代表出來回顧古代的藝術——發達的貨幣經濟時代的藝術。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之間的意大利資產階級，是立脚於古代的哲學思想和藝術思想之上的。他們得能最迅速地征服中世紀宗教禁慾主義的意識形態。人文主義戲劇也就是向上的資產階級用來對那和他們敵對的封建主義神權社會的舊文化進行鬥爭的工具。許多人文主義喜劇的反宗教傾向，愛戀現世的這種思想的凱旋以及其他等等的主题，都是由此而來的。

特里西諾的「索福尼茲巴」(一五一五年) 可算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第一部人文主義悲劇。這一個劇本是遵照古代戲劇藝術的規矩寫成的，它展開了歐洲古典主義悲劇的時代。跟着走特里西諾的路的不單是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的意大利劇作家 (盧吉拉伊的「羅斯蒙達」[Rosmunda]——這是根據索福克爾的「安蒂翁納」[Antigone] 自由改作的，——馬爾特里的「都里亞」[Tullia]，亞萊蒂諾的「奧拉齊亞」[Orazia] 等等)，而且還有歐洲其他各國信奉古典主義的詩人。特里西諾的悲劇的特點是舞台動作的貧乏，舞台動作爲對話和敘述所代替了，——這是轉移到十七世紀法蘭西古典主義悲劇的特點。

在文藝復興時代達到特殊發展的是意大利的學院派戲劇，這是沿着兩個方向發展的——一方面是所謂新拉丁喜劇，或者就是「學院派」喜劇 (commedia erudita)，它的特點是不論在戲劇理論和劇本結構上都摹倣拉丁式 (全劇五幕、地點與時間的一致、引子等等)。新拉丁喜劇的作家是向羅馬喜劇作家借用傳統人物的，例如——comicus senex (滑稽老生)、寄生蟲、推動糾紛的僕人、吹牛的武士等等，還有古人愛好的各種境遇 (situation)，他們或多或少地把這種境遇重複製了來供自己使用。

另外一種學院派喜劇是小說的喜劇，這是借用拉丁喜劇的外形和取材於意大利小說文學的。像亞萊丁諾在他的喜劇「哲學家」裏把薄伽丘描寫安德

留丘的小說加以戲劇化。不過，學院派喜劇的內容差不多不變地總是牽涉到戀愛糾紛，而且不是完全有一定的來源的。作者常常從實際生活中去汲取題材，因此學院派喜劇蛻長成了世俗的喜劇。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第一個比較大的喜劇作家是亞里奧斯多 (Lodovico Ariosto)。以『箱子的喜劇』(一五〇八年)開始，他寫了許多這種樣式作品，其中特別有趣的是未完成的描寫菲拉爾大學及其學生生活的『老鴉』(一五二九年)和『關亡者』(亞里奧斯多在這劇本裏嘲笑巫術的迷信)。

和亞里奧斯多同時代的作家有畢碧愛那和馬基亞維里 (N. Machiavelli 1469—1527)。畢碧愛那寫過一部很出色的喜劇『卡朗德里亞』，在一五二三年烏爾賓諾城嘉年華會時上演。這劇本的基础是建立在兩個學生兒的酷似的相貌之上的(可與普勞特的梅納赫馬比較)，因為這兩個學生兒是一男一女，所以喜劇中有幾處地方有着雙重的戀愛性質。

馬基亞維里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最完美的喜劇『曼陀蘿華』(Mandragoras 一五二三年)的作者：劇中純喜劇的特點結合着反宗教的諷刺成分(任何事情都做得出的守財奴和偽君子——修道士蒂莫特奧法師的形象，宗教不過是他致富的工具而已。蒂莫特奧法師可以說是莫里哀 (Moliere) 的『達郎夫』(譯『偽君子』的原型)。表示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資產階級戲劇之極盛的『曼陀蘿華』是非常成功的。這種成功甚至於在里奧十世的宮廷裏也伴着這個劇本而盛行不衰，教皇親自和紅衣主教們鼓掌激賞蒂莫特奧的冒險事業——激賞這種把宗教改革前夜上層僧侶階級的精神形態描寫得活龍活現的有趣的筆觸。

在十六世紀意大利戲劇史上佔據着特殊地位的是彼得羅·亞萊蒂諾的喜劇。他那些喜劇差不多和古代文學的傳統是沒有關係的，因此他的喜劇也就給推到了人文主義戲劇的範圍之外去。亞萊蒂諾的喜劇，在戲劇理論的構造方面很差，不過把它們作為反映當時意大利生活狀態的作品看，準確些說，

把它們作為反映當時意大利生活狀態之黑暗面的作品者，那是很可取的。亞萊蒂諾，在他的不平凡的一生中，曾經在投機家、高等娼妓以及各種冒險家的圈子裏混過，他把這些『暗娼社會』(deminonde)的代表人物作為他喜劇中的主人公；他給他自已的人物加上藝術的描寫，創造出一大批非常完整和深刻的典型。然而亞萊蒂諾找不到他的後繼者。世俗的喜劇沒有再往下發展。醉心於古典文學的人繼續集中自已的全部精力於摹倣普勞特和特倫西：例如，特里西諾在一五四八年發表的接近於普勞特的梅納赫馬的『學生兒』。

III 『學院派』戲劇的形式與作家

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戲劇的特點是：形式地依賴古典的範本，和生活缺乏清晰可感的活的聯繫。

亞斯巴里在他的『意大利文學史』一書中，論當時的悲劇有云：

『它(指『學院派』戲劇)的傾向的特點是博學性，大家竭力小心和甚至於扭泥地追隨亞里斯多德的指示和古人的典範；外表的端正成為主要的原則，而古時曾經在這些形式中有過表現的質樸的崇高性却完全消失了。三一律是被當做一種理所當然的法律來遵守的，這法律是沒有置喙的餘地的；合唱隊，舞台在各幕之間的插戲中仍舊開着(然而舞台上却還坐着幾個觀眾)，這就已經更難於脫離三一律了。不過，像我們後來在高乃依 (P. Corneille) 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地點的一致普通總是帶着非常模糊而一般的性質，所以祇要把地點的一致表示得精確一些，立刻就曾在許多場面進行的過程中產生很大的不真實性。時間的一致約束着劇情的微細的發展，逼得祇好要以危機 (Crisis) 開始。劇變 (catastrophe)，舞台上難得的；古代作家，

他們是以報告員和僕人等等的敘述來代替的，因此使印象大打折扣。到了意大利作家們的手裏，這種敘述拉得更長，量也變得更多。在古代作家的作品

中，合唱不單是在劇情的一定的間斷之中，以歌唱來表達劇情中的思想的，而且還有幾處地方是一直存在的。有幾處地方常常是參加在對話之中，不斷地給劇中人物以最適合的機會，使他們可以表現情感或者向觀眾做應有的報道。『所以，悲劇的主人公會向合唱隊訴說他們自己的一切秘密，因此，使觀眾得到一種頗不自然的印象，覺得合唱隊怎麼不阻止犯罪的行爲，怎麼不預先防止危險的發生等等。』

A 強喬爾喬·特里西諾

強喬爾喬·特里西諾的『索福尼斯巴』完全是運用上面所說的一切特徵寫成的。這劇本可算是歐洲第一部『古典主義』的悲劇。爲了這兩點，這劇本就值得注意了，這是第一個後來成爲全歐洲劇作家所喜歡的戲劇題材。除了別的作家的名字不算，祇要提出梅萊、高乃依、伏爾泰(Voltaire)和亞爾菲葉里(Alfieri)等幾個人就已够了。特里西諾的悲劇出現於一五一五年，亞爾菲葉里的悲劇出現於一七八七年。這一個題材使古典主義詩人們注意了。三世紀之久。

索福尼斯巴是亞茲德魯巴爾的女兒，奴米地亞(Numidia)國王西法克斯的妻子。奴米地亞首都被羅馬大將斯西庇昂征服之後，羅馬人的同盟者馬西尼薩愛上了索福尼斯巴，他要求把這女俘虜作爲他的戰利品。但是西庇昂恐怕索福尼斯巴影響馬西尼薩，決定把這一對情侶分開。爲了使他的愛人避免受到奴隸的恥辱，馬西尼薩送給她一杯毒藥。她勇敢地把毒藥吞下去。這劇本是以古典主義悲劇中規定的最適當於悲劇對話的十一音節的詩寫成的。特里西諾的劇本中有着很多的壯美性，但是很少舞台動作，沒有人物性格和真摯動人的情感，更像有一個批評家評論這劇本時所說：『這不過是很技巧地表現悲劇的機械；其中一切都有，獨少靈魂。』

B 畢碧愛那

在這一時代，比較成功的是喜劇。是的，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有許多喜劇是普勞特和特倫西的機械的摹倣。正像偽古典主義悲劇的歷史是以特里西諾的『索福尼斯巴』開始，喜劇的歷史普通是以紅衣主教畢碧愛那的『卡朗德里亞』開始的。

這喜劇的內容建立在許多糾纏的有趣的誤會之上的。有一對學生兒，一男一女，生得非常相像，男的叫李迪奧，女的叫桑蒂拉。他們在戰爭的時候失散了。李迪奧化裝成一個少女，冒了他姊妹的名字，到卡朗德里亞的家裏去。一方面卡朗德里亞的妻子福爾維亞愛上了他，她知道他是化裝的，另一方面，卡朗德里亞也愛上了他，以爲他是女子。同時，那真正的桑蒂拉，以爲他的弟兄死了，所以穿了男子的服裝，以李迪奧爲名。因此開始產生了許多喜劇性的誤會：福爾維亞追求那化裝的李迪奧，把他當做自己的男情人看，而卡朗德里亞則追求那化裝的桑蒂拉。結果，兄妹倆人互相認出，一切誤會都順利解決。『卡朗德里亞』中還有李迪奧的朋友非賽尼奧，這是後來有名的脚色『僕人』的先驅者，他以種種粗俗的打趣和鬼計取悅教皇、紅衣主教和貴族們。

這部喜劇在一五四八年因亨利二世(Henry II)入國的機緣而演出於里昂。關於這戲在一五一三年演出的情形，卡斯蒂里昂伯爵曾經有過一段描寫。伯爵是當時的名著『廷臣』(Il Cortesiano)的作者。這部書是當時上流社會優雅風度的法律，曾經譯成過全歐洲所有一切文字。伯爵的描寫是非常有趣的，這題目警宮廷戲劇誕生時代演出情形的活證據。『卡朗德里亞』的演出是非常豪華的。大廳上飾着花卉，點着兩排通過全廳的臺燭。在

●北非洲古國，今在阿耳及爾(Algérie)。

●法蘭西國王。

第一齣插戲 (Intermedium) 中，由戲班子中的頭牌優伶表演摩爾人的舞蹈，他武裝着古式的劍和精緻的盾，後來出現馬頭做得很逼真的牡牛，口中噴着火焰。雅重向這兩頭牛走近前去，給牠們套上了轆，驅使牠們耕地。後來他播種龍的牙齒，於是觀眾面前，從地下出來幾個戰士來。他們在殺害雅重之前開始跳摩爾人的可怕的舞蹈。殺死了雅重之後，他們一個一個的互相殺死。不過他們是到台後去死的，所以死去的場面，觀眾沒有看到。在第二齣插戲中，有一輛由幾頭鴿子拖着走的維納斯神的富麗的車輦。有兩個帶了點着的火炬，箭袋和弓的愛神 (Amour) 爬在鴿子們身上。另外有八個愛神護送着，他們跳着非常優美的摩爾舞，起初一個人跳，後來同九個新參加的人一同跳。在第三齣插戲中，是由兩隻做得非常像的海豹拖着走的海神 (Neptunus) 的車輦。輦上的海神拿着三叉戟。他走下地來，被圍在另外四個優伶一同跳的舞中。後來由戴着孔雀的天后 (Junonis) 的車輦把這一部份表演結束。在喜劇之後，有一個小愛神在台上用詩宣布插戲的內容，接着奏樂：有四個人在四個提琴伴奏之下唱讚美歌。「於是這一個祝典在觀眾非常滿足的情緒之下結束。」卡斯蒂里昂在他結束描寫時加上這樣一句：

C 馬基亞維里的『曼陀蘿華』

十六世紀的意大利喜劇脫離書本和古代的影響而比較自由了，其中大多出於生活和直接的創作的靈感。這一個時代的優秀的戲劇作品都常常掙脫了古典傳統的束縛而直接顧及生活了。

像亞里奧斯多，他的喜劇中本來是摹仿普勞特和特倫西的，還有尤其是當時以許多喜劇出名的亞萊丁諾，他們也開始描寫當時的風俗生活，嘗試創作風俗和性格的喜劇了。

在這些嘗試中，有一件作品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這是名著『帝王論』的作者馬基亞維里所寫的喜劇『曼陀蘿華』。在這喜劇中，我們看見的已經

不是以普勞特和特倫西的範本寫作的因襲的人物，而是些當時的活的形象，是當時社會風習的鮮明的圖畫。

不用複雜的糾紛和古羅馬喜劇風格的喜劇插話的堆砌——而用劇情的明晰的發展。

這一個喜劇的主要人物是——尼佳，他的妻子羅克萊西亞，她的懺悔僧蒂莫特奧，食客李古里奧和卡里馬珂。這一個卡里馬珂愛上了尼佳妻子——這一個善良而虔誠的婦人。李古里奧幫助卡里馬珂達到他的目的。他利用尼佳頭腦簡單却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竭力鼓勵他的不知愁。卡里馬珂從巴黎大學回來，容易易易的爭取到了他的信任。尼佳和羅克萊西亞渴望着想有孩子。卡里馬珂自稱為是醫生，他天花亂墜地向尼佳說，法蘭西王后和許多公主都會以曼陀蘿華的根治愈了不孕症。這卡里馬珂是從巴黎一位醫生那裏聽來的，這位醫生的拉丁語講得和西塞祿 (M. T. Cicero) 一樣好。不過，女人服了曼陀蘿華之後，第一個與之接觸的人是嬰死的。所以羅克萊西亞服了曼陀蘿華的飲料之後，必需找一個街道擔三來代替丈夫。尼佳狐疑不決，但是卡里馬珂說服了他。然而說服羅克萊西亞却要難得多。聽了李古里奧的勸告，他們去求助於羅克萊西亞的懺悔僧蒂莫特奧。那和尚原是很聽話的，因此就買通了他。使用巧妙的詭辯的論據，說服羅克萊西亞去犯罪。因此卡里馬珂達到了他的目的，而那受騙的丈夫却還向他妻子的情人感謝他幫助。

這喜劇中的人物性格描寫得栩栩如生，而且非常藝術，使人想起像是莫里哀和龐馬舍的最好的喜劇形象。懺悔僧蒂莫特奧，無疑地，是有着巨大的歷史性的意義的。他是教會和修道僧腐敗時代的形象。他貪慾，漠視信仰

① 插在審判幕之間的戲，每與正戲無關。

② 希臘神話中手持弓箭，身長翅膀的孩子模樣的愛神。

③ 羅馬神話中，農神 (Saturn) 之女，天神 (Jupiter) 之妹，後為天神妻。

④ (106-43 B.C.) 古羅馬演說家兼作家。

和自己的責任，善於巧妙地利用宗教來達到慾望的目的，精通詭辯術，——要是作者不在描寫他的時候用這末善良的幽默，他是可以當作諷刺上流社會的秩序的人物看的。這喜劇不是來自拉丁傳統，它露出一切形形色色的活的時代性。它是從薄伽丘來的，它證明那一個時代已經代替了神祕主義的世紀，已經代替了那向往於天上和爲了精神而輕視肉體的世紀，證明這一個時代已經非常活躍，它已經喜愛肉體的享受，甚至於會把放浪的德行放進藝術形式中去了。

四 田園劇

意大利的田園劇(Pastorals)發生於十六世紀；這種戲劇不久就很快的在歐洲傳播開來成爲巴羅哥和羅哥哥時代非常時髦的東西。和古典主義戲劇一樣，這種戲劇也是與古典文學的研究有關的。田園詩(Duolico)，自從薄伽丘時代以來，在意大利就很吸引了。通常以對話形式寫成的田園詩是田園劇的濫觴的形式。這一類田園詩劇在開始發展的時候是在(Intermedium)意大利貴族宮廷裏舉行的祝宴節目中演出的，有時作爲某一部戲中的插戲，有的作爲正戲。這一類劇本的人物通常是男女牧人、水林女神(Nymphs)、牧神(Pauns)、海洋女神(Sirens)、其中寓意的人物也有着重要的地位。劇本的內容是戀愛故事，譬如說，牧人戀愛水林女神之類，普通總是經過許多周折，結果圓滿。田園劇的抒情的性質總是顯露在許多獨白之中。這些獨白是作爲小型的一人劇(monodrama)來表演的。意大利文學中這一方面的傑作是托爾卡多·塔索(Torquato Tasso 1544—1596)的亞明塔和翻里尼的『忠心的牧人』。在巴羅哥時代，田園劇轉變成一種由大量舞劇(ballet)節目混合成的歌劇(operas)。

假使說，在早期的發展中，田園劇還是很接近人文主義戲劇的話，那末，後來它却似乎成爲後者的否定了。它停止表現資產階級文藝復興時代的文

學所特有的那種緊張的感覺和熱情。在田園劇裏出場的男女牧人喪失了深刻的體驗。他們是那失去了鬥志和充滿了享受的社會的子弟。在他們身上不難認出那些醉心於燦爛的貴族文化的廷臣、貴族、或者資產階級。

五 Commedia dell'arte(假面喜劇)

和人文主義的『學院派』戲劇同一個時候，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意大利，有一種所謂『假面喜劇』(commedia dell'arte)開始非常盛行。十六世紀中葉，我們已經可以看見 commedia dell'arte 之成爲傳統的假面人物——彭塔龍尼(Pantalon)、勃里格拉、阿爾萊金(Arlecchino)和醫生●等等。在意大利南方，這些人物變化成拿波里(Napoli)地方四人合演的假面劇(quartetto)——布爾啓納拉、斯高拉穆啓亞、塔塔里亞和卡維埃洛。在這些基本的假面人物周圍，又集合了許多別的當地的假面人物及其變形。假面喜劇起初企圖把古代喜劇之人文主義的摹倣應用到人民的口味上去，就是說，這是書寫的喜劇之特殊的一支，但是不久它就轉變成即興作品(improvvisazione)。祇把題材寫成腳本的形式和附帶註明場面進行的程序，而劇詞是由優伶即興創作的。當然，完完全全的即興之作這裏是沒有的，一切都是預先排練好，所以劇情的過程根本是預先準備過的，劇詞的自由性也不過是限於這種範圍之內。Commedia dell'arte 對於文學劇(例如莫里哀)也起過很大的影響。慢慢兒它成爲上層社會中的時髦東西。上層社會之所以愛好，全是因爲它沒有思想內容，純粹是外表動人，其中沒有諷刺社會的成分。Commedia dell'arte 成爲宮廷劇場的必需品，它甚至於流傳到俄羅斯去(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正由於這種似乎是抽象而無傷於情感的奇異的幻想(實際上是有着完全確定的社會傾向的)，所以像威尼斯人高奇這

●都是意大利民間喜劇的劇中人物，他們均穿着一定模式的服裝，表演某一典型的角色。

樣的沒落貴族的大藝術家也迷惑於這種形式，在十八世紀末葉他還企圖復興 *commedia dell'arte*。在意大利本國對於 *commedia dell'arte* 這種形式甚反抗是發生於工產資產階級之中，他們竭力想把劇場變為保護他們自己利益的講壇。因此產生了那否定 *commedia dell'arte* 的構思而廣泛利用它的手法 and 典型化方法的意大利的風俗劇。這種風俗喜劇的最大的代表作家是高爾唐尼 (Goldoni)。

六 意大利宮廷劇場的舞台和演出

因自然經濟和封建主義神權制度的瓦解以及城市的生長而在新歐洲產生的這種種新趣味，它們以悲劇和喜劇來取代中世紀的龐大的神秘劇了；這些新的樣式是受着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的。

這些供另外一種社會階層欣賞的樣式也就應該用新的劇場建築。

在中世紀的舞台設備中，已經包含着某些後來成為宮廷劇場建築的基礎的要素。在教堂裏表演宗教劇的時候，祭壇的對面，已經有把樓座 (*gallery*) 留給最顯貴的觀眾做座位，這早已有了後來的包廂 (*loge*) 的雛形。後來，戲劇表演從教堂的門口搬到廣場上去進行了，四周房屋的窗戶構成了天然的座位，觀眾就在裏面望下來看神秘劇的演出。廣場上常常有高出的特殊的壇，上面鋪着富麗的地毯和布，這是給特權階級的觀眾坐的；在這些座位中，有一個中央的包廂，佈置得特別豪華，那是給主教、城市當局的重要人等坐的。但是這並沒有破壞人民大眾演出的中世紀神秘劇的普及性，因為這種演出是全體市民努力完成的創作，它吸引着成千成萬的觀眾，佔據着巨大的廣場和街道。

自從那起初是城市或者國家的統治者和後來成為布爾喬亞財主的這一個階層，想舒服地坐在自己安樂椅中欣賞戲劇演出之後，劇場建築就完全要走另外一條發展的道路了。現在劇場和觀眾廳的設備要向室內性方面發展。這

一類劇場產生了許多不同的型式；第一種型式，像在意大利；它斷絕了中世襲傳統，另外一種型式，像在英吉利，劇場設備中保存着街頭舞台的原則。在不大的舞台上，努力創造巨大空間和大量設備的幻覺。在這一努力過程中，劇場是經過好幾個階段的。

這一個過程的第一步，是應用遠景，向觀眾展開了街道、海洋、森林等的遠遠地深入的景緻。遠景的發明者是偉大的建築師、羅馬聖彼得寺院的建造者白拉孟特 (Bramante 1444—1514)。這種發明給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最偉大的畫家們在裝飾藝術方面開闢了一個廣大的前途。

最精美的遠景劇場是十六世紀末葉建築師帕拉迪奧 (Andrea Palladio 1518—1580) 在維琴查 (Vicenza) 建造的劇場，這劇場至今還保存着；舞台是一個宏麗的建築，向觀眾展開着一個城市的景色。

但是固定的遠景舞台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它分成兩個不平均的部份：舞台前部 (*avant-scène*) 和在舞台前部之後展開的這一個富麗建築的全部。後者們祇在舞台前部演戲、跳舞和唱歌，祇有這一個前部是水平面，後部却是漸漸上升的。所以這種精美的舞台裝置是一勞永逸地固定不變的，它不是活動的地點，但是却創造了巨大空間的幻覺，促進了美感的力量。

然而高尚觀眾之細膩的趣味和藝術的感覺是不能和這種靜止的舞台裝置妥協的。演員出現於舞台裝置之間，立刻破壞了遠景，結果立體的人和平面的圖畫之間顯出了不調和。必需要從這種困難之中找出路才是。當時有一個曾經寫過一部論建築的傑作的名建築師賽爾里奧 (Serlio)，他深入而詳細地建立了新劇場的舞台裝置的方法。爲了保持固定的舞台上的幻覺，賽爾里奧建議，用厚紙照遠景的大小做一些人物，把這些紙人放到舞台上活潑。用了這種方法，可以創造出有兵士、音樂師等人物熙熙攘攘活動的街道的幻覺。譬如說，在「飛行的荷蘭人」中，在舞台前部變成巨船之前，舞台背景上先出現一艘厚紙的小船。過了許多時候，有一家美國舞台，在普通身材

的優伶所扮演的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登台之前，先由六歲、十歲和十四歲的男孩子，戴着同樣的面具和穿着同樣的服裝，表演鬼魂逐漸走近舞台前部。當然，這種彌補的方法是非常不方便的。這種發明對於不開口的腳色和沒有生命的東西還可以用，但是對於那些表演開口的腳色的優伶就麻煩了。賽爾里奧關於舞台裝置方面所提出的補救方法就是如此。他定出三種舞台裝置。給喜劇用的是街道和小市民、商人等的房屋，尤其重要的是扯着幌子的窰子，還有是可以從半月形的託盤上送出來的酒店。給悲劇用的是寺院、宮廷、柱廊；給諷刺劇用的是用絲織等做的樹木。

所以，在這種樣式的領域裏，舞台裝置仍舊是固定不變的。

次一個階段的發展的特點是所謂三面可以轉動的三稜鏡式的佈景。每一面在框架上張着厚布，畫着佈景。這樣可以把劇情所需要的每一個佈景轉過來對着觀眾，而且能按照需要，換用後面可以變動的佈景。後來，空中出現了一些用厚紙做的塔、飛簷、烟筒等等的東西，線條都畫得很粗獷。

再後，則是由裝在後部背景兩旁的側景 (coulisse) 來代替了，因此在掉換佈景方面達到了更大的流動性。這是舞台裝置藝術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導演和技師們所達到的高度的完美性和寫實主義風，可以由那曾經在意大利從事好久藝術研究工作的德國建築師富爾登巴赫來證明。舞台前後，在兩面微微高起的舞台上，富爾登巴赫設了兩條四槽——『溝』。前面的溝是落幕在內的。幕依照羅馬劇場的樣子，由上而下降落；後來這裏是音樂師的席位，就是我們現在的樂隊席 (orchestra)。後面的溝裏活動着海怪和船艦，白浪濤天，空中翱翔着飛禽，假使天氣不好，還閃着電光，打着雷聲。燈光效果的意義之重大，富爾登巴赫是非常了解的。燈裝在溝的後面，爲了增強光度，所以用鏡子來反射，這裏他和賽爾里奧一樣，他也不怕在他的遠景舞台上讓劇中人物從後面街道那一邊上場。隨着戲劇表

演深入舞台背景的發展，發生了一個新的重要問題。演員在舞台前部表演的時候，觀眾廳裏的所有的座位都可以看得一樣清楚。現在祇有坐在中間部份座位上的觀眾才能完全全看清楚了。

至於觀眾的座位，那因爲在王公貴族們的宮廷裏，演戲是作爲統治者們的一種私家娛樂看的，觀眾是他們的賓客，所以是按照他們各自的門第等級就坐的，有如宮中招待宴客時就坐的情形一樣。所以戲劇演出帶着嚴格的階級性；出身比較低微的人以及小市民之流，王公貴族們的府邸不是隨便可以進去的，假使去參觀宮廷劇場的演出的話，他們就坐在上面的座位上，這些位子頗像現代劇場中票價最便宜的『樓座』 (gallery)。

跟着布爾喬亞的生長，傾心於戲劇表演的人民增多起來了。私家的宮廷劇場之外，同時產生了供給廣大觀眾看的巨大的劇場建築。這些劇場是由兩種原則結合成的：宮廷劇場的傳統和起了變化的生活條件所提出的民主要求。一方面，這種建築中還保持着照等級分開觀眾的原則。但是，另一方面，誰能多出錢，誰就佔據好位子。歐洲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基本變動——封建主義爲資本主義所更替，——像在劇場建築這種特殊的藝術現象中，也有着徹底表現，所以分配劇場座位的歷史可以說是階級鬥爭史的特殊反映。

地主貴族階級漸漸被逼着和布爾喬亞分潤政治和經濟的權力，——於是，在某一個階段中，地主貴族階級也和布爾喬亞在劇場分潤特權的座位。資本也在『名門貴族』旁邊佔有一席之地了。

椅子座位密密層層一排一排重重疊疊直到舞台前的新劇場取代了王公貴族們的不經濟的圓形劇場。這種新劇場可以容納大量的觀眾，彷彿反映着各階級的混合。這仍舊是分等級的劇場，但是意義已經不同了。世襲的貴族仍舊在最前幾排，同時這裏還有大布爾喬亞和他們在一起，而且大量的『民衆』也可以去看戲劇表演了，雖然是要比較有錢的才能進去。

x

x

x

今日的廣西 (特約通訊)

陳 治 華

一 劫後的殘局

十年前的廣西，由於它的主政者某種積極的意圖，和基於此意圖的一套頗為特別的做法（如設立政治學校、吸收左翼份子、訓練民團及學生軍等），頗引起省外人的注意，即在抗戰期間由於兵源的頻頻抽調，也是頗惹人注意的。可是經過廿六年王

公度案（廣西自己的清黨事件）和兩次的淪陷（廿八及卅三年）它的本來面目已暴露無遺，原來它也不過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呀！某中央監察大員曾經公開的說：近年來廣西政治的腐敗幾為全國之冠。這是有事實證明的，如卅三年冬敵人向西進攻，整個政治機構即如雪塊一樣崩倒下來，不上半月淪陷了七十六縣（全省九十九縣），一個月內省政府凡四次搬遷，物資的損失無法統計。在淪陷期間省府停止辦公達半年以上。即在收復一年後的今天，整個廣西仍陷於極度癱瘓的狀態中。鐵路固然尚未修築，能通車的公路尙未達十分之三，教育的復原則未達十分之二，而最嚴重的是所有的農民都普遍缺乏耕牛和種籽。省內僅有的官辦工業（如紗廠、糖廠、磁器廠等）也已掃蕩無遺。

多年以來廣西已推行了嚴密的保甲制度，新訓

練出一批鄉村長，用秘密警察的方法統治着一般農民，與這個保甲制度併行的是軍事徭役制——無償的勞動；農民自己帶米糧去築飛機場、開鐵路和公路；在抗戰期間農民又被迫帶着米糧去破壞公路、挑運軍糧（每一農民挑運六十斤軍糧就要帶三十斤至四十斤食米去備途中之食用）。目前捐稅之繁重

左右（同前報九月十八日）又九月十日桂林廣西日報發表一篇宜山通訊，該縣自四月至七月，每一農戶負擔的富力捐、建校捐、鄉政人員食米、學校教師米津以及建築縣捐衛生縣捐共為二十萬元（驚人之捐款！）

！各縣經費的來源都是靠屠宰稅和富力捐（即按戶攤派）。結果，每斤豬肉原來的底價是六百元，但稅捐却收四百元，過秤時是連皮帶骨的，結果一斤豬肉非賣千三百元不可。至於所謂富力捐或叫自治戶捐是按戶強派的，農民對此已普遍發出了憤怒，即官方的報紙也時有登載此項消息，如萬岡一縣報道：『本縣財政支絀，經由縣通過追加富力捐八千三百餘萬元，平均每人一千元，縣府已經動員全體職員下鄉征收，全縣人民聞訊後均有「臨捐涕泣」之感』（九月廿六日南寧廣西報）又如同一縣征收富力捐前後已共五千三百萬元，每戶平均一萬元

部分，（這被吞蝕了的款項到那裏去只有天曉得）以致省級公務人員比中央機關的公務員要少得多，譬如九月份中央公務人員之薪津基本數為七萬五千元，薪俸加成四百四十倍，但省級公務人員基本數僅為六萬元，薪俸加成三百倍，尙且往往拖延兩月不發。至縣級公務人員又比省級低，平均計算生活補助費僅得二萬元，薪俸加成百五十倍。小學教師則更窮得可憐，每月只得四十斤米及一萬元的補助費。但內地生活費並不比省外為低。以九月份一般物價來說，白米二萬五千元一担，生油一千元一斤，豬肉每斤五百元，普通肥皂千二百元一條，粗毛巾千二百元一條，皮鞋萬二千元一雙，普通藍士林布千二百元一尺。本年四月間南寧全市小學教師因縣府拖欠三個月薪津不發，會發生全體罷教。其他各縣中學教師因欠薪而罷教者報上亦時有所載。

最使人奇怪的是：廣西的官吏是直接由人民最後的一碗飯來飼養的。譬如縣政府的官吏是仰給於征收人民的富力捐，鄉政官員的新津公糧是按戶攤派，各鄉村甲長及鄉政人員奉調到縣訓練所受訓，在受訓期間的膳食概由所在地的民戶負擔，理由是：他們將來回去是替人民辦公務呀！

二 貧窮·疾病·死亡！

本年四月至七月間是廣西最嚴重的時期。那就是普通的災荒（水災和旱災），貧窮疾病死亡與日俱增，隨之而發生的是農村的騷動，各行政區奉令成立一保安團，日夜警戒！官方正式發表受災人數共約二百五十三萬餘人（全省一千三百餘萬人），約占全省總人數六分之一。如靈川一縣因蟲災及耕牛缺乏晚稻收成平均僅二成，連同早稻收穫尚不及四成，農民有谷千斤以上者百不及一二（九月廿九日廣西日報）。興業一縣因雨水過多僅廿田一鄉被淹區域即一〇〇畝，災民達二二〇〇人，粒穀無收，農民有對禾痛泣者有自縊者，慘不忍觀。（九月卅日南寧廣西報）九月十九日桂林廣西日報載：平樂一縣人口共十七萬六千，六月間饑民已達六萬以上，農民因吃野草樹皮致死者共四萬五千人，又『荔浦一縣人口十五萬人，七月間全靠吃野草木薯過活者共三萬餘人』。至『第二行政區屬柳江、柳城、中渡十餘縣饑民數占各該縣人數百分之三十

至五十』。因災禍饑饉疾病而死亡的即以全縣一縣為例，經該縣府的調查，三月份病死七二人，四月份病死六〇四人，饑死一七一人，五月份病死五〇〇人，饑死二四八八，六月份病死九九七人，饑死三二九人，七月份病死一三九八人，饑死一五九人（以上均見九月十九日桂林廣西日報）即廣西救濟總署副署長謝某會向報界宣稱：其沿靈川至全縣一帶村莊視察，此一帶村莊農民因饑饉而死亡的幾等於各該村人口三分之一。九月十八日南寧廣西日報載：玉林一縣（係全省土地最集中之一縣）本年秋收僅及四五成，自本年三月以來，各鄉災民濘雜雜糧而吃者占十之七八，因糧乏饑死者占百分之三，五六十天無米吃者占十之二三，於秋收時米價則仍徘徊於四萬元左右（是時廣州米價三萬元）同報（官方報）九月廿一日賓陽縣通訊：『秋收期屆，糧價驟跌，新谷僅售萬三千元一担，但另一矛盾現象却是收成銳減，因經水旱蟲災之後，收穫不及二成，各處現在正鬧慢性的糧食恐慌，今年年底以前已難渡過，來年饑饉堪慮！』

所謂『大兵之後，必有荒年』，目前廣西的饑荒其由來已久，一為抗戰期間人民的負擔與損失，二為勞動力的缺乏，三為耕牛的無着，所謂水旱災不過係加促此一饑荒的爆發而已。據省政府公報發表，在抗戰期間，軍民的損失，死亡者計五十萬，傷殘者十三萬以上，失蹤者六萬以上，合共一百萬

，占全省人數十四分之一。這個統計我們相信只有少而不會多的了。至人民的負擔即軍公糧稻谷共一千四百九十七萬餘担。至於因為征發是項軍公糧食規定的運費給予過低，人民受到極補運費虧累的损失約達七十萬八千五百餘萬元（見九月十三日桂林廣西報）至第二次的淪陷（卅三年）給予人民的損失却太大了，據官方的統計：『被淪陷的縣份共八十縣，一一〇一鄉鎮，九二一四村街，房屋損失二九二、二三〇間，谷米雜糧損失一千七百餘萬市担，耕牛損失四十八萬多頭，農作工具二百萬具。』（見前同日同報）

抗戰期間壯丁頻頻的抽征，為數若干無人知道，但『勝利』後一年的今天，出征軍人尚未見正式退伍回來，以致造成農村壯年勞動力的缺乏。最使人驚奇的是，全省農民已普遍陷入饑饉死亡的時候，苛捐重稅又有增無已，自外滙提高以致影響物價又再暴漲後，政府為維持政務的支出，各項稅率又提高了，各縣政府現正動員全體職員下鄉催收富力捐，屠宰稅再度提高了，田賦征實將於十一月開始征收，今年的征收率為每元征實三五斤，征借十七斤，帶征省縣公糧三成。農民請求豁免或減免本年田賦的呼聲均被駁回不准。但是各地已先後發生了這樣的情形：本年六月間賓陽廣圩發生了一羣貧民向十幾家富商搶來的風波，那羣暴民除米之外餘概不劫取，事發地點離縣府不及一箭之地。本年七月

聞於綏遠一縣亦發生一股類似貧民的『土匪』向富戶搶劫米糧之事件，『土匪』搶米後除自用外餘則分給一般貧民，事畢場長而去。像這類的事件官方報紙時有登載。我們回憶本年七月間各縣警團嚴查警戒的情形，真是似有大難將臨呢。但底下的一件事將是確實的：即今年的秋收普遍的遞減，（桂北一帶平均是四成，其他各地成數也很低）來年的二、三月確是一個難關！

三 『民主』的暗影

自『民主』的浪潮展開後，這個山城隨即發生了普遍的波動，首先是表現在各學校中青年學生的活躍，出了很多的刊物，很多學校發生了風潮（如擇師運動、研究自由、打倒貪污等）俱由於缺乏正確的領導，很多『民主的學生』仍犯了『五四』時代的老毛病，如個人英雄主義行動及輒因小故而洩憤胡鬧等。俱即使是小小的集體行動也使得當局恐懼起來。本年暑期省府特別招集各地的中學校長到桂林聽訓，要以『法律』來指導學生的民主生活。國民黨青年團奉令發動所謂『民主守法』運動，但得不到回響。凡未經登記的刊物均不准出版發售。並以查禁黃色刊物為名，警察可以隨時到各書店搜查，現在各地均已奉令查禁『黃色刊物』的命令，並已有很多種刊物被禁止售賣。書店老闆時常被傳到警局去聽訓。另外由各地律師、士紳、校長組織

的『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對於被踐踏被侮辱者的身體自由則默無一語。各鄉公所仍得任意逮捕人民，各縣政府的監獄無不充滿囚犯。數月尚未提審，有些囚犯已在監所因疾病死亡了，但他究得何罪？連審判官也不知。當局說得很響亮：本省要在本年底以前完成鄉村長民選。但當這些『民選』的鄉長就職的翌日，即被人民以貪污的罪名控告，至於因選舉舞弊而發生糾紛的無地不有。『豬仔議員』、『賄選鄉長』這些名詞以前祇是讀書人講的，現在連老百姓也已知道叫喊了。

當局對於一般貪污的縣長和鄉長的老辦法是由甲地調到乙地，用換湯不換藥的辦法來緩和人民的反對，各級官吏的腐化與貪污數不勝數，如邕寧縣某縣長上任不數八個月即已搜括八十萬元以上，某區長上任僅一月搜括得五十萬元，均被人民告發而調職。前平南縣某縣長因辦兵役貪污達五萬萬元（已在重慶被扣押）。而當卅四年春敵人壓境，省府狼狽遷往百色之際，西隆縣縣長黃琪因販賣鴉片和勒令人民種鴉片煙搜括得五十萬萬元之巨款，後被人告發時則先期得省府內某大員之通知，於下令通緝數小時前逃遁，此事是全省婦孺皆知的。

廣西行的慣例是最講形式的，下級呈上級的公文是一核再核，一個下級機關用一個最下級的職員如僱員書記，仍須詳具履歷，呈省核委，當教師的也要經由政府的嚴密考核始行委用（教師經省府

核委恐怕只有廣西才有的）。根據上面的情形，人們不禁要問：這種腐朽的和專權的官僚政制和軍事徭役（無償的勞動）制度不予以澈底的取消，人民如何能享受民主的生活？

四 醜！省參議會的笑話

本年六月十日省參議會正式成立，並選舉正副議長，於是各縣的『人民代表』依期到桂林開會。選舉議長的結果，李任仁得四十票，陳錫瑛得四四票，可是成問題的在陳錫瑛的選票中有四票的『錫』字有兩張寫成『錫』，一張寫成『錫』，一張寫成『錫』，李派議員認為此四票無效應作廢，重行選舉；陳派議員認為此僅為小小的筆誤，並且不能證明其屬於另一人，依法此四票應有效，陳錫瑛應當選為議長，李派則堅不承認，於是就發生合法與不合法，多一畫與少一撇應否有誤的論爭，雙方均請來了大批的律師和法學教授。於會場上報紙上互相攻擊，本來規定十五天的會期經六次延期（拖延八十日），省府是公然支持李派，（每票擴說給五十萬元！）至於陳派據說亦得到中央什麼團體的支持。（於爭執期間陳派代表頻頻飛京請示可為明證）兩方的攻擊文章於每天的報紙上占了一大篇幅。陳派則公開的指責在朝派的污績；第一抑留中央發下各機關巨額的復員費，並刻扣省級公教人員的薪津，第二利用銀行及企業公司營私舞弊，第三於淪陷期

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戰後一年	鶴
印度問題之真相	海
*『密勒氏評論報』一封讀者的信(M.A.李)	康
意大利之現狀	劉少嚴
道家與小農	陳人白
答蔡尙思評我的老子看法	康君譯
再評李季的老莊封建說(中國虛無主義史略)	嵇文甫
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婦女地位之變遷	李季
敘述第一國際成立經過的一個文獻	蔡尙思
論古典主義戲劇	碧雲
小甲長的舊夢(小說)	唐虞世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四)	冰夷編譯
印度二月暴動之回憶(特約通訊)	謝少翁
崇明之行(地方通訊)	李毓鏞
讀者意見	李文陽
編者答覆	唐德
	程元宇等

間濫派軍人充當縣長包庇貪污等。多謝官場的鬥爭，它暴露了當權者的種種黑暗行爲。於雙方糾纏不清當中，轉向內政部請示，可是內政部的答覆却很滑稽，其電文謂：『如於選舉前無特別規定，且此小小之筆誤不能證明爲第二人者則仍屬有效』，於是雙方又在合法不合法的爭執中猛烈的攻擊，突然

間陳錫珖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以已接得各方賀電和奉元首辦理要公爲理由，發出通電就職，李派旋即發出通電否認，鬧成貽笑千古的笑話，即在旁觀的民衆來看也替他們醜極了。後來迫得請來了國防部的白部長飛桂調停，調停的內幕人們不得而知，惟當晚即重行改選，結果選出一姓蔣的出面當議長了

事(姓蔣的屬於李派的主要份子)，另由一岑某當副議長(屬陳派)，這八十天的『民主鬥爭』始如此結束。有人正確的估計，因此八十日的議會，兩派因宣傳、招待、及賄買等活動費之開支達四萬萬元以上呀！

一九四六，九月卅日夜

第一卷第五期目錄

從『周報』被迫停刊說起	海
尼赫魯上台與印回衝突	康
巴黎和平會議之檢討	海
論當前經濟危機的嚴重性及其解救之道	陳人白
論利息的支付所及於物價的影響	郭大力
日本屈服後的局勢及其前途	劉少嚴
*日本無產階級之弱點及其出路	
與唐虞世先生論維新運動	張大軍
爲『古史辨的解毒劑的解毒劑』進一解	李季
再答李季先生論老孔思想	歐伯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社會民主黨	盧森堡著·子規譯
*盧森堡的人生觀	
法蘭西大革命及其歷史的研究	唐虞世
論古典主義戲劇(中)	冰夷編譯
近十年來科學新發展概觀(五)	李毓鏞
教育的愛(小說)	謝少翁

投稿簡章

- 一、本誌宗旨在發揚自由研究學術之精神，故採取絕對公開態度——凡關於各種學術思想：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理論等，以及中國歷史發展法則，中國社會經濟性質，農業經濟，土地問題，各國社會政治經濟及其現狀之研究並文藝作品等均所歡迎。
- 二、賜稿請以一萬字為限。如有必要須超過此限度者，請先向本社接洽。
- 三、賜稿務必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題。譯稿請附原文或指明出處。
- 四、稿費概用現金。從優奉酬。
- 五、凡稿件在必要時，有權修改。如不欲修改者，請在稿末註明。
- 六、來稿經本社揭載後，版權即為本社所有。作者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
- 七、稿末務請註明最近通訊處。
- 八、來稿請寄上海南京路六六號本誌編輯部。

本誌外埠經銷處

南京	各	大	書	局	桐城內
安徽	各	大	新	書	局
蘇州	各	大	書	店	仁相路一二七號
杭州	各	大	書	店	琉璃虛一五五號
北平	各	大	書	店	王府井
天津	各	大	書	店	舊法租界濱江道
漢口	各	大	書	店	江漢一路三號
南昌	各	大	書	店	陸家山路(六眼井段)
長沙	各	大	書	店	伯勝路一〇二號
廣州	各	大	書	店	太平路二二八號
潮州	各	大	書	店	
香港	各	大	書	店	
昆明	各	大	書	店	
重慶	各	大	書	店	
成都	各	大	書	店	武成路四四六、七號
廣西	各	大	書	店	

求真雜誌 第七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每月一冊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日出版

本期定價式千元

編輯者

求真雜誌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上海南京路六六號 求真雜誌社

印刷者

上海中山路六四九號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處

上海山東路二二二號 五洲書報社

本埠

各大書店報攤均售

▲不許轉載▼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位	全	面半	面四分之一
超等	封底之外面	二十萬元	十七萬元		
特等	封面之裏及正文首篇之前	二十萬元	十二萬元		
普通	正文之後(插頁)	十二萬元	七萬元	四萬元	

一 廣告費請先惠付

二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印價目另議

三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中國印刷紙版股份有限公司

專印

外埠

地址 上海康定路三二九弄
 電話 二三五二二號
 電報掛號 三〇二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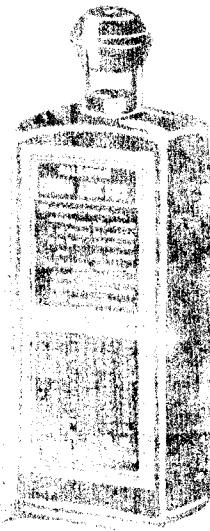
威建大藥房
 THE QUEEN'S DISPENSARY
 PHARMACEUTICAL CHEMISTS

止咳水

常服一羹

香味甜潤 除痰止咳
 美健肺 止咳

威建藥房出品
 風行三十餘年



地址 香港德輔道中二十二號 22 Des Voeux Road, Central, Hongkong
 電報掛號 WATKINS 電話 20492
 Cable Address Hongkong Phone 30954